

范敬宜 著

# 范敬宜文集

敬宜笔记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范敬宜文集

敬宜笔记

范敬宜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敬宜文集. 敬宜笔记/范敬宜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2-24169-0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报纸-新闻工作-中国-文集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G219.2-53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504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邮 购:010-62786544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 张:17.75 插 页:2 字 数:277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

定 价:.00元

---

产品编号:

# 代 序

——读《敬宜笔记》有感

季羨林

近几年来,由于眼睛昏花,极少能读成本的书。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来舍下,送来他的《敬宜笔记》。我翻看了一篇,就被它吸引住,在诸事丛杂中,没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把全书读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我必须对范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同样的谢意和敬意也必须给予小钢。是她给敬宜在《夜光杯》上开辟了专栏。

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内容则比较多样。有的讲世界大事,有的讲国家大事,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个人感受。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风。每一篇都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读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也都为文章所吸引,或卷或舒,得大自由,得大自在。

但是,这里却有了问题。

我仿佛听到有人责问我:你不是主张写散文必须惨淡经营吗?你现在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答曰: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主张惨淡经营。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淡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我不敢居功自傲。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全面。古代的散文大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写庄重典雅的大文章时一定是惨淡经营的,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心加意,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

妙文。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有联系的。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拿书法和绘画来打个比方。书法必须先写正楷，横平竖直，点画分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发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浮躁浅薄，急于求成，这样的书法只能成为鬼画符。绘画必须先写生素描。没有下这一番苦功而乱涂乱抹，也只能成为鬼画符。

孔子晚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毕生修养的结果。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淡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的“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

我忽然浮想联翩，想到了范敬宜先生的祖先宋代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范仲淹。他的名著《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今天许多先进人物的座右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看来，范仲淹之泽，数十世而不斩。今天又出了像范敬宜这样的人物。我还想顺便提一句：今天范仲淹的后代还有一位范曾，也是一个“四绝”的人物。这个现象颇值得注意。

最后，我还想奉劝《夜光杯》的读者们：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2002年4月6日

## 附录：

敬宜兄：

手示奉悉，我以病住院已经超过一百天，身心两疲，看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很有限的。

你现在讲授《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课》，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你驾轻就熟，当无困难，不过你提到“范文”，认为很难找，你寄的那两篇“范文”，到了今天早已陈旧，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文章，而是能充分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对

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同),能够理解人的。至于文字,我认为,一要准确,不夸大,不缩小;二要生动,有灵气,如果你的学生中有人写文章能稍稍接近你的文章的水平,那就再好不过了。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流利畅达而灵气内溢。

我现在是出院尚无定期,季荷开放之日,当能回到北大,真诚欢迎你来看一看季荷。

既寿且康

季羨林

2005年6月15日

301医院



# 目 录

代序——读《敬宜笔记》有感……………季羨林 I

“人走茶凉”属正常……………001

日归日归未归……………003

大师与小卒……………006

漫步巴黎忆恩师……………008

一张名片五十年……………010

蓝色的火焰……………013

从章太炎想起王佩诤……………015

人到晚年学说话……………019

叶圣陶的尊师情结……………021

校长的人格魅力……………024

变黄的作文卷子……………027

北方王大有座艺术馆……………031

惭愧……………033

垫过猪圈的名碑……………035

访旧须趁人未老……………037

可爱的“燕子”……………040

课文应收《隆中对》……………042

莫忘博物馆……………044

离筵壮歌……………046

人近七十学听话……………049

两块和田玉·····	051
从“一位罪犯”说起·····	054
龙年春节忆“沙龙”·····	056
任仲夷的幽默·····	058
“鉴定家”的堕落·····	060
有这样一位县长·····	062
青年歌手,请你理解·····	064
古战场上电话多·····	066
如果周庄当年·····	068
“余束发”是谁? ·····	072
上海女画家忆旧·····	074
红楼忆吴梅·····	076
上海人的心气·····	080
话说“洋泾浜”·····	082
名医的医风·····	084
华尔道夫饭店感怀·····	086
为“五分钟发言”鼓掌·····	089
“世外桃源”爱鸟情·····	091
云南鲜花论斤卖·····	093
换个角度谈张謇·····	095
变在不知不觉中·····	097
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099
踏雪想“闲事”·····	104
春夜听琴·····	106
柯灵在我家疗伤·····	108
革命的“铜豌豆”·····	110
香雪海之恨·····	112
惜哉! 樊伯炎先生·····	114
听中山先生当年的声音·····	116

“老泪”何以“浑浊”？	119
记者为何不“记”？	121
孟母碑前思“母教”	123
涸者如斯夫	125
昆曲欣逢又一春	127
难忘深深一鞠躬	130
漂亮的回答	132
有山无水又何妨	134
再谈母教	136
流风遗韵忆画坛	138
雨歇波平政亦闲	140
华年二十去如飞	142
黄浦源头说清浊	144
新《阅江楼记》	146
惊听洋人说评书	148
谢季老	150
蚕豆滋味究若何	152
“一样话，千样说”	154
站在“旱桥”看上海	156
刮脸刀的联想	158
巧得丁总新“教程”	160
明天毕业唱什么？	162
“吃不了的统统给我！”	164
好山何以不“入岳”？	166
艺坛勿忘吴湖帆	168
修车摊上话“瘦身”	170
莫把“大资”当“小资”	172
《登楼赋》回归记	175
谒柳祠，念公仆	177

谁在坐这“冷板凳”？	179
重游卢浮感慨多	183
初闻“健康长寿”	185
我与“的哥”常交往	187
盼盼的“逆反诗”	189
垃圾桶上的文字游戏	191
不爱长城非好汉	193
诗家情怀史家笔	195
陪着孙辈一起长大	197
“岂能如尽人意”？	199
季老病中写新书	203
五十年后才相会	206
温馨的小黄花	208
雪窗静思	210
回应“许嘉璐的话”	212
流光何曾把人抛？	214
求阙	216
李双江谈“拼文化”	218
邓颖超的“电话更正”	220
假的多了真变假	222
话说“认不得了”	224
请为爷爷奶奶写点书	226
猫的喜剧	228
安于当个“老头儿”	230
五年·百篇·四谢	233
京城餐韵	235
“艾培”还在期待	237
清华园的“孩子们”	239
老上海的“市声”	241

季老的“书桌”·····	243
“敬宜愚兄：您好！”·····	245
说“清”道“浊”看世界·····	249
飞车追薯·····	251
“千年文书好合药”·····	253
一缕幽香入梦来·····	255
听于丹，忆于廉·····	257
“幸福家庭寿星多”·····	259
寒鸦万点入城来·····	261
红绿灯前说“习惯”·····	263
一曲催眠忆儿时·····	265
他们为何想读《文心雕龙》？·····	267
“文”“白”之争情未了·····	269



## “人走茶凉”属正常

一直想就“人走茶凉”之说发点议论，但心存顾虑，因为那时还在“台上”，怕遭“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现在角色转换，到了“台下”，似乎可以“叟言无忌”了。

“人走茶凉”，是对炎凉世态的一种艺术概括。特别是阿庆嫂的一句“人一走，茶就凉”唱开之后，经常被人用来慨叹有些领导干部离退之后处境的变化。常言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老同志们的感受当然是真实的。比如，过去家里门庭若市，现在车马稀少了；过去请示、汇报、问候的电话不绝于耳，现在可能几天听不到一次铃响了；过去邀请出席各种庆典、宴会、研讨会、论证会的应接不暇，现在难得收到一份请柬了；过去生病住院，花篮、水果、营养品随着探望者纷至沓来，现在病房里变得冷冷清清了……凡此种种，抚今思昔，焉能无“人走茶凉”之叹！

然而，我倒认为，对于“人走茶凉”也需作一点具体分析，未可一概而论。“势利眼”者固然大有人在，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因素，如果不加区别，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

依我看来，“人走茶凉”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何以见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有一个妙喻，原话记不准了，大意是说：友谊好比一壶开水，一旦离开炉子就逐渐凉下来了。朋友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在位时朝夕相处，自然交往频繁，离岗后相见日稀，没有那么多要事向你请示、商量，“茶”的降温便成为一种必然。如果哪位领导干部退下以后，依旧宾客盈门，酬酢不绝，倒有点反常了，对本人而言，也未必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再说，你退下之后，当然比较清闲，而在位者工作都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老是向你嘘寒问暖？如果还期望人家“早请示，晚汇报”，未免有点近乎苛求。记得前几年有篇小说叫《电话》，写的是一位老首长离休之后，因为每天再也接不到那么多电话而闷闷不乐，日见消瘦。了解他心境的老伴只好偷偷关照旧部每天打个电话“汇

报工作”。这样做了果然灵验，老首长恢复了奕奕神采，家庭里也重现融融气氛。这样的人为“保温”，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领导干部离退休以后，某些待遇或礼遇确与在位时有某种反差。我觉得这也正常。“一视同仁”不等于不分轩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汉代大将军李广，在位时声名显赫，退休之后，有一天出城喝酒，回城时天色已晚，城门紧闭。扈从喊话要求打开城门，说是“故将军李广”回来了。不料城门官偏不买账，回话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况乃故也！”把李广气得够呛。后来李广被重新起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位势利的（也许是很坚持原则的）城门官宰了。我看这位大将军的器量未免太窄了些，“故将军”就是“故将军”，硬要和“今将军”攀比，岂非自寻烦恼！

我还有一个看法：“茶”的“保温”是个双向问题，要靠双方努力。俗话说得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见过一位老同志，退下以后，始终如一地热情支持、帮助在位者的工作，结果“茶”不但不凉，反而更热了。这虽属特例，也给人以启发。

有位年轻同志，在我“下岗”之前向我诚挚表示：请您放心，我绝不会“人走茶凉”的。我当即口占一首打油诗相赠：

人走自然茶就凉，  
不凉反而不正常，  
只要留得真情在，  
纵然成冰又何妨？

1998年9月4日



母亲、姐姐一起过个团圆年。在火车上，我做了一套散曲，憧憬家人相聚的欢乐：“燕山千里雪茫茫，辞榆关胸怀激荡。车挟惊雷走，心随飞絮扬，新柳千行，迎我把归程上。……剪烛话西窗，凝眸细端详，难的是历尽风霜鬓未霜，堪笑他未老韦庄怕还乡……”可是，春节还没到，机关里催归电报又到了。老母虽感失望，却没有留我，反而劝我说：“还是公事要紧，回去吧，以后有机会！”

从那开始，不好意思回家和不可能回家变成了顾不得回家。工作的一次次变动，担子的一次次加重，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回家过年的机会。每年春节来临之前，我总是安慰自己：“明年总差不多了！”谁知到1989年底，我终于请好了假，准备回上海的时候，突然噩耗传来：母亲去世了！我当天飞回上海，看着母亲空荡荡的房间，泪如雨下。人的一生总有许多遗憾，但是在长达37年的过程中竟然没能和母亲一起过一个春节，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张外祖父写给母亲的条子，上面写着：

盼大女佩秋不至：“膈膈膊膊窗前鸡，发发揭揭葭鲋肥，其雨其雨日杲杲，日归日归未归。”

水调歌头  
此解以当话别天地有情江山不老息壤在彼此岸匪遥证无生于佛证还我本来效祈死之祝宗则吾岂敢

真仙报道先生归去不待杏花春雨撒手便入天  
睡美倚佳趣何洗长眠别妻此辞戚友莫延  
延百年草如密客及此话离筵若论文章政  
事交卷一张白纸只索付云烟为问后来者大梦觉  
谁先？

先中民四月三十一日亥三解二十五日巽叟戏笔

水调歌头

曰者谓余今岁数当尽，然耶否耶，姑拈此解以当话别。天地有情，江山不老，息壤在彼，觉岸匪遥。证无生于佛，还我本来；效祈死之祝宗，则吾岂敢。

修短本前定，底欲若留连。十洲三岛假耳，甚处有真仙？报道先生归去，不待杏花春雨，撒手便入天。睡美得佳趣，何况是长眠！别妻儿，辞戚友，莫迟延。百年草草如客，及此话离筵。若论文章政事，交卷一张白纸，只索付云烟。为问后来者，大梦觉谁先？

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巽叟戏笔

外祖父是一位乐观豁达的人。当他病重之时，写了一首《水调歌头》，作为对亲友的话别。它和“盼大女佩秋不至”一样，反映了老人不同一般的生死观。

姐姐告诉我,这是家居苏州的外祖父在 1956 年病中催我母亲回去过年的:过年的鸡、鱼都准备好了,可是思念中的女儿却迟迟不归,免不了心有怨意。但怨而不怒,仍是那么幽默。因为他理解自己的女儿,不能回家过年是因为“公事要紧”。

我看了这张纸条,心里有点宽慰。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像外祖父理解她那样理解我的。

但是,我们的后代,还能不能理解这一切呢!

1997 年 2 月 15 日



## 大师与小卒

近来,在上海报刊上多次读到回忆已故国画大师吴湖帆先生的文章,令我不禁又想起少年时代受他教益的一段往事。

1947年,我在上海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由于学校经费匮乏,同学们发起了一次书画义卖。经过一番努力,把上海上百名书画家的作品几乎都征集到了,唯独吴湖帆的墨宝。当时,我仅17岁,业余从名画家樊少云的哲嗣樊伯炎先生学画,对吴湖帆慕名已久,初生牛犊不怕虎,便自告奋勇去登门求画。有人告诉我,吴湖帆名气大,架子大,求他的画极难,你是个无名小卒,此去非碰壁不可。我就抱着姑妄试之的心情,来到吴老的嵩山路寓所,想不到他竟慨然一口允诺。我怕他说了不算,便央求他当场挥毫,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怎么行?义卖也不能拆烂污。我不骗你,再过五天你来吧!”

五天以后,我一进吴老的梅景书屋,他就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卷,操着浓重的吴语,笑吟吟地说:“僚看我阿是勿骗僚格?”我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墨竹,挺拔秀逸,确实不是一般应酬之作。

从此,我课余便经常登门请教,他也从不厌烦。当时,梅景书屋几乎天天高朋满座,吴老一边挥毫点染,一边谈笑风生,我就默默坐在一边听着,从中得到许多知识。有一次,我临摹了民初上海名画家陆廉夫的一本山水册页,装裱好后拿给吴老请教,因为没有落款,吴老看了一眼就说:“唔,这是陆廉夫年轻时候画的。”我便故意跟他开个玩笑,说:“那就请太



这就是国画大师吴湖帆先生为我临摹的陆廉夫山水画册的题签。



秋声赋(临陆廉夫山水画册)

先生给题个签吧！”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在封面标签上写了“廉夫画册”四个大字，我急忙说：“啊呀，这是我临摹的！”他停笔惊讶地说：“是你临的？怎么办呢？”真不愧是名家，他略一思索，就另写一行：“敬宜范世兄临本属吴湖帆题签。”三十多年来，我辗转南北，历尽坎坷，可是这本画册始终珍藏在

身边。现在想来，当初真有点不知深浅，唐突前辈。

有一次，我向吴老请教临摹之道。他说：临摹要取法乎上，最好能从宋元名家的真迹入手。我说，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哪能得到古人的真迹。他想了一下，便站起来，打开画箱，取出一卷装裱极精的画轴，打开一看原来是元代名画家盛子昭的绢本设色山水。他说：“这幅画笔墨变化很多，借给你去临摹吧！留心揣摩，一定能大有长进。”把这样的珍贵文物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但是看他态度诚恳，便高高兴兴地接下来，并给他留下了我家的地址。这幅名画我临摹了数遍，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奉还。

不久以后，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匆匆过去，丹青荒废了，在绘事上没有像吴老希望的有所长进，但是他那种热心提携后进的精神，却使我永远难忘。

## 漫步巴黎忆恩师

人的思维活动是很奇怪的。有时一件已经几十年没有想起过的往事，会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突然出现在脑际，犹如风晨雨夕的故人不期而至。

今年5月，我访问法、比、荷等西欧国家。一天，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散步，颇为眼前风物所动。忽然之间，头脑里闪出一段文章：

巴黎恢恢，冠绝西欧。林麓翳荫，万物隶通。士女遨嬉，谈辞揆张，议堂扩千步，民政听宗。其气恢，其学说日新，其民英跼自慧，而心志发扬……

我苦苦思索，想不起这段话出自何书。直到回国以后，有一天才想起它出自唐文治先生《英轺日记序》。我熟读这篇序，已是50年前的事了。

唐文治先生是近代国学大师，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第一任校长，清光绪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902年），英王将加冕于伦敦，唐文治奉命出使英国庆贺，并应邀访问比、法、美、日诸国，“经途八万里，为时十七旬。滂滂地圆，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在当时可算是破天荒的盛大外事活动。他回国以后，将所见所闻写了一部《英轺日记》，使当时闭塞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在日记的序言中，唐文治慷慨陈词，极言西方诸国的强盛发达，呼吁中国卧薪尝胆，力谋自强，以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序文的最后，他想象着中国有一天出现这样的情景：

自兹以往，欧亚学界中，我庠士其且竞胜于礼义乎？我政家其竞胜于经济乎？我兵家其竞胜于武力乎？我农工商其竞胜于产殖乎？……

我是1945年在无锡国专沪校读书时亲聆唐校长朗读这篇文章的，当时他已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然朗读时声震屋瓦，声泪俱下，其忧国之情，使学生无不为之

动容。

50年过去了,唐老先生毕生憧憬的中国之强盛、繁荣,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现实。如果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知道他的学生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既扬眉吐气又感慨万千地走在他走过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并且默诵他当年“以卧薪尝胆之心,为拜手颺言之颂”的文章,应该欣然于怀的吧!

1996年7月6日



# 一张名片五十年

有一张名片，在我身边已经整整珍藏 50 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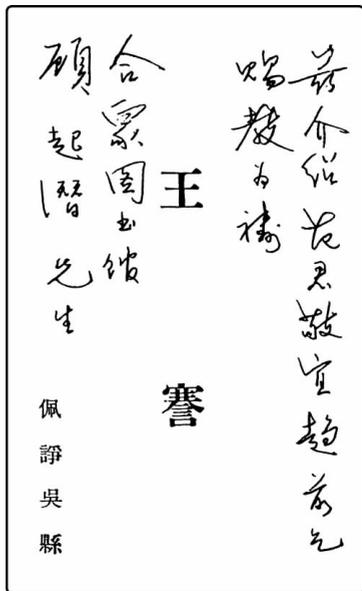
名片的主人是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骞（佩净）教授，在名片的空白处，有他几行钢笔手迹：

兹介绍范君敬宜趋前乞赐教为禱  
合众图书馆  
顾起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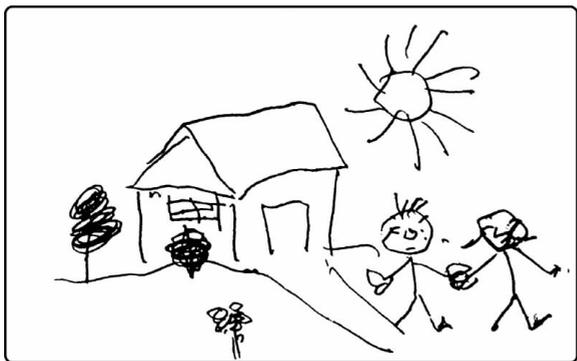
这位顾起潜先生，就是当代赫赫有名的版本目录学权威、上海市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记得王佩净先生写完最后一行时，特意向我解释：“起潜是廷龙的字，从《易经》上‘潜龙勿用’变化而来的。”

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张名片？这里有一段值得追忆的往事。

1946 年，我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读书，王佩净先生是目录学教授。他是吴县人，博闻强记，藏书极丰，课堂上旁征博引，海阔天空，引发了我对版本目录的浓厚兴趣。他见我好学，便对我说：“我介绍你去见一位年轻学者，他也是苏州人，现在任合众图书馆馆长。他如果赏识你，也许等你毕业后可以留你当图书馆员。”我喜出望外，当场要求王先生引荐，王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想写几句话，可是他有个怪脾气，平生不用钢笔，可一时又找不到毛笔，只好从我手里接过自来水笔，写了那几行字，还说了一句：“这是破例。”



这就是文中提到的那张名片。



这是那张名片的背面，是我儿子四岁时的“涂鸦”，为此他付出了“代价”，挨了我一顿打，至今我仍感到内疚。

遗憾的是，我接过了这张名片，却始终没有去拜见顾廷龙先生。可能是因为年轻，有点怯场；也可能因为后来兴趣逐渐转移。特别是解放以后，研究版本目录已成为“壮夫不为”的事情，我也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到了祖国东北，投身于党的新闻工作，从此与版本目录绝了缘。

不过，王佩诤先生的名片却一直由我保存着。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十年浩劫中，它也不曾从旧篋中被“清理”出去。特别是获悉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含冤而死的消息后，睹物思人，对这张名片更是加倍珍惜。我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手持这张名片，去见那位心仪数十年的“年轻学者”。

这个愿望直到今年夏天才实现。这时，我已65岁，“年轻学者”则已九十有四。

这次会面很有传奇色彩。8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蔡耕，到北京来向故宫博物院老专家王世襄约稿，闲谈中提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范某很想见顾廷龙先生，王老与顾先生是好朋友，慨然同意引见。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驱车前往顾老的京寓。

真想不到，年逾九旬的顾老竟是那么清健，眼不花，背不驼，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酷热难当，身上穿得整整齐齐，与不修边幅、身穿背心、手拎竹篮的王老相映成趣。

不等介绍，我就双手递上王佩诤先生的名片。顾老接过一看，立刻惊问：“哎呀，这是王先生什么时候写的？”我将原委说了一遍，顾老嗟叹不已，说：“王先生真是硬气，‘文革’中我和他一起蹲牛棚，造反派逼他写检查，他硬说一生没有写过，不会写。其实他哪能不会写，他是决不会写违心话的。”

接着，顾老问我，为什么把这张名片保存了50年，我说：第一，为了纪念前辈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第二，为了保存一个永远的希望；第三，我有个“坏”习惯，不轻

易丢掉故人的手泽。

顾老摩挲着那张发黄的名片，忽然发现它背面歪歪扭扭画着两个小人在太阳下手舞足蹈，便问我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这是我淘气的儿子四岁那年乘我不备在上面乱画的，当时我气得把他狠狠打了两下。

顾老笑了，用一口吴语说：“冤枉杀哉！冤枉杀哉！”

1996年10月31日



## 蓝色的火焰

因为从小生长在上海，平时对上海的新闻报道特别留意和关心。不论在东北，在北京，《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是我每天必看的报纸。

看上海的报纸，主要是想看上海的发展变化。最近几年，上海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世界瞩目，更令游子骄傲。打开每天上海的报纸，一桩桩新鲜事儿激动得你恨不得马上扑向黄浦江畔，饱览她焕发青春的姿容。然而，在千万条新闻中，最牵动我心的要数是1996年初关于上海70万户市民告别煤球炉的消息。我不止一次地向新闻界同行说，它比上海最后一辆黄包车送进博物馆的消息意义还要重大。

我是伴随着煤球炉长大的。小时候，上海滩上恐怕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靠煤球炉生活，我家属于普通工薪阶层，自然也不例外。每天清晨五点钟，批改了半夜作业的母亲就要起来生煤球炉，等到把早饭做好，她来不及吃一口就得匆匆赶路上班。看到母亲这样辛劳，我九岁就开始学会生煤球炉，想为她分一点忧。但是上海缺少引柴，几乎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都得积攒起来，用以生火，包括破篮、废盒、干橘皮、马粪纸等等。有一次，实在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材料了，急中生智把自己的一盒积木劈碎，一不小心把左中指砍去一块肉，血流如注，直到现在，指上疤痕犹在。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更重要的是家家生火，满城烟雾，毒化了环境，那时还没有“环境污染”这个概念，真不知有多少人因此得病而不自知。上海的冬天非常阴冷，贫寒之家多用煤球炉取暖，许多居民煤气中毒，解放前的报纸上，每到冬天，几乎每天都有全家煤气中毒死亡的新闻。多少悲剧发生在煤球炉上！

建国以后，上海居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许多居民用上了煤气。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还有相当多的普通老百姓依旧依靠煤球炉生活。直到八十年代，我家所在的弄堂还没有通上煤气，八十多岁的母亲仍然要天

天生煤球炉。每次我回上海，看到母亲还在弯着腰扇炉子，内心总有说不出的酸楚。但她总是乐观地笑着说：“快通了，快通了！”

遗憾的是，家里真的通上煤气，已是母亲去世四年之后。当我看到上海市 70 万户居民告别煤球炉的消息时，真是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心里默默地想：母亲，您生前虽然没有用上煤气，但如地下有知，看到千家万户笑逐颜开，欢庆生活中的这件大喜事，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出现的千万个大变化中，告别煤球炉似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经历过百年沧桑、了解围绕煤球炉发生的种种悲欢的上海人，才懂得这件“小事”的重大意义。人民就是从这样一件件“小事”中，更深刻地懂得了改革开放对国家、对社会、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懂得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里装的是什么。记得马克思的传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马克思的母亲说过：“炉灶是家庭幸福的基础。”这话蕴含着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呵！当煤气的蓝色火焰照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时，当新年来临合家团聚品尝着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佳肴时，人们怎会忘记为每个家庭务实幸福基础而作出努力的决策者和劳动者呢！

1998 年 1 月 2 日

## 从章太炎想起王佩诤

最近读第309期《作家文摘》转载的杨绛先生《“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文，其中提到当年吩咐杨绛先生为章太炎先生演讲做记录的是“教务长王佩诤先生”，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王佩诤先生是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学识渊博，藏书极丰。抗战前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振华女中等校执教，蜚声学界。杨绛先生文中说到在高中读书，受业于王佩诤先生门下，估计正是那个时期。抗战时期佩诤先生迁居上海，任震旦大学等几所大学教授，因课程太忙，委托我的母亲帮他批改学生作文。那时我只有十三四岁，经常由我把改完的作文卷子送到王先生家，就这样认识了这位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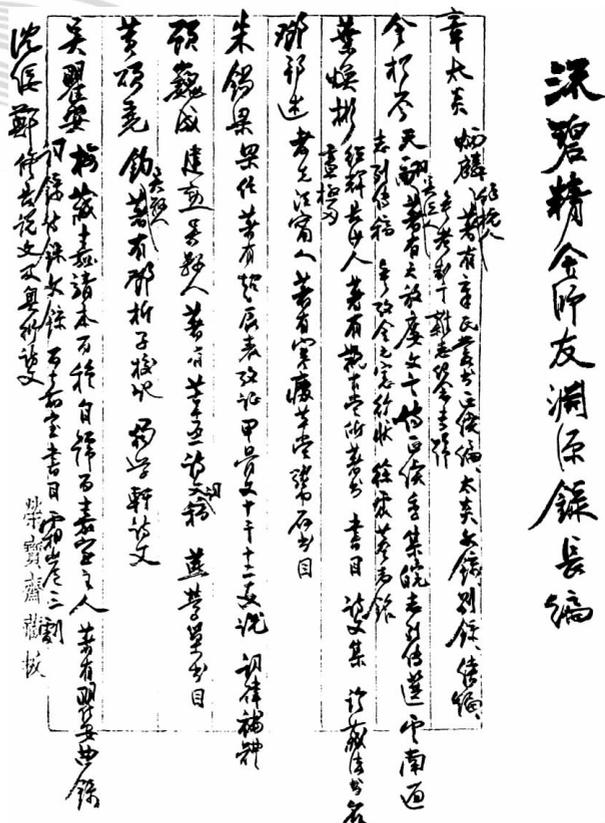
说来凑巧，后来我考取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佩诤先生也在该校兼课，讲授目录学和书画鉴赏学，我就成了他的学生。因为他和我外祖父是忘年之交，我一直按辈分称呼他为“太先生”。

佩诤先生为人耿介绝俗，具有许多中国读书人的特点。第一是绝少坐车，每天上下班，不论路途多远，都是安步当车，而且行走如飞。第二是常年一袭灰色派力司长衫，即使盛夏也从不着“短打”，上课时汗流浹背，也不宽衣。第三是上课从来不带讲义，一上讲台就信口开讲，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皆是学问。他讲目录学，课本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但讲的都是课本以外的知识。一个学期下来，《书目答问》只讲了个开头，“杂说”倒是记录了一大本，至今受用匪浅。第四是好买旧书，遇到珍本，不惜倾囊。他和上海旧书店的主人交往密切，并为每家旧书店都做了一首七绝，记其店名、地点、老板姓名、特点等，成为书林佳话。

有一次，佩诤先生在课堂上夸奖了一阵修文堂老板孙实君，当场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霞吕萨间五凤一，书林堂额号修文；主人记取今稀见，廉让谦冲孙实君。”他很得意地解释说：“霞吕萨间五凤一，是修文堂的地址——霞飞路、吕班路、萨坡

赛路之间的五凤里一号。这样简化,打电报又省事又省钱。”当时我是个调皮鬼,不知天高地厚,就在下面偷偷写了一首打油诗:“愚六〇八六〇王(佩净先生家住愚园路六百零八弄六十号),佩净夫子诗才广。出口成章霞吕萨,书店老板大兴旺。”不料此事被一位同学“告发”,佩净先生见诗大怒,连声说“坏极了”,走进课堂就用严厉的眼光扫了我一下,余怒未息地连连训斥:“颜良文丑,颜良文丑!”把我吓得半天不敢抬头。

据说,这是温文尔雅的佩净先生用三国人名训斥学生的双关语。中国文人连骂人都带典故的,据说章太炎先生就是如此。



《从章太炎想起王佩净》一文发表后,王佩净先生的曾孙王学雷给我寄来一本他曾祖父手迹的劫后余烬——《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流碧精舍”是王佩净先生的书斋名,在这本名录里,他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师友、学生的姓名、籍贯、特长和著述,不分长幼,一视同仁。其中章太炎列第二页第一条:“章太炎 炳麟,著有章氏丛书正续编、太炎文录、别录、续编,参考《制言》杂志纪念专号。”第五页第四、五条为钱锺书和杨绛:“钱默存 锺书,无锡人,善英吉利文及诗词”,“杨绛 季康,善小说、戏剧、编著。”意想不到的,我的名字也列在第三页第三条:“范敬宜 著有《小游园诗文存》,善山水。”当时我可能仅十六七岁。

汪介玉 景至子佩學 好易解字也  
 尤敬宜 著有少陰園詩石 子青山水  
 陶冷月 歸了未水 為馬 若有風雨 屢擊 手畫 石 中 古 子 產  
 朱厚園 丁青山水 好畫  
 吳頌帆 著有極影 子青山水 刊了山水  
 吳子深 子青山水  
 陳 暉 子青山水 人 畫 水 花 卉  
 黃匡胤 一室 悅 公 序 認 人 子 青 畫 法  
 錢仲猷 學 如 帶 熟 人 著 有 昔 花 金 堂 詩 石  
 吳子俊 華亭人 子青山水  
 錢熙石 錢 著 無 解 人 子 青 文 工 詩 詞  
 楊 峰 子 青 丁 青 也 悅 戲 劇 詩 著

元思墓誌 正始四年 無標題 石 高 廣 各 一 尺 七  
 王諱思守 永合 河南 洛陽 人也  
 恭宗景穆皇帝之孫 侍中 征北 大將軍 樂陵 王之  
 子 王志業 沖遠 徽若 宿著 德併 區宙 功輝 四表 歷  
 奉三 星禮 握早 隆神 機從 御授 後道 之寄 風教  
 舊鄉 振光 雲伐 自撫 蒸地 愚凶 革化 移牧 魏壤 連  
 醜 政識 自東 自西 無不 開詠 方澄 政三 才拙 調九  
 列 吳天 不年 雲光 夙沒 忽以 正始 三年 歲次 丙戌  
 五月 乙丑 朔六 日庚 午過 疾十 二日 丙子 春秋 卅  
 薨於 正寢 歲次 丁亥 三月 庚申 朔廿 五日 甲申 定  
 於 涇湖 之濱 山陵 東 博國 襄朝 彦家 絕嗣 軌  
 東吳 王氏 農  
 輒 開 綺 腹 校  
 天子 加悼 乃贈 鎮北 大將軍 遂刊 石 追 蘭 表 率 幽  
 美 其 諱 曰  
 魏 魏 皇 者 日 月 齊 命 玉 幹 天 樞 莊 侍 金 暎 廟 竿 幽  
 通 闕 蘭 神 性 德 元 四 海 弱 冠 從 政 昂 昂 朝 首 三 帝  
 炳 威 含 章 內 秀 獨 絕 水 鏡 美 不 可 譽 善 不 可 名 何  
 忽 茂 年 穉 焉 墜 璋 掩 光 寒 蒸 閉 目 背 時 痛 實 國 道  
 九 歲 同 悲

这是王佩诤先生手抄的《元思墓志》原件。他的曾孙在《新民晚报》上看了《从章太炎想起王佩诤》后，特意寄赠给我作为纪念。这页手稿的端楷写得一笔不苟，可以想见他治学的严谨。

想不到这样一位博学儒雅的老先生,在“文革”期间竟遭残酷迫害,家藏图书散失殆尽不说,他本人多次被迫站在弄堂里的垃圾箱上挂牌挨斗,但他从不违心“认罪”。上海市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生前告诉我,“文革”中他和佩净先生同住一个牛棚,造反派勒令佩净先生写检讨,他硬是不写,说:“我什么都写过,但从来不会写检讨!”说到这里,顾先生连连说:“王先生真是个硬骨头!”

1999年3月28日



## 人到晚年学说话

人到晚年，万事休歇，不免俯仰平生，总结得失，这时忽然感悟：尽管在报海沉浮了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

所谓没有怎么学会说话，并非说自己说的话让人听不懂，而是说把光阴花在学套话、官话、空话上太多，而群众要听的、愿听的、爱听的话却越来越说不利落，很少能说出可以说到群众心坎儿上的那种话。

这个感悟，是由一件小事引发的。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虽然在北方工作、生活了将近50年，仍然十分关注上海的情况。近几年，上海变化极大，许多朋友都劝我回去看看。对此，我深信不疑，然而迟迟没有成行，缺乏那种冲动。原因是有关上海的发展变化，新闻媒介报道得十分充分，无非是楼高了，路宽了，地绿了，天蓝了，车快了，等等。即使不身临其境，也能想象个大概。

可是，后来我竟让一位年轻人说动了心，这是《新民晚报》的青年编辑。在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她能否讲几件可以说动我回上海的事情，她当即举了三件，都是没有怎么上过报纸和荧屏的：第一，公共车辆在马路上转弯时不再“敲帮”了；第二，公共汽车司乘人员不再推乘客的腰背了；第三，商店里不再喊话，提醒顾客“注意钱包”了。

果然灵验，这三件小事把我吸引到了上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赘）。

这里，需要向不熟悉上海情况的读者解释几句。第一，关于公共车辆“敲帮”：由于过去上海街道普遍比较狭窄，公共车辆到站或转弯时，售票员总要探身车外，用木板猛敲车帮，要路边车辆行人让路。现在不用“敲帮”，说明路面拓宽，或调整了行车路线，路况大有改善。第二，关于不推乘客。过去上海公共车辆特别拥挤，车一到站，乘客蜂拥而上，有的吊住车门不放。司机无奈，只好下车粗野地连推带

揉,把乘客塞进车内。现在不再推揉,说明公共交通问题有了缓解。第三,关于商店喊话问题。过去大小商店总有一两个戴着红袖章的退休老职工,坐在两米多高的凳子上“监视”店内往来人员,防止扒手。现在没有了,说明在商店增多人也就不那么挤的同时,治安情况有所好转,或者商店的管理办法也改进了。

今年春节,我到上海之后,经过细心观察,证明那位年轻编辑所言不虚。这三件事情虽小,且不易为外地人觉察,其实反映的却是大问题,即上海市的党政领导,确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像这样为普通市民津津乐道、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的事情,为何不见有人把它写成《上海最后一辆黄包车送进博物馆》那样的新闻,作为报纸和荧屏的头条呢?如果写好了,很可能被评为中国好新闻一等奖的呀。

如果埋怨我们的新闻记者缺乏新闻敏感,那是不公平的。我首先自问:你当过多年报纸总编辑,虽然也经常鼓励记者写“原汁原味”的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新闻,但是,如果哪位记者写了这样三件小事的新闻,你有胆识把它放到要闻版的突出位置吗?你会不会也批评记者“缺乏高度”“缺乏深度”,要求彻底改写,使它变成一篇新闻八股?

看来,尽管我们天天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群众,实际上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不容易冲破框子,放下架子,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向他们学习如何讲话,如何表达。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最感人之处,即在平易之中。因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是实实在在,而不是成串的“高级形容词”。

龚自珍有首论诗的诗:“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为诗如此,为新闻何独不然!

(原题为《感人即在平易处》)

1999年5月1日

## 叶圣陶的尊师情结

叶圣陶是我最崇敬的前辈作家，我从小就爱读他的作品。给我以终身影响的是两本书，一本是《稻草人》，一本是他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前者教我如何做人，后者教我如何为文。

可惜，我只见过一次叶老，而且只有短短半个小时。即使这样，他的道德风范也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叶圣陶题字

由于种种原因，我在 50 岁以前一直无缘见到叶老。1984 年秋，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很想马上去拜访他。可是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好，双目接近失明，平时杜门谢客，我便不好意思去惊动他。1985 年秋天，听说他病重再次入院，我预感来日不多，只好托人递话：“当年草桥中学蔡校长的外孙想来探望，切盼破例一见。”

蔡校长，是我的外祖父蔡晋镛（云笙），苏州草桥中学（现苏州市第一中学）的首任校长。后来的文学家叶圣陶、历史学家顾颉刚、大画家吴湖帆，都是该校第一期学生。记得我幼年时经常听到外公提到他们的名字，并以此自豪。现在我特意提起外公，无非是希望叶老能重视这层关系。

果然，叶老很快就答应见面。我喜出望外，如约来到北京医院。走进病房，却不见叶老，正感奇怪，叶老的女儿叶至美告诉我：“老人家听说老校长的后代要来，非常高兴，现在正在里面洗脸、换衣服哩！”

正说着话，叶老从卫生间出来了。他穿着一身熨得很平整的玄色中式便服，一双很新的圆口布鞋，好像要会见的

是什么贵客。显然，他看不清楚我，只能顺着我说话的方向，抱拳作揖，连声说：“蔡先生的外孙来看我，实在不敢当，不敢当……”

我扶叶老在沙发上坐定，向他表述对他的仰慕之情，他就深情地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蔡校长：

“那是1907年，我14岁，蔡先生是30岁。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就在苏州一批士绅支持下，把这所新式学堂办起来了，那时叫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是它的俗称。”

“当时的校舍、设备非常简陋，可是聘请的都是第一流的教师。不用说别的，连美术教员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像陈迦庵、樊少云。后来草桥中学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包括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教育家，主要原因是有一大批高质量的师资，使学生在中学时代就打好了基础。”

叶老说这些话时，脸上洋溢着对师长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他说：“你外公当这个校长真是苦啊，一年到头住在学校里，连过年也不大回家。一生长衫，两袖清风，真是为人师表。他不但教学生读书，还教学生品德、礼貌。上百个学生在饭堂里吃饭，一点声音也没有，碧碧静，碧碧静……”“碧碧静”，是地道的苏州话。

“蔡先生教我们唐诗，每个星期都要学生练习在课堂上当场作诗。他在黑板上出题目，学生就在下面作，他也在上面陪着作。学生写一首，他要写五首。我现能



一九一二年时，公立一中毕业生合影，后立右一为叶圣陶，中立者为袁希洛。



苏州草桥中学首任校长蔡晋镛

写两句诗,都是蔡先生当年逼出来的。”

我问叶老:外公在草桥中学的时间为什么不长?他说:“蔡先生是被逼下台的。当时有个当官的,硬要把成绩很差的儿子塞进草桥中学——用现在的话说,是走后门,蔡先生坚决拒绝。后来眼看顶不住了,就愤而辞职,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办学校了。”

这件事,我后来在全国政协开会时,也听叶至善先生讲过,可见叶老平时也常提起。这是后话。

我又问叶老:这些往事都过去六七十年了,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叶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个人一世除了父母,影响最大的是老师,怎么能忘得了呢?”

当我起身告辞时,叶老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非要把我送出病房。我再三拦阻,他说:“不可以的。看到你,也等于看到蔡先生了。”等我走出十多步,再回头时,只见他还站在那里抱拳目送。一瞬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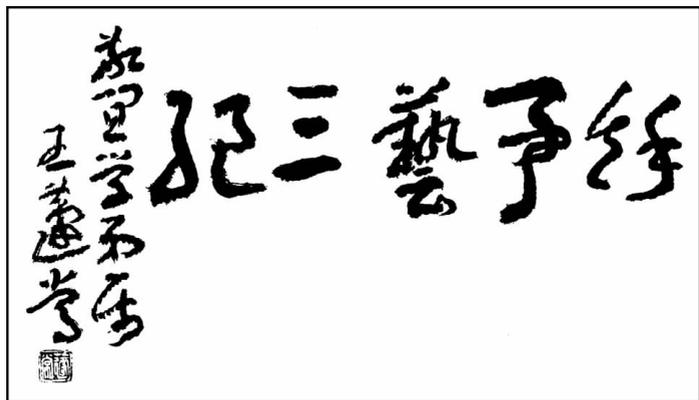
1999年5月21日



## 校长的人格魅力

上次的“随笔”，我写了《叶圣陶的尊师情结》，不少读者为前辈深厚的师生情谊感叹不止。有一位大学校长对我说：“现在不用说同学生一起作诗，恐怕连一学期听一次课的机会也不多了。”

由此我忽然想到校长的人格力量，或曰人格魅力。凡是卓有声望的学校，总是和德高望重的校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提起北京大学，就会想到蔡元培；提起复旦大学，就会想到陈望道；提起东北师大，就会想到成仿吾……校长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把各个领域的著名教授、学者吸引到自己的学校，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学环境。这种环境，不是单纯依靠物质条件所能换来的。



这是王莲常先生 80 年代为我的画册题词：余事艺三绝。

当时王先生已病重，闭门谢客。我从沈阳回上海去探望他，并拿出自己的诗画请他指教。王先生非常高兴，提笔拟为我写字。他的女儿劝阻他，他说：“这是我的学生，应该写的。”便在画册上题了这五个字，并向我解释，“余事艺三绝”典出郑板桥。不久，先生即辞世。这是我手头唯一保存的先生手迹。若干年后，著名画家应野平看了先生的题词，凝视良久，惋叹地说：“这样古朴厚重的书法没有了。”

谈到这些，我总是十分怀念给我一生重大影响的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所曾经培养过像钱穆、唐兰、王遽常、钱伟长、周振甫等等著名学者的学校，在抗战中为了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颠沛流离，辗转西南，坚持办学。直到抗战胜利，复校上海。我就是那年考入该校的。当时，校址借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乐群中学二楼，总共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条件之简陋，恐怕还不如今天最差的短期补习班。可是，这里却集中了当时上海文、史、哲方面最著名的教授、专家，如：周谷城、周予同、王遽常、朱东润、黄云眉、王佩净、朱大可、童书业、魏建猷、唐尧夫、金德建、吴丕绩、鲍鼎、方诗铭、陈小翠、顾佛影、刘诗荪等等，可谓名流荟萃。即使在当年上海第一流的大学里，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自然熏陶出一大批后来卓有成就的学生。像我这样的，只能算是基础很差的“小弟弟”。

值得回味的是，这么多教授、学者到无锡国专来授课，都是兼职尽义务的，顶多收一点车马费。在那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代，他们肯不计任何报酬来教课，实在太不容易。记得教我们“汉魏六朝文”的吴丕绩教授，贫病交迫，走上讲坛往往气喘吁吁。有一天讲江淹的《恨赋》，读完第一句“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就眼望窗外，叹了一口气说：“今天米又涨价了……”真是令人心酸。他们为什么肯于这样作出牺牲，甚至比在本校教书更加投入？主要原因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唐文治老先生。

唐文治是近代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曾在晚清任农工商部侍郎，后来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退休后又创办无锡国专，弘扬祖国文化。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江南沦陷后，年逾八十、双目已接近失明的唐文治，毅然带领全校师生西迁，一路风餐露宿，艰难困苦难以描摹。后来在广西苗族地区农村坚持办学，弦歌不绝，直到抗战胜利。他这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博得教育界的同声赞扬。在沪复校后，他已双目完全失明，而且身患膀胱癌，但仍扶病每周一次来校讲课。因此教授、专家只要“唐老夫子”出面延聘，无不慨允，甚至认为是一种荣誉。

他的声望不仅在教育界如此，在其他各界也是如此。记得1948年，学校因政府停发经费，陷入极度困难。学生们建议由唐校长出面，请求上海著名书画家帮助，办一书画义卖，筹款以解燃眉之急。我和同学拿着唐校长盖章的信函，登门拜

访了当时第一流的书画家，有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吴子深、贺天健、樊少云、马公愚、沈尹默、王福庵、王季迁、朱梅邨、陆抑非、唐云、白蕉、石伽、樊伯炎、庞左玉、吴青霞、应野平等八十余人，无一拒绝，有的还当场挥毫交卷。义展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行，非常成功。事隔二十多年，当年的教务长王邃常教授还对我说：“这就是唐老夫子的人格力量！”接着又问：“你还记得那封征求书画的信是怎么写的吗？”我答：“记不清了，只记得唐老夫子口授了一句：‘俾膏火之资得继，束脩之奉无缺。’这是点睛之笔。”王先生闻言恍然。

1999年6月6日



## 变黄的作文卷子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相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不少50年前学生时代的作文卷子。

这些卷子已经发黄变脆，但是当年老师批改的笔迹宛然如新。它们跟随着我走南闯北，历尽劫难，始终珍藏在自己身边，完好无损。

起初保存这些作文卷子，不过是想留下一点大学时代的痕迹，唤起些许校园生活的旧梦。可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这里渗透着当年老师们为精心培育学生付出的心血。

当时大学的语文课，每周必做一次作文。一个班一般有四五十名学生，就有四五十份卷子，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对于老师来说，这是多重的负担！况且那时的教授，为生计所迫，多半在几所学校兼课，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可是他们总是按时批改，按时发还。发卷子那天，是学生最兴奋也最紧张的日子。特别是得到高分和好评的，更是一个个喜形于色，如获至宝。

按照当时的规矩，老师批改作文，必须逐字逐句断句、加圈、加点、润色、写眉批、写总评。有时批改一篇作文，所费时间不亚于写一篇文章。经过高水平的教授改过的作文，成色迥然不同，使学生受益匪浅。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位教授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一位是无锡国专教辞赋的吴丕绩先生，一位是圣约翰大学（院系调整后并入复旦大学）的王欣夫先生。

吴丕绩教授修改文章的特点是：着墨不多，重在删繁就简，画龙点睛。有一年雪后，他命题作《小园赏雪赋》，我在文中有一段：“……三千世界，似蒙素靄；十二亭台，如饰琳琅。使百尺长松益增虬结之势，千林枯木似缀鹤羽之素。梅萼盈枝，添江渚之春色；蟾光耀霁，招裙屐于晚渡。”看似华丽，实为堆砌。吴先生改为“……三千世界，一片冰清；十二亭台，万竿琳琅。长松益增虬结之势，老木似缀鹤羽之素。而梅萼盈枝，香添孟春，蟾光耀霁，祥徵岁暮，犹其余事也。”这一改，文字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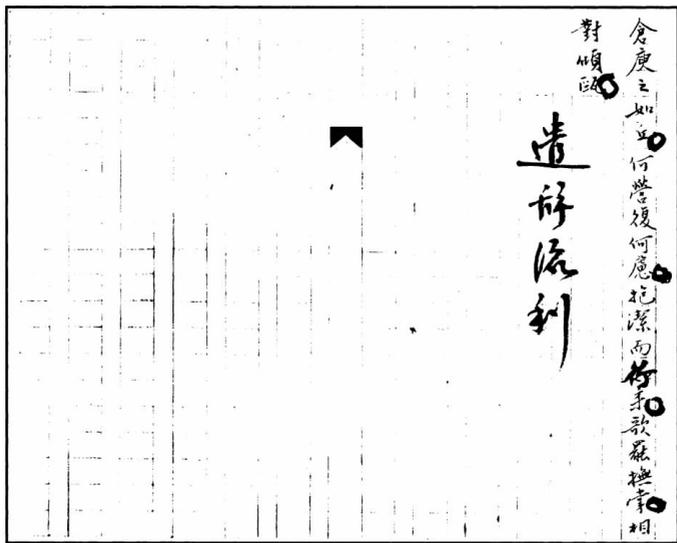
小園賞雪賦

范敬宜

此賦那無家林  
以用之也後世看  
此類此言不少

炳居之倪首小園真雖無嘉木翠華而倪松風  
 竹龍之范子謀餘之暇與憂想息其向  
 既白則已駕之補指庭院建於旦叩卷之開江  
 形雲滋潤新紫於冰底添長錦念生寬及夫東方  
 既白則已駕之補指庭院建於旦叩卷之開江  
 梅吐蕊滿雪烈遠而不意清多獨奈身執疏影而道  
 四對玉素以舒情致空喜而起相將就遠正則寒禽  
 飲翅荒煙無人竹梢紅也梅色全發置身其間遠矣  
 乍登瓊宇便胸中俗慮空容曰瓊閣滿世  
 勞心以悅我此生又漫馳物素於名教獵得於名  
 其能免池魚之殃完復巢之卵而得徜徉于斯亦正

不讓武陵渡也獨增丈銀紫以錦難抵楚軍之鏡  
 花惟選雅供堂尉之意徒使苑者添益增仰屋之  
 嗟身范子謀餘之暇與憂想息其向  
 物乎大川之氣凝于大堂朔風助勢造化偏工  
 嗚呼或銀光照著能映珠簾之扇重疊紫塵  
 惠之題亦夜可便更士開履驗香飲殿  
 千世界十二亭臺  
 益增此結之勢个球格本似銀鶴則之香松  
 瑤池  
 事也若乃稱善擊斤而款曰氣益全登者遊歷全終  
 桂羅素深兮騎鶴呈睡吁于汀洲北南故之堂檢秋



这是经吴丕绩先生修改的拙作《小园赏雪赋》，当时仅得 75 分，可见要求之严。

简练多了。我在文中还有“彤云密布，柳絮纷飞”，“鸳瓦铺霜，庭院堆盐”之句，吴先生在眉批中提出批评：“柳絮虽有典实，于此用之每使读者误会。以霜比雪亦不妙”，遂将“柳絮纷飞”改为“六出纷飞”，将“铺霜”改为“被素”，“堆盐”改为“如银”。真可谓字斟句酌，煞费苦心。谁能想到，这样呕心沥血的教授，当时正是生活窘迫，重病在身！

王欣夫先生擅考据之学，他批改作文，重在叙事准确，议论恰当，反对夸饰臆断。他批改我写的《文章杂论》，多为去虚务实。如我写道：“屈宋之辞赋典丽淳古，左氏之春秋序事精密，开后世词章古文之蹊径”，王先生眉批：“左传当继《书》《诗》而次孟、庄之前”，将这两句颠倒过来，改为“左氏之春秋序事精密，屈宋之辞赋情致悱恻”。这样不仅次序得当，而且对仗工整。我在文中推崇曾国藩的古文，而将恽子居列后，他在眉批中指出：“恽在曾前”，改为“稍前则首推恽子居”。谈到晚近古文，我推崇林琴南：“林畏庐以桐城古文，迻译泰西小说，叙情叙事，俱属上乘”，王先生的眉批是：“晚近古文当以马通伯、陈伯严为名家，畏庐荏弱不足数。”实际上是提醒我对人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老师们批改作文的认真精神和学识修养，不仅令学生由衷佩服，而且在后来的

工作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担任总编辑的时候，每当审稿、改稿稍有懈怠，往往想起老师的手泽，于是那些发黄变脆的作文卷子又浮现在眼前，似乎在督促我，鞭策我，告诫我勿负师恩、勿忘师训。

1999年6月19日



## 北方工大有座艺术馆

不久前到北方工业大学开会,无意中发现它有座艺术馆,很觉新鲜,便进去浏览了一番,感慨良多。

这座面积约有 500 平方米的艺术馆,成立于 1986 年,其中收藏了许多我国当代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陈列室共分书法、国画、陶瓷和民间工艺四个部分,展品多为名家之作,如启功、刘炳森、沈鹏的书法,吴作人、萧淑芳、黄胄、白雪石、韩美林、黄筠的绘画,以及泥人张、景德镇、瓷州窑等的各种泥塑和陶瓷精品。虽说不上琳琅满目,却也相当可观。除陈列以外,艺术馆还举办各种活动,著名漫画家、版画家华君武、彦涵等都曾在此办过展览会,并亲自为学生讲解。学生社团也常在馆内举行笔会。据说,平日到艺术馆来参观的学生很多,艺术馆成为学生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园地。

一个工业大学,为什么如此重视艺术,而且艺术馆坚持十余年而不衰?北方工大的领导同志这样回答: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们说:艺术是人类追求美、创造美的结晶,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不仅可以丰富高校师生的生活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培养审美理想和美的感受、鉴别、欣赏、创造能力,而且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也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听了校领导这番具有远见卓识的解释,我深深感动。在一般人看来,一所工业大学,学好专业技术知识就够了,有什么必要办艺术馆?他们不了解,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李政道说得好:“科学与艺术是一枚铜币的两面。”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缺乏艺术修养(或曰“艺术细胞”),他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和成就,必然会受到限制。而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总是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这已被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的实践所证明。周培源、李四光、杨振宁、李政道等就是最好的

例子。当然,反过来,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如果对科学技术一无所知,其成就也一定有限。

记得钱学森同志在 1990 年授勋大会上作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答词,大意是:他在科学研究上有今天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夫人蒋英。蒋英是著名古典女高音歌唱家,是她给了钱学森诗情画意,使他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从而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不是深刻理解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是绝说不出这番富有哲理的话的。

因此,在离开艺术馆的时候,应主人的要求,题了兩句话:“含英咀华,物艺相通。”

1999 年 6 月 30 日



## 惭 愧

星期天逛书店，发现新出版了一部《安徒生童话》，忽然想起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外孙女盼盼，该是能够看懂这类童话了，便花 78 元买下一套，想给她一个惊喜。

在把书送给她之前，我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于是祖孙两人发生这样一场对话：

“盼盼，爷爷给你买了一样礼物，你一定会非常高兴。”

“是吗？太好了！买的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先不告诉你，你猜猜。”

“吃的？”

“不是。”

“玩的？”

“不是。”

“穿的？”

“也不是。”

“用的？”

“更不是。”

“那我就猜不出来了。告诉我吧！”

“是看的——一部《安徒生童话》。”

“哇噻！我真没有想到！”盼盼在电话那头欢呼起来。

孩子的欢乐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她猜我买的是吃的、玩的、穿的、用的，唯独“真没想到”是“看”的？看来问题出在我的身上。

细细想一下，从她出生以后，我确实给她买过不少吃的、玩的、穿的、用的，可是

“看”的还真屈指可数(其实她的书并不少,只是由我买的太少)。这就难怪她猜不到我会给她买书了。问题在于不是我买不起,而是想不到。想到这里,我不禁暗自叫声“惭愧”。

我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书香门第。小时候,似乎没有享用过多少奢侈的食品、玩具、衣着和文具,但书是从来不缺的。当我像盼盼那样年纪时,已经看过许多著名的童话、神话和历史故事。依靠中学教师微薄薪水生活的母亲,每年暑假收到续聘的聘书之后,总是先给我去订几份《儿童世界》之类的杂志,因此我从小就懂得聘书的重要。她每天下班回家,总要带回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万有文库》,我的许多知识就来自这种薄薄的但内容丰富的少年读物。我17岁那年,她变卖了首飾,为我买到一部旧的《四部丛刊》,这成了我家最贵重的财产。寝馈其间,仿佛遨游在知识的汪洋大海。至今回想起来,我总是深深感谢母亲给我的这份丰厚礼物。

比起我的童年来,今天的物质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为什么反而想不大到新生代精神上的需要呢?为什么一方面经常慨叹今天的学生文史知识贫乏,一方面又不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益智条件呢?为什么当他们考试取得好成绩后,首先想到的是带他们去吃一顿“麦当劳”作为奖励,而不是去买几本好书作为礼物呢?难道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后价值取向的必然变化吗?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无一定的普遍性,只是想着自己今后至少不能再让孩子们收到书的馈赠时发出“真没想到”的惊叹;至少应该在看到他们像海绵一样吮吸着好书的营养时,少一点惭愧,多一点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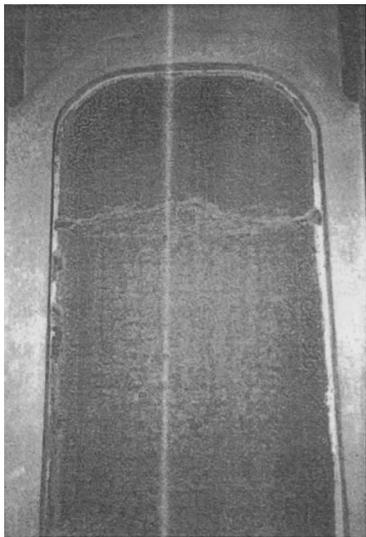
1999年7月19日

## 垫过猪圈的名碑

杭州远东外语艺术学校校长范国强，为寻访先祖范仲淹的遗踪，去了一趟富春江严子陵钓台，来京时给我带来一些照片。他抽出其中一张问我：“你还记得这块碑吗？听桐庐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它的发现还和你有些关系呢！”

我接过一看，照片上的古碑已严重残缺，碑文斑驳，难以辨识，只有第一行还依稀可认——严先生祠堂记。

我立刻回忆起来。1983年夏天，我到杭州参加《文汇报》召开的特约记者会议。会后，报社组织大家去游览富春江。我对富春江慕名已久，到了那里自然要去凭吊严子陵钓鱼台。那时，“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严子陵祠堂正在重修，老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重新题写的匾额已经高悬门楣，唯独未见范仲淹撰写碑文的著名宋碑



《严先生祠堂记》。碑中裂痕即“文革”中被砸断的证据。

——《严先生祠堂记》。询问陪同的当地干部，他们说已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砸碎，现在不知去向。我惋叹不止。

在上山的途中，我突然发现路旁农家的猪圈里，横卧着一块拦腰断裂的石碑，上面布满污泥猪粪。出于好奇，我弯腰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就是《严先生祠堂记》么。

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同行的县、乡干部都过来围观，喜出望外。遗憾的是由于长期被雨水和猪粪腐蚀，碑文已经模糊不清。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我们一定要尽快把它修复，让它重见天日，回到严先生祠堂里去。记得那天，我在严子陵钓台

上临风遥想，千年的历史风云一齐涌上心头。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追思着可歌可泣的民族灵魂。我心中默默背诵着范仲淹歌颂严子陵高风亮节的名句：“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古文观止》里，范仲淹的文章仅收录了两篇，一篇是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另一篇就是这《严先生祠堂记》，可见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就是这块铭刻千古名文的名碑，在十年浩劫中竟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沦落为猪圈的垫板，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剧！然而在当时，类似的悲剧何止万千。

从严子陵钓台归来，忽忽已是十五六年。虽然经常想起这次奇遇，却未曾打听听过这碑的最后命运。现在它终于有了归宿，尽管又经过多年风雨侵蚀，它的碑文更加模糊，还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桐庐市的同志，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对历史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块碑可能至今还埋在泥淖之中——就像有些地方还在不断重演“牧童打碎龙碑帽”的荒唐故事那样。

1999年8月7日

## 访旧须趁人未老

十多年前，有位长我十岁的朋友给我来信，感叹地写道：“杜甫有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现在连自己也快成鬼了……”言下颇有责我久疏往来之意。

当时我才五十出头，对这位老友的心情尚无深切体会，相反还嗔怪他过于低沉。来日方长，何至如此感伤？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开始明白他的感叹并非无病呻吟了。

我本是个念旧的人。很多几十年前师友的尺缣寸楮，我都视若珍宝，不忍舍弃，总盼有朝一日见面可作叙旧的话资。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频繁的动荡，紧张的工作，使得彼此相见日稀，甚至音讯中断，到后来连电话问候的念头也越来越淡化了。那时总拿“来日方长”自我安慰，待到近年一位位恩师、一个个挚友相继谢世，才矍然惊觉：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来日方长”已经变成“去日苦多”，许多事情追悔莫及了。

我一生中最大憾事之一，是始终未能见到国画大师王个簃先生。1947年，我16岁那年，无锡国专举行一次书画竞赛，王个簃先生应邀担任评判，我的一个仿陆廉夫山水长卷被他评为第一名，评语是“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之地”。当时我真是惊喜交加。外祖父谆谆叮嘱我：“这就是你的恩师，你应该马上去拜望表示感谢。”我却因王先生家住离市区较远的法华镇，迟迟未去。后来我远去东北，而且撂下了画笔，没能夺成“画人一席之地”，更无颜登门了。直到1982年，环境好转，画了一本仿石涛山水册页，托人送到上海，请王先生为之题签。不久，画册回来了，王先生题了满满一页，不但有诗，还有跋：

层峦高耸翠，妙笔自生风，

醉心大涤子，展纸乐融融。

敬宜同志酷爱石涛山水，兹册笔墨精妙，一再展读，十分钦佩。回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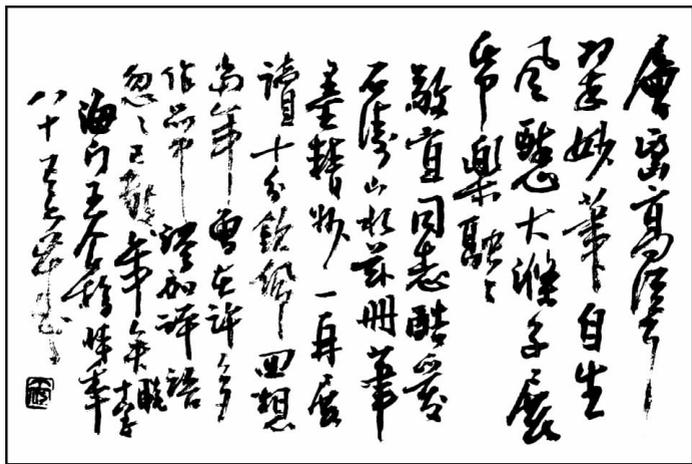
当年曾在许多作品中谬加评语，忽忽已数十年矣。

海门王个簃 时年八十有六岁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无名后辈竟然记得那么清楚，而且依旧奖掖有加，实在令人感动。这回我下定决心，回上海时一定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谁料未等实现，他就遽然逝世了。我抚册追思，痛悔不已。

另一件憾事是对黄嘉德先生的失信。黄先生是当年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新闻系主任，曾在林语堂创办的《西风》杂志担任主编。可以说，他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考试，他命题作《我最喜欢的报纸》，我写的那篇得了他的“最高分”——90分。这份留着他蓝铅笔手迹的考卷，我一直珍藏在身，盼望业有所成之日，拿着它向他道谢对我的鼓励。不料到四十年后在北京重逢之日，我却因过于兴奋，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竟忘了带上那份卷子。黄先生虽不无遗憾，还宽慰我说：“没关系，明年我还来北京。”谁能想到，事隔不久，他猝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明年”了。

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我结识了许多作者和读者，但多属“神交”，书信往来虽频，却从未谋面。其中最为遗憾的是国家体委一位名叫何启君的老同志，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对周总理感情极深。我们的书信交往，是从他给《人民日报》投稿纪念周总理开始的。在两年多时间内，《人民日报》发表过他十来篇文章，热情洋溢，文笔优美。前年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在那段日



这是王个簃先生 86 岁时为我的石涛山水临本的题词。

子里,他天天闭门撰写回忆文章,经常夜以继日,泪流满面。由于思念过切,心脏病复发,只好住院治疗。入院之前,他给我写信,约定十月份一定见一次面,并要我为他写一幅字,见面时交卷。我天天等待这第一次握手,谁料等来的竟是他的噩耗。据说他临终昏迷时还喃喃呓语:“周副主席开会了……”后来他夫人给我看他生前的日记,多处记着“范敬宜来信”“范敬宜来电话,要来看我……”

一次又一次的遗憾、追悔,使我终于总结出一条:访旧须趁人未老。汤显祖的《牡丹亭》有一句曲词:“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这说的是青春年少的男女,而一旦到了耳顺、古稀之年,就没有这种贱视韶光的资格了。且不说万一忽遭不测,即使躯体顽健,恐怕也难以再有“雪夜访戴”的雅兴,“西窗剪烛”的情趣,见了面也是相对无言,欷歔不止,又有多少意思?所以,还得“只争朝夕”。这句名言,不仅适用于老年,同样适用于青年;不仅适用于访旧,同样适用于其他一切事情。

1999年8月29日



## 可爱的“燕子”

《新民晚报》70岁了。作为它的一名老读者、老作者，我向它表示热烈的祝贺。

“人生七十古来稀”。报纸也是这样。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新民晚报》是首屈一指的“老寿星”。但可贵的不在于它的老，而在于它越老越有精神，越老越有活力，越老越焕发青春，越老越受读者欢迎。就像一棵老树，它开出的花依旧那么鲜妍动人。

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我经常在思考“《新民晚报》现象”：为什么在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中，《新民晚报》的发行量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为什么在读者读报口味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新民晚报》仍然拥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了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勇于开拓，善于经营。但是从办报而言，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坚持了一个正确的方针：“飞入寻常百姓家”，即明确地把自己的受众界定在最广大的普通群众这一层面。它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讲的“贴近群众”，而且是把根子牢牢地扎在广大群众的土壤里，因此它有着广阔深厚的群众基础。

《新民晚报》在读者（特别是上海读者）中享有的欢迎程度和信任程度，是令人羡慕的，它简直成了市民“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生活伴侣。每天下午，随着一声声“夜报来嘞”的市声，上海大街小巷就出现千家万户读晚报的独特景象。记得母亲在世时，就把晚报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和行为规范。有一次晚报刊登了一条高楼窗台摆花盆落下伤人的消息，她就去关照左邻右舍把窗台上的花盆撤下。根据就是“夜报上说的”。

要真正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很不容易的。飞入，不是闯入，不是强入，而是要像可爱的燕子那样，被千家万户的主人欣然接纳。即使晚到了半小时，人们也会牵记：“春天来了，燕子怎么还不来？”《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绝

非一朝一夕之工，而是经过了几代报人的努力，形成了一种自觉，即：时时刻刻把读者放在心上，处处想到读者，事事为了读者。

这种自觉，表现在办报风格上，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表现在报纸内容上，是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善调众口，使不同阶层、职业、爱好的读者都可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表现在办报方法上，是挖空心思，好戏连台，让读者能够天天尝到可口的“饭菜”。仅以《夜光杯》的“十日谈”专栏为例，已经坚持办了十多年，至今内容层出不穷，方兴未艾，令人佩服。表现在社会联系上，是广结善缘，远悦近来。不但热情为读者服务，而且真情与作者交友。那么多名家经常地为《新民晚报》写稿，就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报界都在研究报纸的前景和命运，研究报纸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具体报纸为对象进行深度研究的，似乎还嫌不足。依我看来，“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何飞入百姓家”，便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研究题目，而这个研究对象就在我们身边。



1999年9月9日

## 课文应收《隆中对》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时要随一些领导同志到地方视察或检查工作。地方官员在汇报完情况后，免不了要提一点具体要求，比如：希望多给一些资金投入，多给一些倾斜政策，尽快批准某一建设工程立项，等等。最近，却遇到一位地方官员，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的，竟是为了一篇课文。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

9月下旬，我随全国人大成思危副委员长一行到湖北襄樊市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出面汇报的是市长罗辉。他的汇报一开头就有点与众不同，颇有文化气息：

“具有 2800 多年历史的襄樊，是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过无数的志士仁人，诞生了汉光武帝刘秀，隐居过诸葛亮，养育过杜甫、孟浩然、张继、米芾、伍子胥……”

接着，罗市长提出，推行素质教育，不但要提高教师的素质，也需要改进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包括拓宽课文的选择。这时，他脱离讲稿，插了一段很动情的话：

“比如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篇传诵千古的名文。它不仅文字精炼，只有 296 个字；而且思想精辟，用辩证的观点透彻地分析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势，提出了应该采取的对策。过去它一直是中学语文课必选的范文，我们当中学生时都能背诵如流，产生过积极的思想影响。可是现在语文课本里不收它了，非常可惜。我郑重地建议，把《隆中对》重新收入语文课本，希望成副委员长把我们这个建议带回北京。”

罗市长的建议得到在座的好几位襄樊市领导同志的附议，有的还补充说：当年在湖北工作的吴官正同志还曾要求决策咨询部门好好读一读《隆中对》，为领导部门的决策提出正确的依据。

成思危副委员长当场表态：“你们的建议，我一定向教育部转达。不过，在被采

纳之前,你们可以自己先作为补充教材嘛!”

罗市长执拗地说:“这是两回事。《隆中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不能由我们襄樊独享啊!”

几天以后,当我们结束工作即将离开襄樊时,市里的几位领导还殷殷嘱托:“请你们一定把我们的建议转达上去,把《隆中对》收进语文课本!”

起初,我还认为罗市长的建议,出于一种乡土观念,因为襄樊人向来以隆中是卧龙先生躬耕之地而自豪,对《隆中对》自然也会有一种特殊感情。后来到教师、家长中间走一走,听一听,发现语文课本内容陈旧、选材范围过窄、脱离实际,竟是一种普遍反映。有的教师甚至认为这也是部分学生厌学的原因之一。这才感悟到,襄樊市市长为之呼吁的不是仅仅一篇《隆中对》的问题,而是关乎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教育部门似可从中举一反三。

作为一市之长,重视“普九”义务教育,不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资金、设备上(当然这也是重要的),而是关心到课文的选取上,可以说是“具体而微”了。因而“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不知览者是否也有感于斯文?

1999年10月18日



# 莫忘博物馆

我出国访问过不少发达国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文化场所中最称得上“门庭若市”的,不是大商场、影剧院、歌舞厅,而是博物馆。

在美国华盛顿,很少能见到排队现象,只有博物馆是例外,即使晚上八九点钟,门口还排着长龙。馆内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法国的卢浮宫,更是每天从早到晚人满为患。参观要分批入场,因此大门外广场上总是聚集着成百等候入场的观众。

俄罗斯的名人纪念馆很多,那一幢幢古老的住宅里,参观者总是络绎不绝,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年久的木楼梯不停地发出悦耳的“咯吱”声。

日本的博物馆我没有去过,据说情况大致如此。

博物馆的观众这样兴旺,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把博物馆当作学校的第二课堂,把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列入教学大纲。所以在众多的观众中,中、小学生占着很大的比重。他们经常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博物馆来上形象、生动的历史课、自然课、美育课、人文知识课……既增长知识,又陶冶心灵。在卢浮宫的维纳斯雕像前,我看见围坐着一圈圈小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女教师用动人的语言讲解人体和衣褶的美,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联想起国内博物馆的状况。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省市新建的博物馆,其建筑和设备条件比起有些发达国家可说毫不逊色,但是利用率实在太低,与其本身的规模和地位太不相称。有一次我到某省新建的博物馆参观,一个大展厅里连我在内竟然只有三人。当时我感叹万分:这样珍贵的馆藏,如果在国外展出,不知会吸引多少观众,引起多大的轰动,在这里却如此冷落,真是太可惜了!

我曾经问过有些教师,为什么不能经常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去上

点课。他们几乎都回答说,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没有这项内容,做起来困难很多。听说上海博物馆为了方便学校组织集体参观,还提供接送的交通工具,可是效果似乎并不十分理想。看来,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一个观念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很狭窄,似乎让学生学点书法、绘画、乐器或某项专门技能,就是素质教育。殊不知素质教育的涵义是十分广阔和丰富的。我认为,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是具体的,首先要让学生知道祖国为什么可爱,为什么值得爱。否则就不可能爱得执著,爱得深沉。参观博物馆,最能够引导学生具体地了解祖国的可爱之处——包括她雄伟壮丽的山川,源远流长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的人民,富饶丰厚的物产,艰苦卓绝的斗争,独步世界的创造……任何一种综合或是专项的博物馆,都具有同一的功能。其作用绝对不是书本所能代替的。

记得有一次一位青年画家悄悄地问我:“请您说实话,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真像宣传的那样博大精深吗?”我大吃一惊,但很平和地告诉他:“请你先到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好好看三天,然后咱们就有共同语言了。”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见到我,连声说:“胜读十年书。”

因此我建议教育部门:一定要把参观博物馆列入教学大纲,千万不要把博物馆仅仅当作某种文化的标志物。

1999年11月28日

## 离筵壮歌

又到12月8日了。“老上海”都不会忘记，58年前的这一天，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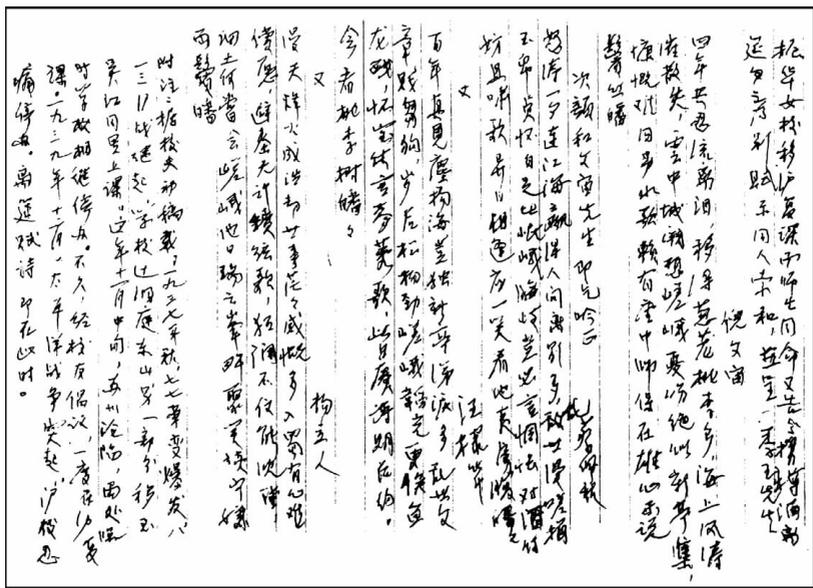
每年到这一天，我总会回忆起那个噩梦般的早晨；同时也会想起振华女中几位教师的离筵悲歌。

振华女中原在苏州，是一所曾经培养出不少著名人物的学校。钱锺书夫人杨绛女士就曾在该校读书。校长王季玉是我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女教育家，终身未婚，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很快践踏到江南，王校长率领师生迁校洞庭东山，另一部分移至吴江同里坚持上课。这年11月中旬，苏州沦陷，两处临时学校相继停办。不久，经校友倡议，一度在上海复课，校址就在当时公共租界的爱文义路赫德路口（即今北京西路常德路口），弦歌不辍。我母亲蔡佩秋也在该校兼课，那时我尚年幼，母亲经常给我讲王季玉校长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起，日军占领上海，当时学校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向日伪屈膝“登记”，要么停办。王校长大义凛然，忍痛选择了后者。她认为，学校可以停办，民族气节决不能丢掉！师生分手之际，王校长在离筵上发表讲话，慷慨话别，相期抗战胜利之日重新复校。

席间，国文教师倪文宙赋诗一首：

四年共忍流离泪，移得葱茏桃李多。海上风涛催散失，云中城阙想嵯峨。忧伤绝似新亭集，慷慨难同易水歌。赖有座中师保在，雄心未说鬓丝皤。（注：振华女校移沪复课，而师生同命，又告分携。樽酒离筵，匆匆为别，赋示同人索和，并呈季玉先生。）

其他教师也一一即席和诗。现在我记得的有这样三首：



这是母亲蔡佩秋晚年在病榻上和我一起回忆默写下来的四首倡和七律。当时她已病重，字迹潦草，不复当年。

(一)

为涛一夕连江海，赢得人间离别多。乱世漫嗟捐玉帛，贞怀自足比岷峨。临歧岂必言惆怅，对酒何妨且啸歌。异日相逢应一笑，看他夷虜腹皤皤。（蔡佩秋）

(二)

百年真见尘扬海，岂独新亭涕泪多。乱世文章贱白狗，岁后松柏劲嵯峨。韬光更俟鱼龙戏，怀宝休言麦莠歌。此日赓诗期后约，会看桃李树皤皤。（汪棣华）

(三)

漫天烽火成浩劫，世事茫茫感慨多。入蜀有心难偿愿，避秦无计续弦歌。狂澜不信能沉陆，细土何当会嵯峨。他日瑞云峰畔聚，笑谈宁嫌两鬓皤？（杨立人）

记得那天从不饮酒的母亲也喝了一点酒，回家时很兴奋地把这几首诗读给我听，还解释了她写的那首诗中“看他夷虜腹皤皤”的意思，说：“腹皤皤，就是肚子胀得鼓鼓的——把东洋人赶到太平洋里去了！”说到这里，还笑着用双手围在腹前，做

了个滑稽的手势。

当时我年幼,虽然很快就能背诵,但对诗中的典故、寓意、感情还不甚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这几首诗里表达的不仅是忧国忧时之感,更多的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打败侵略者的坚定信心。离筵悲歌,实际上是离筵壮歌。

1982年,母亲病重,我赶回上海探视。为了解除她的病痛,我在病榻前给她讲些往事,便提起了这几首诗。当我念到“看他夷虏腹蟠蟠”时,她微笑了,又抬手做了个胀腹的手势,轻轻地说:“阿是被我说着了?”

现在,这五位当事人中,除杨立人先生情况不明外,其余都已作古。但是当年他们激扬的音容宛在眼前。这几位普通中学教师的节操、学识、文采,多么值得后人景仰!

1999年12月13日



## 人近七十学听话

一跨入 2000 年，就接近“古稀”的边缘了。听罢新世纪的钟声，久久未能入睡，索性打开台灯，铺下稿纸，准备为《夜光杯》写点什么。冥想片刻，写下了上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酝酿已久。

去年 5 月 1 日，我在《夜光杯》上写了一篇《感人即在平易处》。大意是：尽管在报海沉浮了几十年，直到从新闻岗位上退下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怎么学会说话，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说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喜欢听的话。不料这样一篇纯属谈新闻业务的短文，竟被好几家报刊转载或摘登，有的还给换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人过六十学说话》，弄得后来成为朋友间调侃的资料。甚至何鲁丽副委员长也见面就问我：“学说话学得怎么样了？”

这样一来，倒触发了我写一篇续文的想法。因为在发现自己没有学好说话的同时，我还意识到自己偌大年纪，还没有怎么学会听话——学会辨别哪是真话，哪是假话；哪是实话，哪是虚话，以致经常以假当真，以虚当实，受骗上当。可惜的是，感悟到这一点，已经有点晚了。

人们常称我为“书生”，书生就不免有书呆子气。书呆子气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轻信。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就有明训：“君子可欺以其方”，因为自己算不上君子，所以从未认真去领会此话的深意。采访也好，编稿也好，听汇报也好，只要对方言之谆谆，言之凿凿，就不疑有他。特别是言者有些来头，或者稿件注明“情况属实”，并盖有大红公章，更是深信不疑，少具戒心。退下领导岗位，接触实际的机会多了一点，与基层群众近了一些，才越发体会到，要听到真话、实话何等不易！说得不客气，平时几乎时时处处在被蒙骗的状态之中。

实例很多，仅举一二。

一是某次调查农村用电价格问题。全国人大不断接到基层信访，反映农电价格过高。为了摸清实情，特地到某市调查研究。从有关领导汇报中，实在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到农户去，直接听取农民意见。事前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搞什么“统一口径”。对方一再诚恳表态：“一定让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绝不会做手脚。”到了农民家里一谈，发现上下“口径”完全一致——每度电价为四角五分。我的书呆子气又上来了，怀疑起信访举报不实。可是另一位同志同时路遇一位农民，随便一问，回答完全不同，竟是一元八九角，相差三四倍！原来“口径”没有“统一”到这位农民头上，使他无意中透露了真情！

二是不久前调查娱乐场所的“三陪”问题。这次学了乖，先到某市暗访了两天，把实情基本摸清，然后才搞“明察”，请有关部门来开会汇报。汇报时人手一份打印好的发言稿，讲得有板有眼，无非是如何统一认识，如何深入宣传，如何采取行动，如何成果辉煌，最后提几点“不足”和“差距”，与暗访所得大相径庭。我方不得已把暗访了解的情况端出，这时对方不得不承认：“你们了解的比我们多，看来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听了这样的“表扬”，真是啼笑皆非。要不是“浅入”了一番，听到一点真话、实话，岂不又要认认真真地把那些假话、虚话写成报告，转手去哄弄上级？如果上级也信以为真，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岂不更加糟糕！

然而，听到真话、实话就那么容易吗？非也。我曾问过一位心直口快的地方官员：“你们这样‘统一口径’，万一领导下来视察，临时改变路线，怎么办？”他得意地笑道：“这请你放心，我起码要准备好三条路线，他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跑不出我的手心。”

嗟夫！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看来人到七十，要想听到真话、实话，光是会听还不行，非得学会七十二变的本领，才能应付那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花招呢！

2000年1月11日

## 两块和田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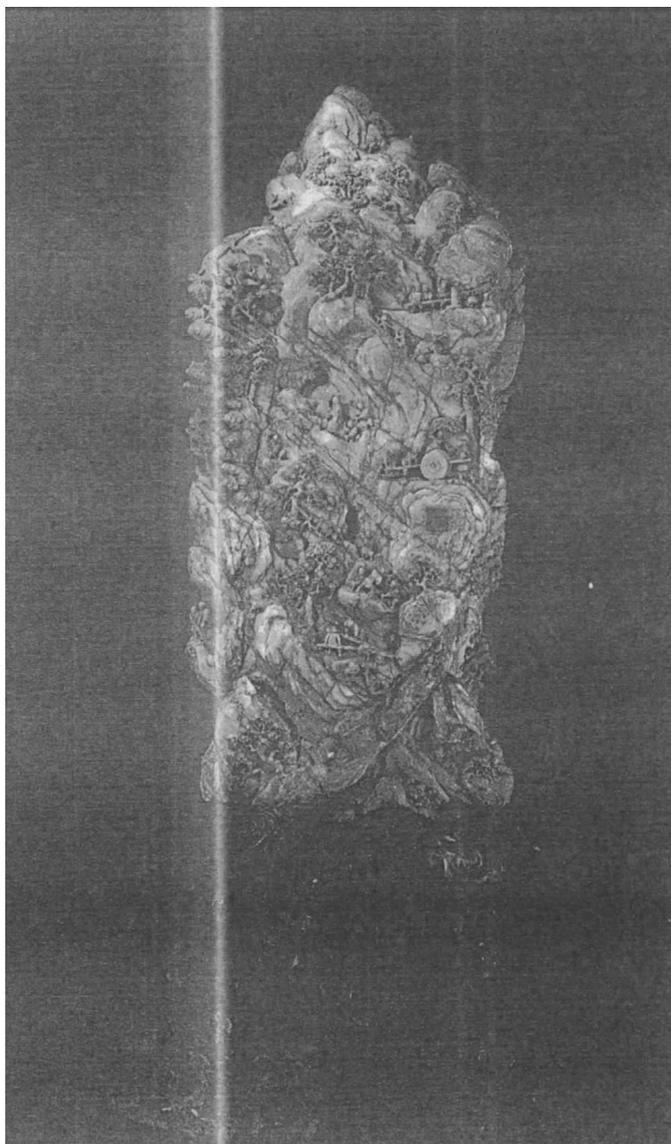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陈列着一座重达数吨的巨型玉雕，玉质之精美，雕刻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国宝。

据记载，这块巨玉原在新疆和田。清乾隆年间被发现后，先运到苏州，历时十年；请名匠雕刻，耗时十年方始竣工；然后运到北京，又花了十年时间，前后共30年。当人们从展品说明看了它的这番经历，无不啧啧称奇。

然而，据传说，当年发现这块巨玉的同时，在附近还发现另一块，体积比它更大，玉质比它更好，只是因为运输更加困难，不得不忍痛割爱。后来再去寻找，早已被流沙淹没，杳无踪迹，实在令人惋叹。

对比后一块巨玉的命运，前一块可以说是幸运儿了。它之所以幸运，第一是有慧眼识宝，如果没有卞和的鉴别眼力，可能被当作一块顽石；第二是有适当机遇，当时地方官员正有进贡的需求，这块玉石便正逢其时；第三是它长得适合，不大不小。如果再小一点，可能没人看得起；再大一点，也许就遭到那块被流沙淹没的大玉石的命运——或者由于无法运输、或者由于无法安排、或者由于其他深层次原因而赍志以没。诗人杜甫就叹息过：“古来材大难为用！”他在《古柏行》中写的那棵“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的古柏，就是因为长得太伟大，最后因无人理睬而成了废材。相对而言，“材大难用”比“大材小用”更为可惜，更为可悲。

自从听了这两块巨玉命运的传说，我就经常想起无锡国专一位名叫沈茹菘的老学长，此人原籍浙江嘉兴，是当代国学大师王遽常的入室弟子。学识淹博，才华过人，诗词歌赋、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尤其长于史学、佛学。我亲眼看他与人酬唱，数百言的长歌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毫不夸张，才思之敏捷在当代少见。就是这样一位大才人，始终未能一展怀抱。在“左”的思潮下，因敢于直言，身陷囹圄十余年。出狱后在煤球店又当了十来年伙计，在同学中是命运最惨的一个。党的十一届三



两块和田玉中幸运的一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全会以后，他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就聘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身心遭到摧残，不久就患肝癌去世。他积数十年研究撰写的极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美术史论》，因无力交付出版费用，一直未能出版，成为他终身遗憾。如果他天假以年，能活到今天，其成就绝不会在某些学术权威之下。前年，我在同窗红学专家冯其庸处见到沈茹菘的一幅旧作，惋叹不置。其庸嘱我题记，我只写了两句：“开图别有沧桑意，只觉含毫咏不成”，便什么也写不下去了。

在一次关于人才问题的座谈会上，我就两块和田玉的命运发了一番议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庆幸躬逢盛世，感谢邓小平同志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人尽其才的广阔天地，使我们这些大材、中材、小材得到了施展宏图的机遇。但是，也别忘了，也许还有一些像第二块和田玉那样的大材，由于我们的眼力不够，或者其他原因，还寂寞地躺在沙漠里，等待被认识、开发和利用。“汉之兴，在于得人”。如何使人才得大用，既是科教兴国的关键，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

2000年1月24日



## 从“一位罪犯”说起

“一位化名陈华的‘千万富翁’潜逃9年之后，近日在安徽省怀远县被四川警方抓获……”

这是1月24日《新民晚报》第26版头条通讯《“千万富翁”落网前后》的第一句话。读了不禁一怔：一个罪恶累累的人口贩子，怎能称他为“一位”呢？

无独有偶。同天的《北京青年报》“财富周刊”第3版，也把野蛮殴打环保女工的肇事者称为“一位”“两位”，如：“事情还没有过两分钟，一位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小伙子，上前就开始打她……”

这倒把我闹糊涂了。从来“位”是一种尊称，只用于比较尊敬的人物和礼仪场合，如“一位客人”“一位同志”“一位先生”“一位老师”“各位来宾”等等，现在怎么可以用到罪犯、暴徒身上了呢？莫非对“位”的用法有了变化，否则为什么能够通得过层层审稿、校对？为此，特意翻查了近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可是词典上说得明白：“位，量词。用于称人，含敬意。”（见卷一，1278页），可见我尚未糊涂。

对于报纸上的文字，我向来不大赞成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因为报纸上多为急就章，忙中出点笔误，在所难免。这回竟然也想来“咬”“嚼”一番，实在是因为这样的“病例”目前过于普及了，连一家权威性的大报，在报道一个抢劫杀人案时，也赫然出现过“三位歹徒”的字样（当时未作笔记，姑隐其名）。我担心长此下去，谬种流传，使这类“病例”蔓延开来并成为合法化，说不定有一天把这样的尊称用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流身上。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量词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竟不然。正因为这仅仅是普通常识，使用不当更使读者难以原谅。试想，连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性错误，反复出现于报章，岂不笑话。而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笑话，还因为中国文字对量词的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一字之别，有褒贬、清浊之分，使用不当，

还可能出政治性问题。如若不信，试把“一位杀人凶犯昨日伏法”这样的语言作为标题放到报纸显著位置，看看会有什么社会效果。

我之所以为此“小题大做”，绝非厚责记者，也不是想给报纸出点洋相，而是为目前的语言环境深深担忧——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谁要郑重指出，往往被视为迂腐。一些刚上岗的年轻编辑、记者，根本无人告诉他们还负有维护祖国语言文学纯洁性的责任。这一点，与老一辈新闻出版工作者所受的教育大不相同。

记得笔者 1951 年刚进《东北日报》工作时，就遇到一事情：一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处用词不当，社长李荒同志立即召开编辑部大会，进行严肃批评。当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很多读者把报纸上的文章看作教科书，以报纸上的文字作为范例和标准。有一次，某中学的一位教师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字，引起学生争论，那位教师便拿出《东北日报》来证明自己正确，平息了争论，而实际上报纸是错了。李荒同志说：“这是我们误人子弟啊！”这句话使我终身难忘。

可是现在我也不那么认真了。审稿时屡屡发现把“即使”写成“既使”、把“启事”写成“启示”之类的错字，也只是顺手改过，一笑了之，从未开过那样的编辑部大会，以致有的年轻编辑、记者干到头发花白，还老是重复那几个习惯性错字，成了“白字先生”。扪心自问，这也是一种“误人子弟”。

2000 年 2 月 9 日

## 龙年春节忆“沙龙”

大年初一早晨，就接到《辽宁日报》老同事孙凤兰的拜年电话。她兴奋地告诉我，报社的离退休干部最近组织了一个文艺沙龙，由她负责。每次沙龙，老同志们又唱又跳又聊天，一个个兴致勃勃，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

“沙龙？”我不禁失声大叫：“你们还搞沙龙。”

“是啊，沙龙又咋的？”对方显然不理解我为何如此激动。

“你忘了老程差点因为沙龙被打成反革命？”

“我不知道，你快说是咋回事儿？”

“好吧，你听我说……”

老程名叫程维君，《辽宁日报》文艺部的老主任，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同全国所有报社一样，文艺部首当其冲成了“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窝”和“三家村分店”，老程自然也成了“黑店老板”。尽管她与邓拓、吴晗、廖沫沙素昧平生，他们也从未请她到“三家村”喝过茶，大字报还是铺天盖地向她和她的“左膀右臂”猛轰。可惜她历史清白，十几岁就参加新四军，没有什么政治辫子可抓，大字报只能重复一些“遥相呼应”“何其毒也”之类的套话，揭不出更多“干货”。这使造反派们非常恼火。

终于有一天，石破天惊，一张大字报揭出了“要害问题”——“请看‘沙龙女主人’的丑恶面目！”于是揭批有了新内容：披着革命干部外衣的老程原来是思想极其反动腐朽的、钻进党内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真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人们惊呆了：当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老程，怎么竟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这“沙龙女主人”的历史问题是怎样查出来的？

原来，造反派们从老程的历史档案里找到了一份她刚参加革命时写的思想汇报材料，其中在叙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提到在上海中学念书时喜欢读外国古典

文学作品，曾经幻想将来当个作家，成为一个沙龙的女主人。这本来属于当年知识分子常有的自我解剖，谁能想到竟成了造反派打人的石头！于是，老程理所当然地成为“专政对象”，吃尽苦头。

可是，谁也想不到，造反派们义正辞严地对“沙龙女主人”进行口诛笔伐之时，连“沙龙”究竟为何物都没有闹明白。直到1969年我们这批“牛鬼蛇神”被遣送到干校劳动改造时，一位当初领导过运动的人物可能因为太寂寞了，破例和我聊起天来，突然向我发问：“你说，沙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沙龙是外文的音译，是西方作家聚会的一种形式，无非是凑在一起喝点茶，听点音乐，朗诵点自己的作品……他听了一拍脑袋说：“哎呀，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她想‘杀龙’——杀毛主席呢！”

我顿时差点笑出声，天哪，连沙龙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人死去活来地批斗了三年！然而我没敢笑，只能暗自佩服人家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丰富的想象力！

抖开这个“包袱”，电话那端早已笑得喘不过气来。我断喝一声：“笑什么！一场悲剧、闹剧呀！要没有小平同志，这场闹剧还不知会闹到什么时候呢，还能容你今天搞什么‘杀龙’，光凭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该杀了！”

2000年2月24日

## 任仲夷的幽默

最近连续读到几篇写任仲夷同志的文章，记述这位省委第一书记对辽宁、广东两省的改革开放作出的突出贡献。其中有一篇题为《一位世纪思想者的智慧》，尤其准确地点明了任仲夷的特点。

我在《辽宁日报》工作期间，曾有机会接触过几次任仲夷同志，深深地被他身上的智慧所吸引。特别令人倾倒的是，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那种特有的幽默感。幽默，是他智慧迸发出来的火花。

大概是1981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破天荒第一次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立刻招致强烈非议。有的报纸以大量篇幅批评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台风”。大连属于辽宁，作为辽宁省委机关报的《辽宁日报》对此应该抱什么态度？当时面临着沉重的压力。总编辑赵阜同志便让我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请示（当时新闻记者想见省委书记并不很难）。我向任仲夷同志汇报情况后，他默默地盯了我足有一分钟，突然向我发问：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讷讷地回答：“好像没有……”

“是啊，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嘛！”任仲夷悠然地说。

“那我们报纸怎么办呢？”我有点急了。

任仲夷同志一摆手说：“共产党的省委不该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这是该由导演管的事！”

意会了省委书记的想法，我轻松地回到报社，可是向总编辑汇报时，没敢原原本本传达任仲夷同志的原话，“贪污”了最精彩的部分。即使是这样，也避免了干一次贻笑后人的蠢事。

任仲夷同志特别爱和新闻界打交道。他经常说,我了解情况主要靠两条渠道,一个是职能部门,一个是新闻记者。事实证明,新闻记者反映情况往往比职能部门更敏锐,更真实,更生动。有时候,他事先不打招呼,就轻车简从来到报社,找编辑、记者随便聊天,在轻松的气氛中,既了解了情况,又“渗透”了自己对宣传报道的意图。他喜欢平等地讨论或争论,很少用“必须”“应当”。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流行歌曲争议很大,连《太阳岛上》《军港之夜》这类歌曲也被指责为“靡靡之音”。一天,任仲夷同志突然来到《辽宁日报》,召集几位部主任、编辑聊天,想听听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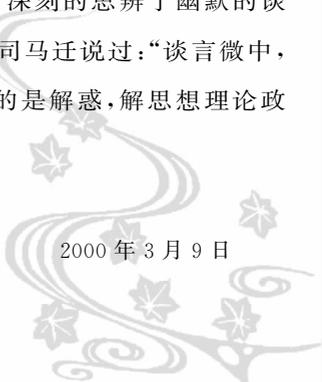
当一位同志谈到,现在连托儿所的阿姨也教孩子们唱什么“我有一颗火热的心”之类的爱情歌曲,使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时,任仲夷同志笑着插话说:

“你说的情况,只能说明我们现在适合儿童的好儿歌太少,所以托儿所的阿姨们只好教唱‘火热的心’。其实三四岁的孩子懂什么:你教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文化大革命’,托儿所不都教唱‘政策一和一策略—是一党的一生命’吗?(说到这里,他抬起胳膊,学唱了一句),难道三岁孩子就懂什么叫政策和策略?”

那位同志不以为然,接着又说,现在部队的战士也流行唱《再见吧,妈妈》,有些刚入伍的新兵,洗衣服时一边唱《再见吧,妈妈》,一边流眼泪,影响了部队的斗志。任仲夷同志又笑了,拍拍那位同志的肩膀说:

“同志啊,解放军战士也是普通的人呀!行军训练当然应该唱‘雄赳赳,气昂昂’,‘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休息洗衣服唱个‘再见吧,妈妈’也属于人之常情。十七八岁的娃娃,刚离开家,能不想妈妈吗?流点眼泪有什么可怕的?时间长了就好了。你的孩子如果入伍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想你吗?”

一席话说得大家释然开怀,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寓深刻的思辨于幽默的谈笑之中,这就是任仲夷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艺术魅力。司马迁说过:“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任仲夷同志做到的,不仅仅是解纷,更重要的是解惑,解思想理论政策之感。



2000年3月9日

## “鉴定家”的堕落

很久没有和书画界打交道，不知书画市场已“黑”到这般田地。

我有一位年轻朋友，喜欢书画。几年前“下海”赚了点钱，经常跑收画市场用高价买些名人字画，或收藏，或送人，据说已耗资数十万元，但我从未看过究竟都买了些什么。不久前，他喜滋滋地告诉我，花八万元买了一幅吴湖帆的青绿山水，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来我酷爱吴湖帆的作品，二来吴湖帆的书画在北方流传很少，于是请这位朋友把画拿来给我看看。

第二天，他把画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展开一看，不禁失声大呼：“假的，百分之百假的！”他不信，说是经过专家鉴定，并有盖着钢印的收藏鉴定书为证。恰巧我手头有一本《吴湖帆画集》，便翻给他看，告诉他：你这幅画就是临仿这个《庐山五老峰》，画面虽同，气韵、笔墨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只要看这松针，画得多么松散呆板，哪是吴湖帆的大手笔！看起来这个作假的人顶多学过三年画。朋友听了自然有点扫兴，解嘲地说：“也罢，就算做了一笔蚀本生意。”

过了几天，他又拿来一幅晚清名家任预（立凡）的山水和一副翁同龢的对联。任预的画倒是旧物，但笔墨了无生气，一看便知是当时的赝品。不过这次我不忍再扫他的兴，推说自己不熟悉任预，难辨真伪。而翁同龢的对联，则是石印的复制品，根本不是原作。这样的东西过去只值几块大洋，现在竟开价上万，真是太黑心了。说穿之后，朋友也感到赧然，发誓以后不再当“冤大头”了。

书画造假，自古有之，本来不足为奇。问题是过去造假，至少还讲点水平。有些造假高手，往往能做到以假乱真，甚至叫人上了当还不得不佩服。张大千造的石涛假画，就曾骗过鉴定大家庞虚斋。而现代的造假，连点起码的良心都不讲，基本技法尚未掌握，竟敢冒充名家赚大钱，实在欺人太甚。更为可恨的是，有些所谓鉴定专家，为了从中捞取好处，竟也昧着良心作伪证，把明明白白的赝品定为“真迹”，

甚至写上一段题跋,吹捧一番,说什么“此乃某某精心之作”。这就比造假者更为堕落了。当今书画市场赝品泛滥,不能不说与有一批堕落的“鉴定专家”为之“保驾护航”有关。

书画造假,不仅损害收藏者的利益,而且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尊严和信誉。国画大师谢稚柳生前曾对我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当中国最被日本人看不起的时候,他们不敢看不起中国的书画;而现在倒真到被他们看不起的时候了。”说这番话是在1983年。十多年来,这种让人看不起的现象愈演愈烈,现在该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依法严加打击的时候了!物质产品的造假要受法律制裁,精神产品造假该当何罪呢?应该也定个法。

2000年4月4日



## 有这样一位县长

最近,我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的同志一起,到河南考察文物保护工作。途经登封中岳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中岳庙位于太室山麓黄盖峰下,始建于秦代,唐宋之际香火曾盛极一时,明清两代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大殿前一片森森古柏,冠盖亭亭,威仪棣棣,据说都是汉唐遗物。我盘桓其间,突然发现每棵柏树主干上都钉着一块搪瓷牌子,长约五寸,宽约二寸,蓝底白字,上面写着:

古柏树第××号 登封县政府制

我看那搪瓷牌子好生眼熟,很像旧上海的门牌,便好奇地向陪同的登封市文物局同志询问这些牌子的来历,他居然回答得头头是道:

“提起这些牌子,还得感谢当年登封县一位叫毛汝采的县长。原来这些古柏,到民国年间,经常遭到盗伐,屡禁不止。1936年,毛县长到任以后,发现这个现象,非常痛惜,下决心加强管理。他针对当时无人负责的状况,首先把这八十多棵珍贵的古柏一一编号,又亲自跑到上海订制了这批搪瓷牌子——因为当时河南还不生产搪瓷制品。从此,每棵柏树都有专人负责,盗伐事件大大减少。所以,老百姓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位毛县长的功劳。”

我心中暗想:好一位爱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县长,可惜他生在旧时代了!

接着,我们来到距此不远的嵩阳书院。相传欧阳修、范仲淹、程颢等大儒都曾在此讲过学。“程门立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山门外矗立着一座高约9米的唐碑——“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高大雄伟,十分壮观。碑文为唐代宰相李林甫撰,由著名书法家徐浩书丹。此碑在我国书法史上很有地位。我正在摩挲观赏,市文物局的另一位同志又给大家讲解:

“抗战前,登封县有一位县长,非常廉洁,离任时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唯一的要

求是给他 80 份这块碑的拓片。开始人们不知道他做什么用,后来有一年登封发生水灾,他请人把这 80 份拓片送到京沪变卖,换来不少钱粮,全部用来赈济灾民。这件事后来传为美谈,至今老百姓一提起来,还对他感恩不尽……”

“这县长叫什么?”我问。

“毛汝采!”

又是这个毛汝采!

第二天早餐时,一位在五六十年代曾在洛阳地区做过多年统战部长的老同志告诉我:“毛汝采是清华大学早期毕业生,江苏人,30 年代曾在河南六个县当过县长。尽管他是旧政府的官员,但出污泥而不染,确实为老百姓做了不少除害安民、扶危济困的好事,所以六十年代还被人民政府聘为县文史馆馆员。政声人去后,对于真心实意造福一方的人,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口碑胜于丰碑啊!”

回来以后,我翻检有关登封古迹的资料,均未见有关毛汝采的事迹。恐日久湮灭,故为之记。

2000 年 5 月 2 日

## 青年歌手，请你理解

在漫长的七天“五一”劳动节假期内，每天观看中央电视台《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成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的美好享受。一家家窗口的灯光深夜不灭，便是对收视率的最好说明。

我不是歌迷，平时对演唱大赛之类的节目不甚关心。这次却是例外，不仅每晚必看，而且手备纸笔，一一记录、评点。这主要是因为参赛的歌手，都是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条战线上的年轻人。他们的演唱朝气蓬勃，各具特色，展示着当代青年特有的风貌和我国乐坛光辉灿烂的未来。作为一名关心文化事业的新闻战线老兵，看到这种情景，内心充满兴奋和欣慰。

这次大奖赛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重视对歌手综合素质的考查，每名歌手演唱之后，都要经过一道“综合素质测验”，包括文史知识和音乐知识的问答，并且把这方面的成绩计入总成绩内。举办单位的这一决策很有意义，很有远见，就是说评判一位优秀歌手，不仅要看他的演唱技巧，还要看他的全面素养。这样做，完全符合江泽民同志一再提出的要大力提高文艺工作者综合素质的要求。

但是，每当一位青年歌手一曲唱罢，接受知识测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紧张。因为尽管有一些歌手在回答问题时能够从容不迫，对答如流，相当多的歌手却被难住了，甚至全部答错或一个答不上来。这和他们的演唱水平形成相当明显的反差，使人感到惋惜和遗憾。

对于这种状况，电视观众看法很不相同。多数观众觉得这种综合素质测验非常重要，可以引起青年歌手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视，推动对青年歌手全面素质的培养工作。也有不少人（包括一部分青年歌手自身）不以为然，认为：“唱歌就是唱歌，搞这种测验有什么必要？”可能受这种看法的影响，最后大奖赛的组委会宣布，今后对专业歌手综合素质测验的内容将由全面知识改为以与音乐有关的专业

知识为主。

我对此持不同看法。

第一,这次知识测验的题目都非常简单易答,并无偏题怪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是谁?“西部大开发”的“西部”包括哪些省、自治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在哪个省?谁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王?“卧薪尝胆”是谁的故事?“五一”劳动节的来历是怎么回事?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的简称是什么、省会在哪里?能否举出三个著名的序曲?能否举出三个古典词牌名?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的首都在哪里?贝多芬、舒伯特、比才是哪国人?《蒙娜丽莎》的作者是谁?常香玉、红线女、袁雪芬、俞振飞各是哪个剧种的代表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是哪部戏曲的主人公?什么是“文房四宝”?周树人、沈雁冰是哪两位作家的姓名?……回答这些属于中、小学生都能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专业歌手还是业余歌手,他们大部分受过中高等教育,其中不少人还是文化工作干部、文化馆员、教师、编辑、军官,应该说都并非难事。如果认为这样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必要”具备,标准未免太低了。

第二,“唱歌就是唱歌”的说法不敢苟同。唱歌的歌手不是唱歌的机器;歌手的唱歌更不是机械的传声。常言道:“歌为心声”,歌是歌手思想的火花,感情的迸发,心灵的剖白,所以对歌手的最高评价是“声情并茂”。如果说“声”是一种天赋、一种技巧,那么“情”则是歌手内在素质的汇合,包括他的文化素养,他的精神境界,他对歌曲内涵的深刻理解。同样是一句“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昆曲《牡丹亭·惊梦》),俞振飞唱来的潇洒蕴藉,无人可以企及,差别就在俞振飞有一身学问上。文化底蕴不足,尽管也可以跻身于歌星行列,终究成不了参天大树。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大奖赛把综合素质考查作为评判优秀歌手的重要内容,意味着对青年一代的关爱、厚望和更高的要求。丁关根同志在接见青年歌手代表时的讲话,就体现了这个精神。既然方向对头,就应该坚持走下去,而不要受流俗的浅见的影响,轻易地改变主意。即使一时有人难以接受,相信这批青年歌手在日趋成熟之时,会懂得,会理解,会感激今天这番良苦用心的。

2000年5月25日

## 古战场上电话多

雁门关内外，河水萦带，群山纠纷，乃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充满传奇色彩的古战场。

我对雁门关的神往，源于童年常听的一句昆曲《牧羊记》的唱词：“雁门关阻隔了平生愿，请哥哥登望乡台聊叙别情……”那是投降匈奴后的李陵对着大义凛然的苏武唱的，苍凉中透着羞惭。一道雁门关成了原来情同手足的朋友势不两立的敌我分界线。

等到圆雁门关之梦，已是六十多年以后。最近我随全国人大《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来到山西，提出的第一个希望便是顺便看看雁门关。

雁门关内外的古迹真多，故事也真多。二百多公里的旅途上，光是杨家将的传说就说不完。广袤厚重的黄土地，随处可见的古墓群，依山雄踞的烽火台，极目远眺，仿佛在读一部中华民族的沉重历史。

然而，这种思古幽情很快被这里出现的许多新时代气象所打断。在一座座古老闭塞的村镇里，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我发现现代通讯设备竟同大城市一样普及。白底红字的公用电话标识到处可见，有的还是“国际、国内长途——IDD、DDD”。行色匆匆的庄稼汉，边走边对着“大哥大”大声嚷嚷；穿着皱巴巴西服的村干部神气十足地通过“掌中宝”不知向谁发指令。

在浑源县的街道上，我问一位兼管公用电话的小摊主人：“打电话的多吗？”“多着哩！”“干什么的？”“谈买卖的、家里有人在外打工的、当差的、当兵的，什么都有。刚才打长途的那个小媳妇，当家的在新疆当兵，隔三岔五就一个长途，一说就是半天……”

地球真是越来越小了。雁门关不仅再也阻隔不了“平生愿”，更阻隔不了人际、省际、国际的交流。飞速发展的电子通信事业，已经把封闭的三晋大地同世界紧紧

地联结在一起。

在思维的跳跃中，储存在我脑细胞里半个多世纪的一段程砚秋《春闺梦》的唱词突然蹦了出来：

可怜负弩充前阵，  
历尽风霜万苦辛。  
可曾身体蒙伤损？  
是否云烟屡受惊？  
……  
门环偶响疑投信，  
市语微哗虑变生，  
因何一去无音信，  
不管我家中肠断的人。

哀婉缠绵的“游丝腔”，把思念远方战场上亲人的幽怨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现代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体会不了这种辗转反侧的感情了。有了电话，特别是有了手机，还用得着那样问“可曾”“是否”么？一拨电话号码，就问个一清二楚了。

古人想象不出今天的神奇，今人也理解不了古人的难处。所以古人的诗文多问号，今人的诗文缺神秘。可不是，自从有了“大哥大”，人便成了带线的风筝，无处躲藏，无可隐身，不容易再有那种委婉曲折的思古、怀人之情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今人，喜欢现实中的世界，喜欢有电话声的雁门关。独立苍茫的雁门关应该永远保存，电话频频的雁门关更应当阔步走向未来。

2000年6月7日



## 如果周庄当年……

不久前，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见几位外交官在一起热烈谈论苏州的周庄，对那里保留着的江南小镇风情赞不绝口。有的甚至说，到了周庄，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把苏州称为“天堂”。

我参加了他们的谈论，话题逐步由周庄引向对中国旅游业的看法。这些“中国通”都承认，近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很快，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大进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原貌和特色正在不断消失，一些原来以浓厚东方色彩吸引游客的名胜古迹，经过“现代化”手段的加工改造和梳妆打扮，已经面目全非，商业气息和市井气息替代了诗情画意的魅力。有的地方本来像风姿天成的纯情少女，现在变成了浓妆艳抹的“三陪女郎”，令人既大失所望，又啼笑皆非。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周庄为什么能够特立独行，一直保持着它的“原汁原味”？有的说，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偏僻，过去交通不便，“文革”中没有受到“横扫一切”的“洗礼”，成为“破四旧”的幸免者。我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只是远因而非近因。据我了解，周庄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当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周围许多地方兴起大搞花花绿绿的人造景观之风时，周庄同样有人“自惭形秽”，认为老祖宗留下的“破破烂烂”已不能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主张也按“现代意识”来重塑周庄的形象。值得庆幸的是，当年苏州市、昆山县、周庄镇的领导以及许多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没有随波逐流，去办那种蠢事。这里特别需要提一笔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见



古镇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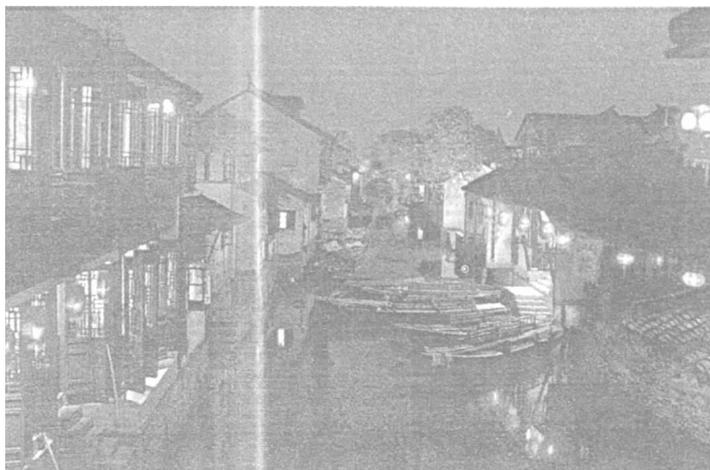


富安桥畔

解起了重要作用；陈逸飞先生的一幅描绘水乡周庄的油画被哈默用重金购下后赠给邓小平同志，也成为肯定周庄的有力佐证。现在，周围“先行一步”赶时髦的地方已经后悔不已。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在“旅游热”中仍在继续干着那种“建设性破坏”或曰“破坏性建设”的蠢事。为了吸引旅游者（实际是为了多赚钱），他们置专家和群众的呼吁、反对和媒体的曝光批评于不顾，一味迎合某些开发商的心理，耗费巨资去搞粗俗丑陋的假古董、假景观，把好端端古色古香的名胜弄得非驴非马。更有甚者，有些地方以发展经济、改造旧城为名，把成片的文物古迹包括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夷为平地，去建造宾馆饭店。有识之士莫不扼腕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比如追求经济效益，追求政绩，等等，这里暂且不论，只想指出一点：无知。无知的表现一是缺乏常识，不了解祖国历史文化的宝贵价值，不了解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二是不辨美丑，以丑为美，以俗为雅；三是颠倒观念，以为来自现代化国家的游客想看的就是现代化的景观，拆旧盖新才是有“现代化意识”。殊不知真正的现代化意识，是在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必须保护好历史的本来面目，巴黎、雅典、罗马都是这样做的。把最宝贵的历史遗迹当作“破破烂烂”，即使是出于赚钱的目的，也是一种最陈腐落后的观念。



夜泊



沈厅

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看到中国文物古迹遭破坏的状况时，曾发出忠告：“我们现在有的（现代化），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深思。

真的，如果周庄当年也追求那样的“现代化意识”，还能有周庄的今天么！

2000年6月19日



## “余束发”是谁？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嘱我用文言为他写篇序言，好与该书的内容、文体相协调。我的那点古文根基实在不敢献丑，但拗不过朋友坚请，只好勉力从命。

序言的第一句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下笔当时心想，“束发受书”是句成语，大概都能懂得，只是繁体字的“髮”现在简化成了“发”，不知会不会引起误解。

果不其然，几天之后，出版社编辑打来长途电话，先是把序文谬奖了一番，接着问我：“你写的‘余束发’，不知是谁？”

我一听怔住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只好忍笑解释：“余束发不是人名，而是指我少年时代，古代小孩子都是垂发，故称‘垂髻’，上学才把头发束起来……”没等我说完，对方忙说：“这个我当然明白，我只是以为还有什么其他意思。那好吧！……”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放下电话，不胜感叹。既埋怨自己何必写这类“之乎者也”的东西；又叹息中国文化的断层如此之深。过去听过一则笑话，说是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开周会，领读《总理遗嘱》，读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忽然发问：“这‘余致力’是什么人？怎么资格比我还老？”我总怀疑这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想不到今天自己遇到了同类的真人真事，而且问题都出在“余”字上。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今天忽然又想起来，是因为昨晚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专业组）大奖赛上，给歌手出了一道综合素质测验题：“侯宝林的著名相声《关公战秦琼》中（凑巧得很，这又是与韩复榘有关的故事），关公和秦琼都是哪个朝代的人？”那位歌手对关公的朝代倒是答对了，可是对秦琼的朝代却说成是“汉代”。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对祖国的历史知之太少，二是像《关公战秦琼》这样几乎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经典相声也没有听过，或者说虽然听过，但由于太缺乏历史知识，至

今没有明白可笑在哪里。

我举这些似乎有点极端的例子，毫无嘲笑、贬损年轻人的意思，只是想借这由头发一点谬论：现在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教科书之外，“闲书”“杂书”看得太少，因而文史的知识面越来越窄。拿我们六七十岁的这一代人来说，在中学时代至少已经读过十几部中外文学名著；（江泽民同志就说过，他14岁就读完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到儿子、女儿那一代，多少还读过一点《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之类的现代文学作品。到了第三代，中学毕业连一本中外名著还没有读过的不在少数。基础如此，他们的文史知识如何丰富得起来？因此我常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光吃‘维生素丸’（教科书），而不吃‘五谷杂粮’（课外读物）。靠浓缩的‘维生素丸’只能维持生命，却绝对长不成健壮的体质。”可是，这能仅仅责怪孩子们吗？

现在，教育部门开始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为此提出要“减负”。我举双手赞成。但“减负”之后做什么？最近我注意看了几份报纸有关“减负”的画刊，多是反映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参加书画比赛，参观科技展览，参加公益活动，学习音乐舞蹈，游览名胜古迹，等等。这无疑都是好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张图片反映学生阅读文学名著和参观博物馆。看来这不是编者的疏忽，而是说明如何利用“减负”以后的时间扩大学生文史的知识面，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让学生们从小多吃点“五谷杂粮”吧！否则提高素质岂不又流于形式！

2000年7月1日



## 上海女画家忆旧

有朋自上海来，说起有些年轻学者打算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画家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上海画坛确实涌现一批名噪一时的女画家，流风遗韵，至今未绝。根据我的记忆，其中有擅画人物仕女的陈小翠、周练霞；擅画花鸟虫鱼的庞左玉、吴青霞、李秋君、陈佩秋、潘静淑；擅画山水的樊颖初、樊诵芬、顾青瑶、顾飞、鲍亚晖，后起之秀还有郁慕云、郁慕莲、郁慕洁三姐妹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在中国画史上，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这样一个女画家群体，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这种现象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的士绅富豪以及各类知识分子纷纷涌入上海租界避难，不少年轻的女画家就是在这时来到上海的。二是一批画坛魁首云集上海，先有江苏的吴湖帆、冯超然、吴子深、吴待秋、樊少云、王个簃、朱屺瞻、贺天健等，后有云间白蕉、西泠石伽、杭人唐云等等。在他们门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红颜弟子”。三是由于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书画市场，许多人就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分析一下，这批女画家大抵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数人出自名门望族。比如，庞左玉是江南大收藏家庞莱臣（虚斋）的侄女，自幼耳濡目染，眼界广阔，加之天资聪颖，出手便自不凡，师法恽南田花卉几可乱真。陈小翠是我国早期实业家兼诗人陈蝶仙（天虚我生）的爱女，其兄陈定山也是造诣很深的书画家和诗人，她的作品秀丽清新，有浓厚的诗情画意。樊颖初、樊诵芬是名画家樊少云之女、樊伯炎之姐，家学渊源，多才多艺，不但山水功力深厚，不让须眉，而且雅擅昆曲。顾青瑶是清代名画家顾若波的孙女，山水粗犷，有

男子之风。潘静淑是苏州大收藏家潘祖荫的侄女，又是大画家吴湖帆的夫人，在收藏极富的“梅景书屋”中，伉俪朝夕切磋，有“管赵”之誉（指元代大书画家赵松雪与夫人管道盥）。鲍亚晖则是上海著名会计师潘序伦的夫人。

第二个特点是她们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不仅善画，而且精通文史，擅长诗词。陈小翠是最突出的一个，属于我国近代少有的女诗人之一，著有《翠楼吟草》两卷，才思横溢，为诗坛所重。周练霞善填词，清丽可喜，“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语，曾广泛传诵。潘静淑生前有“绿遍池塘草”的警句，逝世后吴湖帆以此句求海内几百位名家题咏作画，后精印成册，传为艺坛佳话。顾飞为著名的“大漠诗人”顾佛影的妹妹，也写得一手好诗，与陈小翠唱和甚多，顾青瑶也是陈小翠的词友，顾在恋爱中，陈小翠曾填《虞美人》一词戏谑，有“知君心如小回廊，应有重重圻字嵌中央”之句（顾的未婚夫名字中有圻字）。

第三个特点是她们几乎都有名师传授指点。除上述家学渊源者外，有的在成名后还拜名家为师，如李秋君、陈佩秋、侯碧漪都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得意门生，名师出高徒，自然不同寻常。郁氏三姐妹，是上海著名中药店“郁良心堂”主人的女儿，都毕业于无锡国专，有很深的国学根基，抗战胜利后也曾拜张大千为师，得其真传。

现在，这批女画家健在者已不多。最可惜的是庞左玉、陈小翠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英年谢世，为画坛一大损失。才华出众但深藏不露、甘于寂寞的樊颖初、樊诵芬，现均年逾九十，但精神健旺，前些日子我曾和颖初先生通电话，听她声音清脆，还以为是她的孙女。画鲤神手吴青霞，现在还常在报端看到她的近作，工细不减当年，实在令人敬佩。

过去几十年，在回顾上海画坛变迁时，很少涉及这个女画家群体，我恐日久湮没不闻，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略叙一二。如能对后来学者研究时起点钩沉作用，则幸甚幸甚。

2000年7月14日

# 红楼忆吴梅

现在坐落在北京沙滩的国家文物局，原是当年北京大学旧址红楼。我在北京工作多年，虽然常常经过这里，却直到前几天才踏进它的大门。那天正是北京罕见的酷热天气，为了保护这座历史名楼，全楼不设空调，局长秘书朱晓东带我走了一圈，我已汗流浹背，不由得对长期生活在高温中的文物局工作人员生出几分敬意。

我们首先来到毛主席当年工作过的图书馆阅览室。室内陈列品不多，而且多是过去熟悉的历史照片，意外的是在一个不很显眼的墙角，发现了一首《北京大学校歌》：

景山门启鱣帙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好古雅的校歌，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定睛一看说明，原来是“文科教授吴梅”。

朱秘书告诉我，据考证，这首校歌是蔡元培校长挽请吴梅撰写并谱曲的。

我心头一震，许多尘封几十年的往事，刹时纷纷涌上心来……

从懂事起，我便熟悉了吴梅先生的名字。他既是外祖父蔡云笙的至交，又是母亲蔡佩秋的老师，算得上是我家的世交。吴梅先生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即吴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戏曲作家，年轻时就历任国立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不少

**B 调**  $\frac{4}{4}$

5 3 6 5 | 6̣ - 2 1 3 5 | 6̣ 1 6̣ 5 6 | 3 5 6 - | 6̣ . 5 3 3 2 | 北京大學校歌  
景山門 啓 鱣 帙 成 均  
1 3 2 1 - | 6̣ . 1 6̣ - | 6̣ - 3 5 | 6̣ - 5 1 6̣ | 5 - 6 5 | 3 5 6 5 5 3 |  
又 新 絃 誦 一 堂  
2 - 3 2 | 1 2 1 6̣ - | 6̣ - 6 5 3 | 2 2 - 1 | 6̣ 1 6̣ 5 6 | 6 5 3 3 2 |  
春 破 朝 昏 鷄 鳴  
3 5 3 2 | 1 - 2 - | 2 - 3 - | 3 5 3 - | 2 - 2 1 3 5 | 6 6 - 5 |  
風 雨 相 親 數 分 科 有  
6 1 6 - | 6 5 3 2 | 3 2 1 6̣ | 5 - 6 - | 6 - 5 1 6 5 3 | 1 3 2 3 2 |  
東 西 秘 文 論 同 堂 盡  
3 5 6 1 | 6̣ - 1 6 5 : 3 5 - : | 6 5 3 - | 5 - 5 - | 6 5 3 6 5 3 2 1 |  
南 北 儒 珍 珍 重  
6 - 1 2 3 | 5 6 5 3 | 2 3 2 | 1 2 1 6̣ - | 6̣ - 2 3 | 1 3 2 3 5 |  
讀 書 身 莫 白 了  
6 1 6 - | 6 6 6 5 3 2 | 3 2 1 6 5 | 6 2 1 6 - | 1 2 1 6 1 |  
背 青 雙 鬢 男 兒  
1 3 2 1 6 5 3 5 | 6 - 5 6 | 5 6 5 1 6 5 3 2 | 1 3 2 3 | 3 5 3 2 1 |  
自 有 真 誰 不 是 良 時  
6 - 1 2 | 1 3 2 1 6̣ - | 6̣ - 1 6 1 2 | 3 5 6 - | 1 - 6 5 | 3 - 5 3 2 | 2 1 6 1 |  
豪 俊 待 培 養 出 文 章 氣 節 少  
1 2 3 2 1 1 1 6 | 5 - 6 - ||  
年 人

文科教授吳梅撰

当年北大校歌的原件，现藏国家文物局

大学的教授，才华横溢，著述甚丰。在我记忆中，他生前和外祖父唱和不绝，仅为外祖父的旧居“五百梅花草堂”唱和的诗词就有近百首，可惜几经战乱，早已散佚，只记得外祖父有一阕《高山流水——题吴瞿安霜厓填词图》，中有“吟边梅花草堂稿，寻昔梦袖底诗篇”之句，下注：“旧赋瞻园梅花，霜厓继和各五叠韵。后作《五百梅花草堂歌》，亦有和作”。至于吴梅的手迹，我手头只保存了他从北方南归时写给我外祖父的一首五律：

生平谦若谷，垂老合还乡。  
铃阁频挥草，公车亦抗章。  
不须追国恨，同此话家常。  
吾已皤然叟，看君鬓渐苍。

诗写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八行朱栏信笺上，未署名，亦无年月，纸已破损。从语气上看，似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文革”以前，我家保存的吴梅先生书信、诗稿等墨迹不少，其中最珍贵的是我母亲结婚时，他赠送的四首贺诗。贺诗写在一幅泥金笺上，潇洒的书法，精美的装裱，配着红木镜框，显得十分华贵。我幼年朝夕相对，默诵在心，终身不忘。想不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从此不知去向。母亲常说，这是最大的损失。

母亲到了晚年，记忆力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回上海，她居然问我，你还记得吴瞿安先生的四首贺诗否，我说当然记得，便向她背诵了一遍：

咏絮才华别样工，秣陵几席两年同，  
传经绝似中郎女，五字诗成继国风。

大家文史续兰台，余事徵歌亦异才，  
解唱横塘梅子雨，闺中也有贺方回。

婿乡留得岁寒堂，藿粥家风第一良，  
修到眉楼文字伴，世间封诰转寻常。

五百梅花绛雪街，云璈方响奏韶咸。  
阿翁今日应添笑，玉女金童两不凡。

生 中 立 國  
 中 律 立  
 頻 中 律 立  
 日 峽 語 家 常 至 已 歸 姑 叟 看 君 鬢  
 漸 大 蒼  
 學 大 蒼  
 用 學 大 蒼  
 牋 用 學 大 蒼

这是近代词曲宗师吴梅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写给我外祖父蔡云笙的一首五律手迹，书法潇洒，一如其人。

母亲听了笑笑说：“你倒记得蛮清爽，不过你外公对‘眉楼’有意见，说是用典不妥。”

我感到惊讶。从此知道，对于心中最敬仰的人，是永远不可能从记忆中完全消失的——即使得了老年性痴呆症。

2000年7月30日



# 上海人的心气

从上海出差回北京，“上海老乡”总爱问一问：上海这几年变化真那么大吗？我告诉他们，上海确实变得连我这个“老上海”都认不得了，不过我觉得最新鲜的，还不仅是城市面貌的大改观，而是上海人“脾气”的变化。

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十多年前，从上海归来的外地人经常感喟：上海人怎么越来越“碰勿起”了？火气旺，脾气大，好像随时都准备找碴儿发泄一通似的。

“碰勿起”在公共车辆上表现得最突出。几乎每次乘车都会遇上吵架，有时可以从始发站一直吵到终点站。上海话的尖刻在这种场合发挥得淋漓尽致。起因无非是你碰了他一下，他踩了你一脚，或者雨衣上水珠蹭湿了谁的衣服。本来是鸡毛蒜皮，都可以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随着音量的升级，“纲”也越上越高，不上到最高峰不肯罢休。

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斗不过伶牙俐齿的上海小姐，便拿老实巴交的外地“阿乡”当靶子，专用“阿乡”们听不懂的语言出气。我曾在 20 路电车上看见一位山东乘客向售票员问路，那位训练有素的上海姑娘立刻用每秒钟五个音节的频率回答：“依过了马路一直往前头走，碰鼻头转弯再往歪朵（音 Huadou，意为斜角）里穿过去！”竟让那位听惯山东快书的客人听得目瞪口呆。

我也有亲身经历。有一次，在晃晃荡荡的车厢里，一个手插裤袋的小伙子老往我身上撞，我侧目看了他两眼，立刻招来连珠炮似的攻击：“依想适意，为啥不坐专车？我看依也勿像‘该’专车的人，轧轧电车已经蛮好了，装啥阔佬！”我气得本想回敬几句，无奈少小离家老大回，讲上海话的语言功能早已退化，心想哪是他的对手，只好把一口鸟气咽了下去。

上海人的火气为啥这么大？有人说是上海人的优越感使然。我倒不这么看，

总是为家乡人辩护：过去常说“长安居，大不易”，我看现在是“上海居，更不易”。不说别的，单说那人口密集，居住拥挤，道路狭窄，买菜困难，外地人就很难想象。普通市民半夜两三点钟上菜场排队；四五点钟就要开始生煤球炉；年轻人谈恋爱只有到黄浦江畔；老夫妻在儿女结婚之后往往只好搬进马桶间或者去电影院看通宵电影……年复一年，容易吗？再说，上海人一直承担着“快牛”的历史重任，可眼看外面城市一幢幢高楼平地拔起，一家家煤炉换上了煤气灶，心理能平衡吗？有点小脾气可以理解呵！

改革开放给上海带来了新的转机。特别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以后，上海的青春焕发得比谁都快。开明的政策一落到聪明加精明的上海人头上，立刻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什么快马加鞭，什么一日千里，都无法形容上海发展变化的步伐。当我听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赞叹“上海干什么干得那么漂亮”时，内心充满着对家乡的自豪。就这时起，我发现上海人的心气变得顺了，脾气变得好了。电车上吵架的少了，因为车厢不再那样拥挤不堪；菜场上发牢骚的少了，因为不用再半夜三更起床到菜场摆块砖头瓦片代表排队；城市上空的“晨雾”轻了，因为几十万户人家告别了煤球炉；黄浦江边的“情人墙”冷落了，因为林立的高楼一个个窗口透出了温馨的灯光……老百姓的心平气和，是离不开物质条件的呀！我突然想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那篇著名演说，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理儿。

知识分子往往不屑于“歌功颂德”，不过，该歌的功还得歌，该颂的德还得颂，尽管眼前的一切，离宏伟的目标还很遥远……



2000年8月12日

## 话说“洋泾浜”

爱泼斯坦、林戊荪、沈苏儒三位对外宣传专家，在8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应重视翻译工作和人才培养》的文章，针对当前对外交流中翻译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其中提到“洋泾浜”英语，引起我很大兴趣。

“老上海”都知道，洋泾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浜，位于从前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后来被填成一条马路，即今天的延安东路。所谓“洋泾浜英语”，是指那些没有受过正规英语教育的上海人说的蹩脚英语。它的特点一是不讲语法，二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爱泼斯坦等专家提出，现在如果在对外交往中还出现这种“洋泾浜英语”，和我国目前享有的国际地位太不相称。这个意见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从历史上看，“洋泾浜英语”也曾在对外交往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之初，除了上过洋学校、留过洋的少数知识分子外，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跟外国人打交道或为外国人办事的人，只能用“洋泾浜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洋行里的杂役，饭店里的西崽，巡捕房里的巡捕，商店里的伙计，洋人家里雇的仆人、保姆以至黄包车夫等等，大抵都会说几句“洋泾浜”，有的还说得非常流利。

说来奇怪，尽管这种“洋泾浜”谬误百出，洋人居然都听得明白。比如：接电话问对方“You is what”(你是什么)，洋人不但懂，而且也不以为失礼；保姆哄孩子：“Baby no cry, baby cry, 阿妈也 cry”(宝宝别哭，宝宝哭了，阿妈也要哭)，居然也能把孩子逗得破涕为笑。这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如果把当时的“洋泾浜”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出一本《洋泾浜大全》。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有两例：

——外国主人回家,看见玻璃窗被打碎了,便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喵喵喵,glass(玻璃)克郎当!”洋主人一听就乐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

——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电影院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指手划脚地告诉老板:“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ee,tomorrow see,same see!”老板也听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还是那个影片!

如果查一查当时上海一批老板、闻人的发迹史,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人是靠“洋泾浜”起家的。他们即使成了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说的还是“洋泾浜”。当然,他们的后代就大不相同了。

其实,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固然讲“洋泾浜英语”,外国人同样讲“洋泾浜中文”。比如把一个人说成“一只人”,把一条狗说成“一位狗”,把母牛说成“牛的母亲”,把鸡蛋说成“鸡的儿子”等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国老校长卜舫济,当时算是中国通,喜欢用中文讲演,但因为掌握不好中文的四声和抑扬顿挫,经常闹笑话。有一次竟然在大会上讲:“兄弟今朝有两个屁——放(比方),一个——屁放在中国,一个——屁放在美国”,引起哄堂大笑。直到去年,圣约翰校友集会时,白发苍苍的同学们还拿这故事互相调侃,笑得前仰后合。

时代在前进,语言也在进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深入,外语教育的普及,不但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外国人的中文水平也大大提高。现在有些中国青年人的英语说得比外国人还流利,有些外国青年人的中国话讲得比中国人还标准(加拿大的大山就是一例)。在这种形势下,“洋泾浜”将来也一定会逐渐成为历史陈迹。再过若干年,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洋泾浜”为何物了,故写了上面这篇文字,作为历史存照。

2000年8月24日



# 名医的医风

“医风”这个词是我杜撰的，它包括医生的仪表、谈吐和风度。

平时人们评论医生，经常讲的是医道、医术、医德，而很少讲医风。医道、医术、医德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医风也很重要。医生整洁的仪表，和蔼的谈吐，文明的风度，首先给患者一个良好的感觉，从而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这种心理效应，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相反，如果患者面对的医生是衣冠不整，语言粗鲁，态度冷漠，不管他医术如何高明，患者也很难对他建立起好感和信任，治疗效果恐怕也要大打折扣。

在三四十年代，我有机会接触过不少上海第一流的名医，他们的仪表、谈吐和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儿科专家富文寿、苏祖斐，内科专家董承琅、黄铭新，骨科专家牛惠霖、牛惠生，妇科专家王淑贞、王逸慧，精神科专家粟宗华，整形外科专家倪葆春，药学专家杨树勋，胸外科专家吴善芳等等，大都是早期的欧美留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而且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言谈和风度。他们有的厚重严谨，一派学者之风；有的和蔼慈祥，仁者之心溢于言表；有的举止潇洒，谈吐幽默，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总之，令人一望即感到可敬、可亲、可信。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淑贞和黄铭新。王淑贞出身于苏州望族，学贯中西，早年与我国大教育家吴贻芳同期留美，是我国妇科翘楚，有“北林南王”之誉。我见到她时，她刚四十出头，端庄高雅，梳着新式的横S发髻，服饰永远整齐讲究，颇有宋庆龄之风。与患者交谈时一口吴依软语，亲切细腻。因此求诊者趋之若鹜，她在愚园路411号的诊所里总是人满为患。有的患者说：“只要听王医生讲话，病就好了三分。”

与她相比，黄铭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高材生，在中国医

学界属于第一个得到美国 PHD 学位的佼佼者。他给人的整体印象是风度儒雅，才气横溢。白皙清秀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即使查普通病房，也穿着笔挺的西装或丝质长袍，外罩始终熨得平平整整的白衣。实习医生特别喜欢跟他查房，因为他不但善于对每个患者的病情作出精辟的分析，而且善于同患者交流，幽默的言谈往往给病房增添了欢快的气氛。遗憾的是，这种风格后来竟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受到批判。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在 1950 年也写过一篇针对他的讽刺小品，惹他生了一回气，至今深感内疚。1988 年，我到上海参加姑母的追悼会，遇见过他。当时我很想向他表示歉意，可是他已得中风的后遗症，行动、说话都不方便了。

在北京，也有一批这样医风高尚的名医。林巧稚大夫无缘见面，只能心仪；吴阶平、吴蔚然、方圻等几位倒是有机会接触过，也是如沐春风。由于他们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身上更有一种严谨、谦和、平易近人的特点。

去年，山东一位盲人中医写了一部脉学专著，托我转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题个书名。我本以为这很简单，或同意或不同意说句话就可以。想不到吴阶平仔仔细细地看了那本书的提要，特地把那位中医从山东请到自己办公室，耐心地听了他的陈述，然后诚恳地对他说：我很佩服你的毅力和成就，但我是西医，由我来为自己不懂的中医著作题写书名，会被内行笑话的，不过我可以给你题几句词，再介绍一位精通脉理的著名中医来题书名。一席话说得那位盲人中医非常感动，满意而归。我当时就想，这也许是受了周总理待人接物方式的熏陶吧！

总之，老一代名医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们不但应该很好地总结、继承他们的医道、医术、医德，还应该很好地学习、发扬他们的医风。良好的医风的本质是尊重患者，尊重他人，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的医务工作者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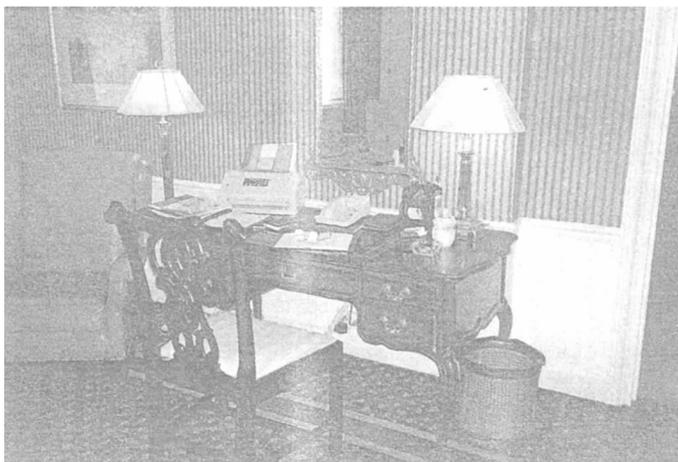
2000 年 9 月 9 日

## 华尔道夫饭店感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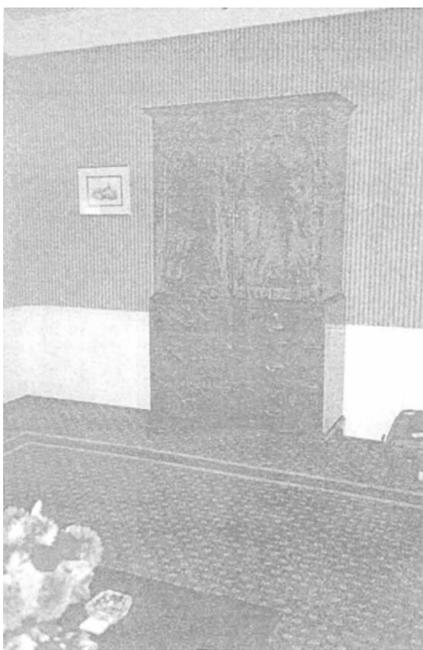
千年议长大会和千年首脑大会期间，由于不少国家的领袖下榻于斯，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

今年8月末，我作为陪同人员之一，随李鹏委员长出席千年议长大会。出国之前，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中国代表团将安排在美国最出名的华尔道夫饭店下榻。这家饭店号称“世界饭店领袖”，位于纽约市中心第五十街，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接待过无数国家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能够在这样高级的饭店住几天，太令人羡慕了。

因为事先有了这个介绍，等到亲眼看见华尔道夫，未免有点失望。比起现在许多现代化星级饭店，它实在显得太普通太落后了。外部，既没有宽广的停车场，也没有富丽堂皇的门面；内部，大厅不奢华，电梯很狭小，更没有五光十色的瀑布、喷泉之类人造景观。走进房间，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这样陈旧？整个色调是暗沉沉的，



华尔道夫饭店里的老式书桌，看来至少已有七八十年历史。



放在房间一角的这架衣柜，看来也有七八十年历史。

从沙发、衣柜、书架到书桌，都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物。墙上贴的是现在早已淘汰的暗红条纹墙布，地上铺的是现在很难见到的厚地毯。最突出的是那张蒙着漆皮面的老式书桌，四周布满钢笔刻画的痕迹。这样的陈设，即使在中国稍上档次的旅馆，也绝不会保存的。“世界饭店领袖”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岂不和它的名气太不相称了。

可是，住了两天之后，感觉就改变了，对室内的环境渐渐品出一点味道。夜深人静之际，坐在幽暗的落地灯下，环顾上下左右，所有的陈设好像一个历史老人在向你陈述一百多年来这里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引起你无穷的遐想：这书桌上的笔痕是谁留下的？这有点塌陷的沙发是谁坐过的？这磨得锃亮的黄铜抽屉把手留下过谁的手

泽？这狭狭的长窗前面曾经有谁久久伫立？这散发着混合香气的衣柜曾经存放过谁的衣裳？……他们都是哪些风云人物、社会名流、文豪巨匠、贵妇名媛？他们现在在哪里去了？据赵浩生先生介绍，这座大楼的顶层，曾经是那位在二战期间战功显赫，后来兵败朝鲜战场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包房，他被解职后一直默默地住在这房间里直到老死。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睁眼看着这多极化的世界，全球化的经济，看到全世界的首脑坐在联合国大厦里讨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不知该作何感想？

于是，我明白了：华尔道夫饭店的名气，不在于它的时尚，而在于它的历史；许多人喜欢住在这里，也不是为了享受豪华，而是为了感受历史。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就是它独特的名牌效益。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已经享尽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物质享受，逐渐厌倦于那种浮躁纷华的现代生活，开始怀恋旧日的宁静和朴素，向往大自然的回归。华尔道夫饭店之所以刻意保持它的“旧貌”，而不去追逐“新颜”，可能正是看准了社会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它的“守旧”，恰恰成了“领导世界新潮流”的资本。

就像那同样有了上百年历史的《华尔街日报》，至今还保留着创刊时的编排形式，没有彩页，没有照片，而它的发行量历久不衰——因为读《华尔街日报》已经成为美国上流社会身份和格调的标志。

我不清楚华尔道夫饭店历届主人的这种做法究竟是出于保守而“歪打正着”，还是他们独具远见卓识，预见到世界潮流的变化。不过有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那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的头脑。

2000年9月30日



## 为“五分钟发言”鼓掌

人们可能注意到,这次千年首脑大会和千年议长大会议都规定代表发言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违者大会主席有权令其停止发言。

起初以为这不过是规定而已,未必真能实行。不料确是毫不含糊动真格的。千年议长大会议第一天大会发言,第一个上台的是日本代表,发言刚超过规定时间,主席毫不客气地敲钟制止,那位日本代表只好“紧急刹车”,还连连向台下鞠躬表示歉意。

这个“下马威”还真起作用,后来发言的代表再没有一个超时。这样严格执行规定的结果,使所有要求发言的代表都得到了机会。千年议长大会议最后一天,发言人竟达70多人。也许有人会想,5分钟能说多少话呢?可能都是走个过场罢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样隆重、严肃的国际会议上,代表们发言都是要阐述本国立场、观点的,岂能造次。由于时间限制得如此“苛刻”,代表们必须把原来准备好的书面发言稿加以大大浓缩,下一番去芜存精的工夫。这样做不但无损原意,反而使内容更加集中,观点更加鲜明。江泽民主席在千年首脑大会上的发言,纵论世界形势,全面、深刻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仅用了5分钟。李鹏委员长在千年议长大会议上的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仅用了4分40秒。他们的发言,都充分表达了中国的声音,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实践证明,即使像千年首脑大会和千年议长大会议这样关系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会议,也完全可能做到讲短话,而且并不影响会议的圆满成功。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会议不能参照这样做呢?(当然,有些工作性会议的发言不可能都只讲5分钟,但要求短些再短些,则是完全没问题的)

事实上,开会讲短话比讲长话要难得多。把原来需要半小时才能表达的内容压缩到5分钟,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需要重新提炼,重新构思,并且把

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毫不可惜地删去,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丰富复杂的内容表达出来,实在太不容易了。对于发言者来说,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其本身素质、水平的一种检验。

对比之下,我们许多会议的发言实在太长了。由于对发言时间缺乏真正严格的控制,大量发言空话连篇,套话连篇,言之无物,听之无味,本来一天可以开完的会,非要抻到两天、三天,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用鲁迅的话说,属于“谋财害命”。现在不是常讲要“和国际接轨”吗?我看在会议发言问题上倒是可以试着好好“接”一下,“接”好了大有益于现代化建设,也可以大得人心。

因此,我建议不妨大力提倡一下“五分钟发言”,甚至把这作为一种刚性规定来执行。持之以恒,必能大大有利于转变会风。至于这样做了会不会影响会议的质量,这就要看我们能否提高自身的议事水平了。据我国一位前任驻联合国大使说,有一次卡斯特罗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发言,会议规定不超过5分钟,他却只用了3分钟,讲得十分精彩,结果全场为他鼓掌鼓了6分钟,等于发言时间的2倍。这不充分说明问题了吗!

2000年10月13日

## “世外桃源”爱鸟情

地处北大西洋中部、靠近北极圈、仅有 28 万人口的冰岛共和国，是一块神奇绝伦的土地。李鹏委员长不久前访问这里时，称它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在短短两天的逗留中，我们看到了令人心骇神移的北极光；看到了被誉为“世界上最清洁的城市”——首都雷克雅未克；看到位于美洲板块和欧亚板块交界处的“裂谷”景观；看到了气势恢宏、色如彩虹的“黄金瀑布”；看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间隙喷泉区；看到了集发电和热水生产功能于一身的地热电站；看到了正在探索人类常见病致病基因的世界最先进的“基因译码公司”……它和人们想象中酷寒、荒凉的冰岛大不一样。

但是，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冰岛人对大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对鸟类的深厚感情。

也许是由于自然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冰岛人特别“好客”，冰岛的鸟类特多，大雁、天鹅、鸳鸯、燕子、丹顶鹤等等云集于此，冰岛人就像对待尊贵的客人那样善待它们，不但绝对禁止捕杀，而且禁止惊扰，把它们当作自己儿女一样精心呵护。据说，有一次一只母雁在公园高尔夫球场的球孔里下了一个蛋，公园管理人员视若珍宝，立刻在它周围画了一个直径十多米的“警戒圈”，不许任何游客靠近，好让母雁安静地在里面孵雏。游客经过这里，都把脚步放得轻轻的，没有任何人围观。

冬天，下过大雪，鸟类觅食困难，冰岛人就家家户户连夜赶烘面包，全家开着汽车把大袋大袋的面包送到郊外喂鸟。鸟类也通灵性，听见汽车声马上翔集路旁，“夹道欢迎”。这既是冰岛的一景，也是冰岛人的一乐。

冰岛人爱鸟的感情，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们刚懂事，父母就给他们讲益鸟对人类、对环境的好处。在学校里，老师向他们进行爱鸟的教育，把爱鸟作为培养孩子们美德的课程。国家也制定了爱护鸟类、不准残害鸟类的法律。可以说，冰岛是一个鸟类真正的天堂和乐园。反过来，爱鸟又陶冶了冰岛人慈爱、善良、纯朴的

性格。

我国驻冰岛大使王荣华的夫人魏松涛告诉我,有一次,一个七岁的冰岛孩子在大使馆花园内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鸟,以为是被大使馆的狗咬伤的,便捧着小鸟来找大使,哭着要上法院去“起诉”。经过大家再三解释和劝说,那孩子才满脸泪水地捧着那只小鸟回家给它治疗。这件事使大使馆人员非常感动。

后来我问别人,这样小的孩子去“起诉”,法院难道真能受理吗?他回答说:“这很难说。为了这样的事情,孩子们不但敢上法院,说不定还敢去找总统。因为总统家里是不设防的,除了养一条狗外,连一个警卫都没有,人们可以随意出入。有时邻居老太太丢了猫,也跑到总统家去,要求总统帮她找一找。”

这真有点像现代《桃花源记》了。

2000年10月28日



## 云南鲜花论斤卖

生长在江南水乡苏州，对卖花、买花有一种天生的情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样的佳句蕴含的诗情画意，也只有姑苏城里的人体味最深。

记得童年时代，春雨后的清晨，小巷深处便传来“栀子花来——白兰花……”悠长的卖花声。音色甜美而略带哀婉。这时，祖母就“呀”的一声，打开后门，用几枚铜板从围着竹裙、挎着小篮的村姑手里，买下一两串带着露珠的白色小花，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或者挂在房间的门框上。于是，一股浓郁的花香便终日在家里弥漫，带来一种温馨的气息。

那时候人家买花，数量都很少，多者三五枝，少者一两枝，甚至只有一两朵。这恐怕与当时卖花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宗交易有关，也与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关。后来到了上海，才看到鲜花店，看到论束卖的鲜花，但顾客多是富人和洋人，普通老百姓是不敢问津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丰富多彩，花卉业开始大行其道，鲜花的功能也日益强化。然而，几块钱一枝的康乃馨，上百元一束的红玫瑰，毕竟还不是寻常人家能够经常享用的。因此，常常勾起我对小巷卖花声的回忆。

最近到云南昆明开会，听到“云南八大怪”之说，其中一怪就是“鲜花论斤卖”，或曰“鲜花不如青菜贵”。开始以为是艺术夸张，后来众口一词说纯属事实，这就引起我的好奇。会议闭幕返京之日，在上飞机之前，主人便领着我们一行去昆明市斗南镇参观那里的花田和花市，果然大出所料，大开眼界。

进入斗南镇境，只见成片的粮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花卉塑料大棚，里面培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这种景象，几年前曾在荷兰见过，当时曾感叹中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花卉产业，想不到在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指挥下，这种新兴产业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已经形成气候。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斗南花卉市场。原来以为,所谓市场大概就像农村的集市,没想到竟是一个3000多平方米、钢化玻璃盖顶的大厅,里面人山人海,既是花的海洋,也是人的海洋,我们十几个人进去之后,很快便淹没在“海洋”之中互相找不着了。姹紫嫣红、浅蓝淡白的玫瑰、百合、康乃馨、马蹄莲、勿忘我、蝴蝶兰、非洲菊、满天星……成排成堆,真是花团锦簇,蔚为奇观。

为了证实“鲜花论斤卖”“鲜花不如青菜贵”的真实性,我首先向花农问价。他们的要价一般是:勿忘我每公斤3元;康乃馨每枝6分至8分,两元钱一大捆;红玫瑰10元一束(20枝),马蹄莲6元10枝。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清楚,只知在北京一枝康乃馨就卖1.5元,比这里贵十多倍。我正准备掏钱买一点,当地陪同人员急忙拦住我说:“不行,太贵,让我和他们讲讲价……”据说,下午收市的时候,连红玫瑰也只消花几角钱就能买上一大束。

大批量生产的价廉物美的鲜花,使得云南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买花和买菜成为城市人民日常生活中同样不可缺少的课程。清晨的街头,人们左手一篮菜、右手一束花,已是昆明一景。我曾问昆明的同志:“鲜花论斤卖”会不会导致“花贱伤农”?他说你放心,因为大宗的鲜花是运往东南亚国家和香港、澳门以及各大城市,都能卖好价钱,在本地花市上卖的只是零头,所以花农决不吃亏。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把云南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人才优势充分调动起来了。你到机场看看,每天所有的航班,都满载着空运鲜花的箱子,你想这是多大的收入!

我到机场一看,果然。

2000年11月19日

## 换个角度谈张謇

不知什么原因，南通张謇和苏绣大师沈寿的故事，近年来又被“炒”热起来，而且着眼点多在两人的感情纠葛上。对于这类个人隐私，我本无兴趣，因为七八十年前的人尚且说不清楚，指之者谓有，辩之者曰无，何况今人？即使“考证”得水落石出了，又有何意义？

值得重视的倒是，这个感情色彩很浓的故事，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

张謇，字季直，是清末的状元，又是名震一时的大学者和大实业家；而沈寿当初不过是苏州一名比较著名的绣花女，两人地位悬殊。把他们两人命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对复兴苏绣传统地位的共同志愿。清末民初，随着上海开埠而发生的苏州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转移，曾经盛极一时的苏绣行业逐渐衰落，沈寿也陷入困境。正在这时，张謇为了挽救苏绣的颓势，防止苏绣传统工艺的失传，特地把沈寿聘到南通，为她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让她潜心研究苏绣的创新，又为她开办了刺绣学校，由她精心传授绝艺。据记载，这座刺绣学校在八年中培养出了 150 名传人。在沈寿晚年生命的最后阶段，张謇又亲自倾听沈寿口述绣艺针法，加以笔录，编成《雪宦绣谱》。由于张謇的热心支持和资助，沈寿的刺绣技艺得以完整地传承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今天，每当我们看到苏绣制品在国际上享有的盛誉，不能不感谢张謇和沈寿为复兴苏绣通力合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至于他们之间的一些遗闻轶事，在他们共同创造的事业面前，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之所以要重提这段旧事，是由当前许多民间传统工艺的式微和失传引起的。半个多月以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在云南昆明召开了一个“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会上，来自 16 个省、区的代表，列举大量事实，痛陈目前许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工艺）正处在十分严重的危机之中，有些绝艺后继无人，人亡

艺绝,随时都有流失和失传的危险。分析其原因,除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等等客观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认识、不重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缺少有识见、有魄力、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来关心这项关系到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事业。有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成败与否,取决于人的因素。实践证明,不论在一个县、一个乡,或是一个村,凡是有思想文化素质较高,具备一定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县长、乡长或村长,那么这个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就能受到重视,落到实处。”

出于这样一种共识,我在座谈会结束时讲了张謇和沈寿的故事,很多与会者听了为之动容。最后我说:“一个旧时代的官员和文人,能够这样热心去具体扶植一种传统民间工艺,扶植一个民间艺人,并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作为先进文化方向代表的共产党人,应该也有条件比张謇做得更好、更自觉!”

我衷心地期望这些微弱的呼声能够产生一点积极的回应,而不致完全淹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声中。

2000年11月29日

## 变在不知不觉中

不知不觉的变化，往往是最真实的变化。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写的是春天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弹指偶然成独笑，伸欠不觉付微唉”，写的是光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未直露“不觉”二字，实际也是隐含目的地在不知不觉中迫近。

坐飞机、乘轮船，舱中的旅客总是觉得好像原地未动，埋怨太慢，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是“呼吸万里”。站在地面或岸上的人，才清清楚楚看见它们在飞速前进。

对于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也是到了外国比身在国内看得更真切。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往往觉得不如人意之处很多，一出国就惊叹中国变化太快、太大。

我前后去过两次美国。第一次是1985年初，第二次是今年8月。相距不过15年，重来却有一种隔世之感。

我不想引用一些官方的统计资料，只想说三个切身感受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人不再那么穷了。1985年那次访美回来，人们问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发现中国人太穷了。过去觉得穷是一种光荣，现在感到穷是一种耻辱。”这话怎说？我说，你想想，哪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口袋里只有30美元的？而我们所有的代表团成员确实都只有30美元。名为“零用钱”，实际上连公共汽车都不敢坐，更不用说请朋友喝杯咖啡了。不少同志还把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想等以后凑起来买个“大件儿”。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尽管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是“大款”，连“小款”都不够资格，但囊中不再那么羞涩却是事实，有时也敢大大方方地邀请外国朋友吃顿便餐，真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

第二个变化是对什么都不再觉得特别新鲜。15年前到美国，什么都新鲜，什么都羡慕，走进超级市场，五光十色、见所未见的商品把人看得眼花缭乱，连塑料薄膜

包白菜、鸡肉分部位卖这些事都当新闻往国内发稿。这次我只进过一次超市，转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竟然觉得北京、上海有些超市比它们还丰富多彩。至于旅馆客房里为旅客准备的针头线脑、香波浴液、信纸信封、火花纸巾，现在再也没人当作新鲜玩意儿带回家向人“显摆”了。上次访美，主要是考察新闻媒体现代化的印刷、传播手段，看到激光照排、电脑拼版、卫星传送，简直像看《天方夜谭》，回国一说，人们都认为中国报业要走到这一步，至少得过半个世纪。这次去，有人问我是否还想参观一下报馆，我没有去成，倒不是完全因为没有时间，主要是这些先进印刷、传送设备，中国只用几年时间就已基本普及了。

第三个变化是到处都能看到中国货了。上次访美，最令人沮丧的是，除了地摊，任何商场、商店都很难找到中国商品。有一次在一家小照相器材店橱窗里发现一架上海产的“海鸥”牌方型反光照相机，便如他乡遇故知，惊喜不已。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服装、家用电器、鞋类、玩具、照相机等等大量地占领了美国市场，以致我们“一不小心”就把中国货买了回去。我们代表团一位同志在纽约买了一件价廉物美的西装，非常高兴，回到驻地，浙江省人大主任李泽民同志仔细一看说：“很可能是我们温州的产品！”更戏剧性的是，李泽民同志这次出国之前，老伴再三叮嘱他给孙子买一辆美国制造的玩具汽车，李泽民在纽约跑了几趟商场，都没找到理想的，最后才看中了一辆，买下来一看还是“Made in China”。他不但不失望，反而感到很自豪。

当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身边的变化绝不止这三个；而且也绝不能凭这些变化来说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差距了。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写下了这点滴感受，无非想长一下自己的志气，增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勇气和信心。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任何进步和发展都既是过程又是起点。著有《二十二史劄记》的清代大史学家赵翼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争日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觉陈。

我看，赵翼倒好像预见到中国的今天似的。

2000 年 12 月 17 日

## 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从2000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上读到魏久明悼念胡绳同志的文章，其中提到胡绳在最后日子里写的一篇文章，是为一位名叫黄克定的老同志的音韵学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写的序言。读后异常激动，以至夜不成寐。因为黄克定是我的患难之交，而我又是他殚精竭智撰写这部著作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我万万没有想到，在黄克定逝世三年之后，重病中的胡绳还念念不忘完成故交当年的嘱托。

《百年潮》的文章是这样概述此事经过的：2000年秋天，胡绳同志已进入病危阶段。他自知来日无多，便带着一部分未了的心愿来到烟台和上海，边疗养边工作，其中就包括为早年上海复旦中学老同学黄克定的著作写序言的“任务”。文章说，“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根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辽西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天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汉语音韵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2000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同志写序言。”“胡绳答应为他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2000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这时胡绳同志“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

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魏久明同志的悼念文章中，胡绳为黄克定写序只是一个事例，写得这样详细，已经很难。但是作为一个“知情者”，我觉得还有必要做一些补充。

黄克定完成这部专著，前后历时 30 年，最艰苦的是“文革”中的十年，他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和生活条件。当时我家和他家同时被流放在辽宁省最贫瘠的西部山区——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两家仅相隔一个山头。我们亲眼看见他冬天在滴水成冰的破屋里，裹着棉袄、拥着棉被，蜷缩在炕梢一角，靠着一盏油灯，不分昼夜地写作。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困了纳头睡几十分钟。除了他的夫人，周围谁也不能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做这类学问为的是什么。许多人在背后说他是神经病，连我这个多少读过一点音韵学的人，都劝他停止这种“无效劳动”：“你与其写这种永远不可能出版的书，还不如帮你老伴干点活。你看她累得多可怜！”可是他夫人总是说：“你别阻挡他，他做的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将来会有用的。”

黄克定请胡绳为这部著作写序，绝不是想利用“名人效应”。他是一位十分清高的知识分子，从来鄙视攀高结贵。因此在写书的过程中，从未求助于人。而且他和胡绳只是中学时的同学，几十年没有来往，彼此都记不清对方是什么样了。只是到了 80 年代书已完稿之后，联系出版社到处碰壁一筹莫展，加上突发脑血栓瘫卧在床的时候，才万般无奈地向胡绳这位老同学写信求援。偏偏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胡绳在一年之后才看到这封信。在这等待的过程中，黄克定已感到无望，我还对他泼过冷水：“现在胡绳同志身居要职，恐怕不可能为一个普通老同学做这样的小事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胡绳为此书的出版和序言操了那么大的心，出了那么多力。

胡绳同志为黄克定著作的作序和出版如此认真负责，绝不仅仅是出于同窗情谊，主要是被黄克定的精神所感动。他说：黄克定投身于音韵学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最近，我才看到胡绳为写序和出版事宜与黄克定本人及其家属的五六次通信。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充满热情的关怀、安慰、鼓励和承诺，甚至对联系出版的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详详细细。这种古道热肠，在当今社会实在已属罕见。

龙定总：十月十日手书敬悉。前寄来大作已擅为“一分为二”，一寄《论书》，论介已告成将在近期付印，另一则经中华书局、华师友、书化局版如下。

胡绳同志：

寄来龙定总手稿，已转中华书局《文史》编者，为不占用，兹再转《中华文史论丛》，该刊原係中华总社上海编辑社编辑出版，现中华总社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该刊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不注村间，顺好

文友

陆克明上

十月九日

我也有高血压病，但不严重，每日从能读几片，除此外除睡片刻，一般仍能维持正常血压。近下晚常现有心悸，常伴头痛，且使其甚重。音韵学我完全反对，但如需对古音韵学予以再研究。世人对音韵学，即要出入门必重研究，但我对古音韵学，即果在休息之余，有闲空，可以再来。

马世印

电话 55.6848 电报挂号 6848

德安。

介绳 十月九日

②

为黄克定的音韵学著作出版问题，胡绳同志与作者书信往来十多次，并帮助向多家出版单位联系推荐。

如果合观兴编原书及二平刘批,请化不改志同的。  
信也中言信,我手里有陈久成的原件,也奉送到张也,  
你再注吧。

## 范敬宜的批语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克定兄: 五月二十七日函敬悉, 始知去年保管有信件, 是  
为保存研究。然并未带研究也。去年上学时专业不分工, 通而  
通, 一书未与取再去。去年八月到田, 今年十月到田, 因为工作繁忙, 故  
未作如此大整理。田中二篇根据经验, 是有此大作的, 但不  
取时不取, 我即是意。以去, 田中二篇是, 也增加了点笔记。在  
加哥可也, 主要是由于田中去了一个代表团, 有威信, 是早  
改各各任, 有不在此, 人重读可矣。不过由田中到田  
山, 莫不各各, 可也合叙一, 田中二篇, 也开了先例。

来谈经济, 混乱状态, 使人烦躁。我想, 你已了  
的,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一也,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信上这信, 来谈是,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我尚未去查, 研究会上, 来谈,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田中二篇,

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到胡绳同志对人的热忱。信尾署名“邀”, 系胡绳同志原名“志邀”的简化。

在胡绳同志的倾力支持下,黄克定的这部专著最近即将由辽宁出版社出版。

可惜作者本人和胡绳同志都不能看到它的问世了。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既是学术界、出版界的佳话,又留下了令人心酸的遗憾。作为一个目睹这个故事全过程的朋友,行文至此,只能祈祷这一类遗憾今后少些、再少些。

2001年1月21日



## 踏雪想“闲事”

岁朝清晨，一场瑞雪把京城装点得粉妆玉琢一般。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雪了！我早早出门，踏雪履冰，穿过大街小巷，一边漫步，一边欣赏着远远近近的琼楼玉宇、银树冰花，深深地陶醉在大自然塑就的清涼世界之中。

赶早走亲串门拜年的人们，拎着五光十色的礼包，兴冲冲地赶路。这和往年春节没有什么两样。惹人注目的倒是出奇丰富多彩的冬装。除了流行的法式黑色长绒细身大衣，火红的俄式披肩大围巾，最抢眼的要数古色古香的中式棉袄。女的多是彩缎织锦，男的多是团花贡缎，好像昨夜春节晚会上的时装表演全部“克隆”到了生活中来。自从去年张曼玉的《花样年华》引发了一场“旗袍热”后，看来服装的回归趋势正方兴未艾。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变化，好像谁都不很注意。人们各走各的路，擦肩而过的姹紫嫣红没有赢得太高的“回头率”。倒是我这个过了时的老记者，被眼前的“新闻”搅得内心如“吹皱一池春水”。

可不是吗？如果时光倒流到 20 年前，面对如此的新潮流，凭着我的“新闻敏感”，又该做好如何迎接即将来临的批判风暴的思想准备了，又该猜测批判的调子将会定在“复辟”还是“自由化”上了。因为，服装向来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一番花团锦簇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场口诛笔伐，最后以百花凋零告终。这样的“经验”对我们那一代新闻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太丰富了。

说起来，在那一场又一场的反复中，最可怜的要算是新闻工作者。刚宣传过裤脚七寸的牛仔裤如何经济洒脱，又要批判这是“美国生活方式”了；刚赞美过裤脚一尺有余的“喇叭裤”是敦煌遗范，又要批判这是“资产阶级歪风”了；刚考证完低胸裙服是唐风宋韵，古已有之，又要批判这是腐朽的“奇装异服”了。批来批去，结果谁也没有弄清裤脚、领口究竟几寸算是无产阶级，几寸属于资产阶级。“此情可待成追忆”，人们对那段历史可能早已淡忘，或者仅仅成为茶余酒后的笑谈资料，可是对

新闻工作者却不那么轻松,因为白纸黑字永远立此存照,任何时候一看就会汗颜的。

因此,每当看到今日中国的服装时尚越来越国际化,“奇装异服”已成为一种正面概念,人们甚至对“露脐装”、“吊带裙”也不再投以惊诧、鄙夷以至愤怒的眼光时,作为“老新闻”真正感到过去的岁月里,在做了许多好事的同时,也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的“闲事”,至少是在裤脚、裙长究竟应该是几尺几寸这类“闲事”上花的精力太多。如果把这么多精力投放在认真研究些正事、大事上(比如如何加快发展经济、科技、教育事业,如何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等等),我们为社会作的贡献肯定会大得多。

就凭这一点,我也为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庆幸,羡慕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祝愿他们不会再为认认真真管“闲事”浪费青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珍惜今天的舆论环境,不要把宝贵的年华和精力投放到另一些不值得做的“闲事”上。

2001年2月5日



## 春夜听琴

“立春”前夜，恰好在深圳开会。北方此刻正在雨雪霏霏，这里却是草木葱茏，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早春气息。

白天开了一整天会，不免有些疲倦，晚上不到 11 点就准备就寝了。忽然接到电话，通知我们几个开会的同志到李鹏委员长住处去。这么晚了，会有什么要事？大家纷纷猜测。我开玩笑说：可能首长想“犒劳”我们一下吧！

我猜得不错，不过“犒劳”的不是酒食，而是音乐——欣赏“钢琴王子”李云迪的钢琴演奏。原来，李云迪目前正在深圳市艺术学校深造。这天晚上，深圳市长于幼军带他来见李鹏同志，自然要让他一显身手。李鹏同志便想让我们去分享。

我们走进客厅，李鹏同志就把这位年仅 19 岁，梳着肖邦式长发、举止文雅的青年钢琴家介绍给大家：“李云迪是第 14 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一名，大家都知道，肖邦钢琴大赛是国际钢琴的顶级赛，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得过这项大赛的第一名。近 15 年来，两届大赛的第一名都空缺，可见要求之严。去年 11 月的大赛中，就是这位李云迪，以绝对优势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金奖获得者和首次获得第一名的中国人，为中国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李鹏同志讲完，便伸出左臂，请李云迪开始演奏。李云迪选择了肖邦著名的《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李云迪端坐在钢琴前，沉静地一扬左手，大厅里立刻忽如风雨骤至，电闪雷鸣；忽如清泉奔涌，碧波荡漾；忽如云开日出，霞光万丈……他那修长灵巧的手指，把人们的思绪引进了 19 世纪风云变幻的波兰原野、群山。

一曲终了，掌声不绝。李鹏同志也许不知我是“琴盲”，也许想考考我的音乐知识，忽然向我发问：“老范，你感觉如何？”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脸“刷”的一下红了，硬着头皮回答：“我觉得他对肖邦的

作品有非常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噢，理解。那么你对李云迪又有怎样的理解？”李鹏同志继续考问。

我只好直言坦白：我的音乐知识太差，对肖邦只是从五十多年前在上海看过的美国电影《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里了解那一点点。要我评论李云迪，确实没有资格。

李鹏同志哈哈一笑，未再深究。

曲终人散，回到房间，我已倦意全消。在回味李云迪琴声的同时，也对自己方才不满意的回答感到懊恼。想着想着，忽然又想起1956年春天，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老舍先生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傅聪从波兰获奖归来，在北京开了一个钢琴演奏会。许多外国朋友听了赞赏不止，其中有人问到陪同的一位青年作家感觉如何时，他只讷讷地说了四个字：“弹得很响！”出了个大洋相。

老舍先生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勉励青年作家们要全面提高文学艺术修养，包括音乐、绘画、书法、戏剧等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家。

后来，又听到著名国画家谢稚柳先生讲：有时陪同一些领导干部和作家参观展览，他们的赞语往往是“画得真像！”实在大煞风景。因为“像”不是绘画的标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1000年前的苏东坡就认为，说“画得真像”的人，见识和小孩子差不多。

“听琴听响”，“看画看像”，当年听到这两句话时，也曾暗自惭愧，觉得自己也相差无几，很想发愤弥补一下，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好像长进不大。现在再下决心重新开始行不行呢？记得苏州有句老话：“七十岁学当吹鼓手——晚了。”尽管如此，这番春夜听琴的感受还是应该写给《夜光杯》的，因为，后面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呢！

2001年2月18日

## 柯灵在我家疗伤

在我童年，隐约听说著名作家、报人柯灵先生曾在我家苏州旧宅度过一段艰难的“隐居”生活。当时因为年幼，家里的规矩又不许小孩管闲事，所以从未细问过此事。五十多年来，这对我始终是个谜。

最近，版本目录学家王佩净的曾孙王学雷给我寄来一本《苏州史志》。翻阅一下，居然发现有一篇《柯灵和庙堂巷范宅》，大为惊讶。原来这篇文章讲的正是我一直不得其解的“谜底”。

文章是这样说的：“1945年6月，抗战进入后期，上海日本宪兵队垂死挣扎，发动大逮捕。《文汇报》的严宝礼、柯灵、储玉坤、费彝民、袁鸿庆5人在同一天被送进牢房。5人这次遭到严刑逼供，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毒刑都受过了，他们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再加外界营救，先后获释。柯灵受刑最重，而且是最后获得自由的一位。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两腿无法行动，必须好好休养。但如留在上海，环境险恶，也许还有再度被捕的可能。此事被沪上允中女中（注：即今上海市十一中学）的一位女教师蔡佩秋获悉了，蔡是北宋范文正公第26代后裔范端信之媳，范敬宜的母亲，沦陷时由苏寓沪。她本着范氏遗训，建议柯灵到苏州庙堂巷10号范氏故居养病。于是柯灵住进了庙堂巷，在范氏亲属的照顾下，由家属悉心护理，服药养伤，经过一个多月光景，步履如常。柯灵辞别范宅，回到上海，和佐临、师陀、唐弢等一起离沪，取道杭州拟通过封锁线奔向内地。当他们滞留杭州的时候，8月15日，街上沸腾，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柯灵一行折返上海，开始了新的行程。但是他始终忘不了蔡佩秋先生的仗义相助，忘不了在庙堂巷疗伤的日子……”

读了这段文字，我悲喜交加。喜的是总算弄清了这件事的始末，悲的是母亲已不在人间。作为她的儿子，竟然不清楚她生前的义举。要知道，当时柯灵是日本宪兵队追索的“要犯”，隐匿这样的“要犯”是有杀头危险的。日本宪兵队的凶残世所

共知，母亲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掩护一位地下工作者，需要多大的勇气！怪不得外公经常称赞她“大智大勇”、“侠肝义胆”。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母亲做了这样一件大事，始终守口如瓶，从不张扬，甚至在子女面前也讳莫如深。特别是柯灵在抗战胜利后办起了《文汇报》，解放后更是声名日隆，母亲就从来不在人前谈起此事。因为她觉得这是微不足道和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她的一贯性格。当我十周岁的时候，她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这么一段格言：“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人施慎勿忘……”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她从来没有带我去见过柯灵，甚至我大学毕业前去投考《文汇报》，她也没有找过时任总编辑的柯灵要求“照顾”，以致我始终没有见过柯灵一面。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读了《柯灵和庙堂巷范宅》一文后，我兴奋地给上海的敬敏姐姐打了一个电话。她也和我一样，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只是补充了一点：柯灵本人在庙堂巷旧宅可能居住的时间不长，他的家属则住了大概有七八年之久。这就使我回忆起，80年代初，我在沈阳工作的时候，曾经收到过柯灵长子的来信，里面提到：我们几个孩子曾在庙堂巷度过了难忘的童年，至今还记得那座园子里的梧桐、腊梅、芭蕉、假山……

2001年3月3日



# 革命的“铜豌豆”

——任仲夷的达观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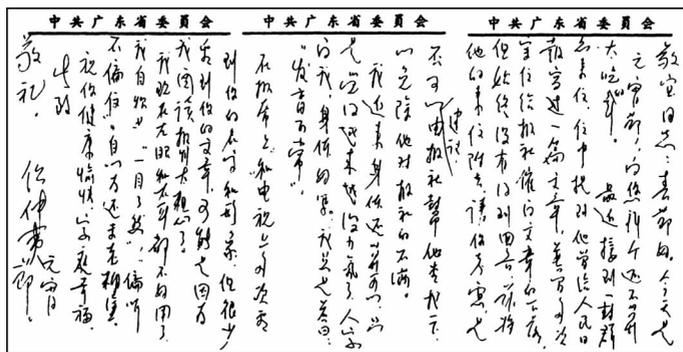
一年前，我写过一篇《任仲夷的幽默》，在《夜光杯》发表以后，曾被好几家文摘报刊转载，还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对任仲夷同志的开明、开放和敏锐表示由衷的钦佩。

其实，与任仲夷同志大量睿智的言论相比，我那篇短文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不久前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记载的就丰富得多。

任仲夷同志从一线退下以后，在和他有数的几次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的幽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达观的人生态度上，这恐怕是他健康长寿和始终保持清醒、敏锐头脑的重要原因。

前几年，任仲夷同志动过两次大手术，一次是胃切除，一次是胆囊摘除。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这样两次大手术难免会在精神上形成沉重的压力。可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精神负担。他乐呵呵地告诉我：“前年我摘掉了胆，从此变成了‘浑身是胆’；去年我切除了胃，从此变成了‘无所畏（胃）惧’，真是一身轻松啊！一个人只要参透了生死，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自己压倒！”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解嘲，甚至觉得这种幽默感的后面含着某种无奈和酸楚。后来，看到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一如既往地发表深刻而又尖锐的观点，才相信这看似调侃之言，却真实地表达了他的达观人生。

1997年秋，任仲夷同志以80多岁高龄破例当选为党的十五大正式代表。他来北京开会刚下飞机，就来到人民日报社。当我陪着他上楼走过“十五大报道组”时，他很好奇地问我：“这里面都是编辑记者吗？我该进去看看他们！”他走进房间，大家都鼓掌欢迎。有的同志说：“仲夷同志，您真的一点不见老！”任仲夷立刻摘下鸭舌帽，指着自己的头顶说：“你这是哄我哩！你瞧瞧，都‘聪明绝顶’了，还说不老？”



任仲夷的信笺

十四大的时候，你们总编辑给我写过一篇《一丝不乱的“银发”》，现在怎么样？无法（发）无天，想乱也乱不起来啦。”说得大家开怀大笑。当他离开报道组时，有个同志说了一句：“祝仲夷同志健康长寿！”任仲夷立刻站住，一脸严肃地说：“你这话说得不好！”众人愕然，他才带着孩子般顽皮的笑容解释：“祝一个人健康长寿，说明他已经‘快’了，因为谁也不会祝‘红领巾’健康长寿的，只能说：天天向上。”

他的豁达、开朗，深深地感染了所有在场的编辑、记者。

今年正月十九，忽然接到任仲夷同志来信，一开头就说：“今天是元宵节，向您拜个还不算太晚的年。”接着言归正传，说给我转来一封群众来信，托我为此人向人民日报查找一篇稿子。最后谈到他自己的近况时，仍然是他一贯的语言风格：

“我近来身体还算可以，只是觉得越来越没力气了。人家问我，身体好吗？我总是答曰：‘发育正常’。”

“我现在左眼和右耳都不好用，我自称为‘一目了然’‘偏听不偏信’。自以为还末老糊涂。”

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眼前又浮现他那双穿透力特强的眼睛。他呀，真像顾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不过要在前面加三个字——“革命的”。

2001年3月12日

## 香雪海之恨

2月11日《夜光杯》刊登了沈怀宁先生写的《香雪海》。这是一篇既有知识性又有艺术性的散文。可是它在我内心勾起的，却是绵绵的家国之恨。因为，就在这“阴晴雪雨，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的香雪海，我过早地尝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滋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六岁。8月13日淞沪开战，几天之后苏州首遭日机空袭。在一片狂轰滥炸声中，我全家半夜仓皇出逃，随着如潮的逃难人群，一夜跑出六十多里，天明才在城西一个小镇落脚。这时才知道就是以邓尉山香雪海闻名遐迩的光福镇。

那时的光福是个与世隔绝的水乡，面临太湖，背靠邓尉，湖光山色，景物宜人。由于一夜之间涌进了那么多“难民”，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住满了，我家好不容易在一月棺材铺租到一间阁楼栖身。好在父母都不迷信，倒也随遇而安。有时还领着我们姐弟俩到太湖边上的“西崦”，欣赏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景色，颇有愿终老是乡之意。

可是不久，上海失守，苏州陷落，又有消息传来，苏州家里被日军破门而入，洗劫一空。光福镇上人心惶惶，一片兵荒马乱景象。大病初愈的父亲忧愤交加，就在日本鬼子铁蹄踏进光福镇那天晚上呕血身亡。当时敌人在镇上大肆烧杀掳掠之后，闯入隔壁茶馆“庆功”，杀猪宰羊，狂呼乱叫，拷打声，狂笑声，惨叫声响彻小镇。在这终生难忘的恐怖之夜，祖母和母亲搂着两个浑身颤抖的孩子，守着我父亲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一直熬到天亮，才把父亲草草成殓，然后偷偷举家逃到香雪海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倪家巷避难，过了三个月的难民生活。

冬天到了，香雪海的千树万树梅花含苞待放，正是赏梅的好时光。可是国破家亡，谁有赏梅的心情？所以直到现在，香雪海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还是牵着母亲

的衣角，胆战心惊地穿过密密的梅林，下山到镇上去买米打油。山坡上，到处是被日寇杀害的平民百姓的新坟。

对于母亲来说，香雪海更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在她的诗词里，经常寄托对香雪海的情绪。1938年暮春，她寄寓上海后写过一首《雨中花》的词：

梅子微黄时候，日日雨疏风骤。梦入横塘烟水路，绿满轻罗袖。客里情怀愁织就，搵不尽泪痕新旧。最怕是一声归去也，叶底鹃魂瘦。

母亲一直怀念香雪海，希望有机会回到那里，追思早逝的父亲，寻访绛雪相衔的梅林，以及曾经度过艰难岁月的倪家巷和那间棺材铺。1947年冬，她在我写的一套散曲结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罗浮腊屐忙，邓尉春光漾。记得当年佳约成虚谎。临风欲断肠，滞他乡，怕向铜驼吊夕阳。……但承望，江山静洁永如霜。那时节，带一副茶铛，谱一曲清商，闲对着梅花唱。

遗憾的是，母亲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解放前，终年奔走于衣食，无此闲心；解放后，长期操劳为公务，无此闲暇。倒是在90年代初去了一趟，替她还了遗愿。那时，光福已成为现代化的旅游胜地，还建造起了机场。我到处寻访故旧，无奈面貌已经大变，棺材铺早已不见踪影，几经曲折，才找到了棺材铺主人的儿子，我当年的小朋友，他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倪家巷的房东遍访无着，只好失望而归。今年春节后，光福镇蜜饯厂一位老厂长打来长途电话，说是已帮我找到老房东的孙女儿，想来接上联系已为期不远。

现在，江南正是春游季节，香雪海想必又是游人如织。我写这篇短文，是想告诉人们，在陶醉于“红英绿萼，相间万重”的绮丽春光之时，勿忘香雪海的那段悲惨历史。因为隔海还有不甘失败的人正在美化侵略历史，否认侵华罪行。

2001年3月25日



## 惜哉！ 樊伯炎先生

曾被郑逸梅先生誉为“艺坛全才”的樊伯炎先生走了，带着他的一身绝艺，带着他许多未了的心愿，悄悄地走了。

上海市戏曲学校为他发的讣告是这样写的：“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民族音乐家、书画家、我校著名昆剧音乐教师樊伯炎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2001年3月16日中午11时50分在徐汇区中心医院逝世，享年90岁……”

讣告的文字只能这样简约。只有少数真正了解他的至交，才知道他的全部艺术造诣，才知道他是一座多么丰富的艺术“富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古典艺术领域里，像他那样的全才，目前还很难有第二人。我这个从13岁就开始从他学画的弟子，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冰山一角。

樊伯炎先生生于一个被郑逸梅先生称为“满门风雅”的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樊少云，多才多艺，绘画与吴湖帆、吴子深、吴待秋并称“吴门四杰”。伯炎先生不仅在绘画方面继承了父业，而且由于涉猎广泛，阅历丰富，在许多方面有出蓝之誉。

他精于山水。少年从“四王”入手，中年以后上窥宋元，广采博取，形成了浑厚典雅的风格。尤其对董其昌的传统穷幽极微，得其神髓。我看过他不少临董册页，几可乱真。

他精于鉴定。二十多岁就受聘于海内大收藏家庞虚斋，虚斋的大部分藏品（现多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经他过目和鉴定，其眼力得到行家的高度评价。

他精于昆曲。起初师从昆曲大师金寿生、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后与“传字辈”的各位前辈密切交往切磋。由于天赋极高，卓然成家，郑逸梅称他为“昆曲老生第一人”。晚年受聘于上海戏曲学校，当代许多昆剧演员受其熏陶。几十年来，他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可见其在昆坛的地位。

他精于琵琶。受业于有“四弦国手”之称的平湖派传人朱英（荇青），得其真传。

我多次听他弹奏的《十面埋伏》，真可谓独步海内，已成绝响。凡是听过他琵琶的人，都有一种“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叹。

他精于古琴。曾得古琴高手吴景略、张子谦传授，为常熟“今虞琴社”的中坚。因有家传宋代“松篁琴”，故自号“松篁琴室主人”。他曾与吴、张两师合作按古琴曲谱成的岳飞《满江红》，唱来慷慨激越，声震屋瓦。上海沦陷后，他经常在公众场合引吭高歌，引得满座为之泪下。

他精于箫笛。50年代，梅兰芳先生拍摄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游园惊梦》，就特请樊伯炎先生伴奏。

他身怀这么多无双绝艺，却虚怀若谷，淡泊自守，从不炫耀，更耻于追名逐利。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艺术造诣除了圈内人外，知之者不多，甚至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连一部画册、一盘完整的录音带都没有。据说在这次追悼会上，只播放了他的昆曲录音片段，而大家最希望听的琵琶独奏却付诸阙如。惜哉！这在他可能是一种风骨，在我们则是一种悲哀。

在艺术界，常有同类现象，生前声名不显，身后才发现其价值。比如现在备受推崇的已故画家黄秋园，生前只是一个地方银行的普通职员，在画坛名不见经传，逝世以后才被认识到是一颗少见的明珠。樊伯炎先生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以他的才华、经历和活动天地，他完全可以在艺苑独领一方风骚，但是可能他名士气太重，散淡惯了，以致给后人留下太多的遗憾。这里既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他个人的责任。



2001年4月9日

## 听中山先生当年的声音

4月初,我随彭佩云副委员长一行到广东了解文物保护工作情况,所见所闻,收获很多,而最意外的一个收获,是在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听了中山先生一篇演讲的原始录音。这篇作于1924年5月的演讲,总共只有371个字,但慷慨激昂,振聋发聩,听来令人热血沸腾。现将全文恭录如下:

诸君:

我们大家是中国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是领先的。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的。所以现在世界的列强,对于中国就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即由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的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就是中国,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我们睡着的时候,还是以为我们几千年前这个富强的。因为睡着了,所以我们这几百年来文明就是退步,政治就是堕落,所以变成现在这个不得了的局面。我们是中国人,在今后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得了救。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大家要警醒! 警醒!



孙中山先生像

孙中山先生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声调沉痛，使人仿佛看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当时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

然而，当他喊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来挽救”这个濒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时，未必想得到真正想出“法子”唤醒并领导民众，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真正民主、富强、文明的共和国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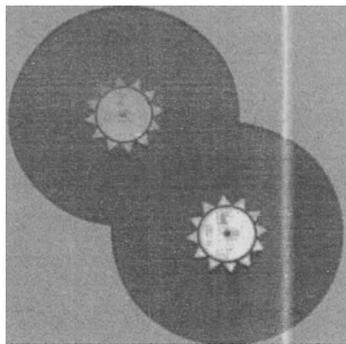
带着满脑子的思索，在广东走一路，看一路，想一路。广东省近 20 年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似乎无一不在回答孙中山先生 77 年前发出的“天问”式的问题。等到结束在广东的调研，飞到上海时，我的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立体化了。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上海的发展。它魔术般的变化，使我这个“老上海”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借助最新出版的上海市地图，而这一次“打的”回家，又尴尬地迷失了道路——家门口又变得不认识了。我怀疑自己的脑子老化了，一再向出租车司机表示歉意，他却不无自豪地安慰我：“这没关系，上海这两年确实变得忒结棍。”

我住在虹桥宾馆 23 层。这里原属上海西郊的法华镇，离市中心还有很长一段路，原来是一片菜地。已故的著名画家王个簃先生曾居住在这一带，我少年时代曾渴望去拜见他，都因路途太远交通不便未能如愿，留下终身遗憾。现在这里已经变



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演讲录音

成一片繁荣景象的现代化城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深夜，我拉开窗帘，顿觉如同跌入了一片星海，几乎和 20 年前在日本初次看到东京夜景时的感觉一样。一座车辆首尾相接的 S 形高架高速路从脚下延伸到苍茫的天际，蔚为

奇观。连前来看望我的《新民晚报》记者，都惊叹地说：“天天生活在上海，还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过上海！”

此情此景，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声音又在心中响起。最具远见卓识的中山先生，当年能够想象这样一座半殖民地城市一旦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在短短四五十年时间内，特别是近五六年内，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么？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变化，只是整个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如果不作历史对比，人们很容易忽略自己拥有的一切是何等来之不易。

事情往往是这样：前人梦寐以求之事实实现之日，在后人眼里便成了轻而易举不足为奇。这也许也属于一种规律。我担心的倒是，我们在全神贯注图发展、求进步的时候，忘记了历史资料的积累和保存，忘记了多给后人留一点可资对比的痕迹，以致使他们将来读不懂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这样的话了。

2001年4月29日



## “老泪”何以“浑浊”？

有篇人物通讯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位老科学家在临终前听说他以毕生精力写的一部著作即将出版，内心异常激动，以至“流下了几滴浑浊的老泪”。

读后好生不解。尽管“老泪纵横”已成习惯用语，我仍始终怀疑老年人的眼泪和年轻人的眼泪，其成分究竟有何不同。现在又出来个“浑浊的老泪”，更引起我的好奇，很想找位化学家证实一下，老年人的泪水是否含有什么不同于年轻人的杂质。

当然，我还没有迂腐到连艺术夸张都不懂的地步，更不会怀疑作者的善良用心。我只是想说一句：现在不少年轻人很不了解老年人的心理和心态。

人到老年，一个普遍的心理特征是既自尊又自卑，既固执又脆弱。其具体表现是不服老，也不喜欢别人说他“老”，尽管自己可以经常慨叹“老了，不中用了”。齐白石、刘海粟在作品上题款常用“年方八十”、“年方九十”，就足以证明。可是有些人偏爱以“称老”表示尊老。按照传统习惯，“某老”、“某某老”是专用于德高望重而且确实年事已高的老前辈的，如称徐特立为“徐老”，董必武为“董老”。现在这种称呼已泛滥得近乎廉价了，只要年近六十，老张、老李就变成了张老、李老，连本人也被叫得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老朽。于是，本来步履轻健的也非得左右扶持，变得老态龙钟，这种“享受”实在让受者感到难受。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类的寿命普遍延长，“晚年”的概念也相应与过去不同。过去，年过六十，就属于“日薄西山”，别人对他连留餐、留宿都提心吊胆了。有道是“六十不留餐，七十不留宿”。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出国旅游早已不是新闻。可是有些报道常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之类的用语，作者这样写是出于敬老之心，可是“老者”看着心里能舒服吗？特别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五十多岁还属于“年富力强”之列哩！

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赞美的言辞更得小心一点,谨防“拍马”拍错了部位。比如有作品形容老年女性的笑容,常说“笑得满脸绽开了一朵菊花”,这不分明等于说她是满脸皱纹吗?记得有一次请客吃饭,主人频频指着一盘猪蹄,劝一位年长的女宾多吃一点,说是“猪蹄的胶质最丰富,吃了可以养颜、美容”。谁知那位女宾立刻反问一句:“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到了要靠猪蹄才能保持美容的地步?”把主人窘得连连解释:“不,不,我是说你本来已经很美,吃了可以更美……”

依我看来,现代老人的心态和古代老人、近代老人已有很大不同,“延年益寿”、“颐养天年”、“老骥伏枥”之类的陈言,对许多老年人逐渐失去其魅力,并被其他新潮的语言所替代。任仲夷同志就经常用“少先队的口号——天天向上!”这句话代替“再见”。上个月我在上海开会,讲话时提到此事,竟引起强烈共鸣,当天晚餐,觥筹交错之际,一片“天天向上”之声代替了往日的“干杯”和“健康长寿”,也许可以说这也是人心所向。

2001年5月8日



## 记者为何不“记”？

记者要“记”，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情。不仅采访要记，参加会议要记，遇到大事要记，就连坐车、逛街、吃饭、闲聊，只要有所闻、有所感、有所悟，也应该记。记，是记者的天职，也是记者的职业习惯。

许多著名的老记者，几乎都有勤记的习惯。远的不说，即以现已 85 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为例，至今开会仍然专心致志地在记。我曾问他，您这样不停地记，是为了写东西吗？他答：记了不一定都有用，但也说不定哪天需要用。反正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他还告诉我，从 30 年代直到今天，所有的采访笔记他都保存着，装了好几大箱，这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现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也以勤记著称于新闻界。每次开会采访，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记，而且速度极快。据说，他的采访本已积累逾千。即使现在已身居要职，仍然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实属难能可贵。

可是，现在记者不“记”，或者少“记”，似乎已成普遍现象、正常现象，而“记”或者勤“记”，反而成为罕见现象、反常现象了。去年我在云南参加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有一位人民日报女记者一直在埋头苦记，引起了与会者的惊讶，我在最后发言时提到了这一点，居然引来一片掌声，表示赞同。听着这掌声，我心里说不清是高兴还是苦涩。

记者为何不“记”？细想起来原因颇为复杂。有人说，主要是现在对年轻记者要求不严，教育不力，不少年轻记者作风漂浮，怕苦怕累，采访蜻蜓点水，开会虚应故事，煞不下心来好好听，好好记。有的甚至到会上点个卯，领了材料就走人，全凭现成材料或打电话写稿。这确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据我观察，记者不“记”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一是现在开会，讲话、发言多半有现成材料，从头至尾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因

此记不记都无所谓,有些讲话套话、空话、废话连篇,记了也是浪费精神,记者“记”的兴趣自然越来越淡薄。

二是现在许多会议或典型介绍都发“通稿”,记者拿回去照发不误就是,不需再记。应该说明,对通稿也需分析。重要的国务、外事活动为力求准确,防止报道失实和偏颇,采取发通稿的方式是必要的。问题是现在不少并不重要的活动或会议,甚至一个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座谈会、庆祝会、论证会等等也援例发起通稿来,并已“蔚然成风”。这种做法,无形中把记者养懒了,而且助长了不正之风。有的记者竟然可以一天赶好几个场子,不用费力就得各种好处。

因此,记者不“记”,不是一个单纯的采访作风问题、敬业精神如何的问题,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党风、作风乃至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仅仅责怪记者懒惰,是不公平的。

2001年5月28日



## 孟母碑前思“母教”



孟母断杼处

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特别早。5月下旬,我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城。此行目的是考察这里的文物保护情况,没想到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竟是受了一次“母教”的教育。

不论是在孟庙还是在孟府、孟林,也不论是听讲

解还是读碑文、看展览,凡是讲到孟子,都必然提到孟母,似乎没有孟母就不可能有“亚圣”孟子。从陪同的官员到讲解员,在说起孟母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称她是“最伟大的母亲”。

在中国,关于孟母教子的传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孟母三迁”“孟母断杼”的故事,在民间一代一代地流传。但是一旦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孟母三迁处”“孟母断杼处”以及它的周边环境,一切传说都活起来了,使人仿佛听见了那位“最伟大的母亲”严厉、慈爱、循循善诱地开导儿子的声音。

感谢那位口齿流利的女讲解员,她用简洁的语言概述了孟母教子的三个特点:一是“严”,为了给儿子提供良好的成才环境,不惜三迁其居,择邻施教;二是“信”,每句话都说了算数,连随口说过的一句话也要兑现;三是“导”,看到儿子读书不用心,不是训斥打骂,而是忍痛把织了一半的布割断,说明读书和织布一样,“累丝成

寸，积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匹。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在母亲的诱导下，孟子“旦夕勤学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应该说，孟母这种苦心教育，对孟子的成长起了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有道是：“邹县城南有古祠，满地丰碑满壁诗。”这“满地丰碑满壁诗”，在赞颂孟子为中国历史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的同时，几乎都要提到孟母起的卓越作用。其中有一首诗很有意思：“三迁辛苦傍书堂，谁信慈亲有义方，一断机杼延圣绪，丈夫空自说刚肠！”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在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须眉男子能对巾幗妇女发出这样甘拜下风的由衷赞佩，实在难得。至于对孟母最概括、最准确的评价，当数孟母殿西侧那块由“文登毕庶澄”题于1925年的石碑：“母教一人”！

但是，明确指出并阐明“母教”之重要性的并非始于毕庶澄，而是一块元代的“孟母墓碑”。这块碑经过上千年的风雨剥蚀和“文革”的破坏，已经模糊不清。我费了好大劲，才断续辨识出几段文字：

“……偷惰于襁褓之中，养成于长大之后，习与性成，父师之训不能入，虽有美材，不得为良器。……人知以教子，责之父亲，不察于母教之尤也。知乳口之为恩，而不知训诲之为恩；知养畜之为慈，而不知礼法之为慈……”

揣摩碑文的大意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但是人们往往只把教育的责任交给父亲和老师，而不懂得母教比父教和师教更为重要。这样明确地把母教提到比父教、师教更高地位的观点，过去还是少见的。这位墓碑作者的见识，显然比只讲“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三字经》作者要高出一筹。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伟大的人物背后往往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曾参的母亲，陶侃的母亲，岳飞的母亲……真是不可胜数。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散见于典籍，真应该有人用科学的观点写出一部《列母传》，系统地讲讲母教的重要意义，讲讲现代人应当怎样做母亲。



“母教一人”碑

2001年6月7日

## 涸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少时读《论语》，特别喜欢孔老夫子这句既充满人生哲理，又富有感情色彩的名言。千百年来，它一直在无形中鞭策人们珍惜光阴，去建功立业。

50年代，毛泽东同志又把这句话点化入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赋予了这句千古名言以新的内涵，使它更加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遗憾的是，读书不求甚解的我，始终没有去考证这条“川”究竟叫什么、在哪里。最近到山东考察文物，才弄清它叫大沂河，就在孔子家乡曲阜境内。

那天，我们一行拜谒过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来到尼山脚下，参观孔子的出生地“夫子洞”。真没有想到“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当年就降生在这个荒郊的洞穴内，而且因为出生时相貌奇丑，差点被父母遗弃在这里。当然，这仅是民间传说。令人格外惊喜的是，我心仪已久的“川”竟然也在附近。

于是，在导游的陪同下，我们登上了一座山丘，丘顶有“观川亭”。据说，孔子当年浩叹“逝者如斯夫”就发生在这里。我们举目眺望，果然远山近峦，郁郁葱葱，气象壮阔，不同寻常。可是为何不见那不舍昼夜的逝水？导游说，这山下一片开阔地带，便是被称为“川”的大沂河。别看它现在没有河水，2500多年前，这条大河可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否则孔子也不会经常在这里流连忘返，悟出那样深刻的哲理了。后来，随着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它由长流河变成了季节河，河水越来越少，现在只有到了汛期才能见到一点水。同行的官员也证明导游说的是实际情况。

听了这些解说，同伴们都发出轻轻的叹息，我也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倒不是因为没有重现孔子当年观川时的情景而感到失望，而是脑子里本来诗意盎然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刻变成了惊心动魄的问号：“涸者如斯夫，谓之奈何？”

比起全国的许多大江大湖，大沂河的干涸也许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山东本来

是水资源丰富的省份,《老残游记》里对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描写,何等引人神往!而现在却到处缺水,趵突泉、珍珠泉等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水危机正在逼近泉城。当我们离开尼山的时候,只见农民们正赶着驮水的驴车,络绎不绝地到数里以外去拉水浇地补种,心里不禁一阵发热,要知道,这不是山东特有的景象,而是我国北方地区普遍面临的威胁啊!黄河的连连断流,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大型水库的频频告急,甚至连新疆的塔里木河也濒临枯竭……无一不在向人类发出警告:生态环境的恶化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可怕的是,长期住在大城市的人们,似乎浑然不觉身边的危险,依然如故地在大量浪费、挥霍生命之源的水资源。当街树由于干渴而黄叶纷飞的时候,依旧有人在用成吨的清水洗一次澡,泡几个西瓜!

要是我们的后代读不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人类会不会真的走到一幅漫画画的那个田地:一只可怜兮兮的小鸟站在龟裂的土地上问它母亲:“妈妈,什么叫水?”

2001年6月17日

## 昆曲欣逢又一春

沉寂多年的昆曲，最近忽然又“火”起来了。

首先是5月下旬，从国外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首次“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中国的昆曲名列榜首，而且这是中国唯一列入这批名录的艺术品种！

接着，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6月9日开会宣布：确定昆曲为国家重点保护艺术，并出台了8条具体措施。

作为一个昆曲爱好者，听到这些消息，真有“初闻涕泪满衣裳”之感，可能比获悉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要振奋。我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把这喜讯告诉远在苏州的姨母蔡藻，因为她是个昆曲迷，虽然年已八十有五，仍然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曲友们的每次“同期”，甚至有一次还因此在途中滑了一跤，摔伤了胫骨。

不料她并没有表示意外，而且知道的情况比我还要详细。在电话里，她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来访的客人很多，其中有上海大学生组织的昆曲采风小组，苏州市电视台的记者等等，又是照相，又是录音录像，好不热闹，都想从她口中“挖掘”出一些昆曲的“遗产”。看到冷落已久的昆曲突然受到如此重视，老人家的高兴自然可想而知。

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这既令人喜出望外，又令人感慨万端。

我对昆曲并无研究，只是由于生长在一个与昆曲有一定渊源的家庭，对昆曲700多年兴衰升降的历史多少有点了解，特别是对50多年来昆曲命运的变化比较关注。因此，在这昆曲又一次面临转机的时刻，不免有许多话想说。

昆曲始于元代，它的极盛时期是明末清初。现在人们都把昆曲称为“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其实它的起源是在民间，属于当时的“流行音乐”。相传昆曲在它的发源地昆山大流行的时候，曾出现过“家家‘不提防’，户户‘收拾起’”的局面（“不

提防”和“收拾起”都是昆曲曲词),就像今天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和“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样。据词曲大师吴梅先生讲,对昆曲创新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魏良辅,有一天坐在轿子里,听轿夫一边抬轿,一边哼唱“慢整衣冠步平康”高兴得一下从轿子里跌了出来,可见当年昆曲的普及程度。后来,经过一代代文人雅士的整理加工,昆曲日趋典雅流利,便逐步从“草台”走上了“红氍毹”,走进了宫廷。这个演变过程,在瞿秋白的《乱弹》中有过比较剖切的论述。

昆曲走向衰落,始于皮簧的兴起。为了挽救和重新振兴昆曲艺术,30年代初,苏州富商穆藕初等发起创办了“昆曲传习所”,经过苦心经营,培养出了一批出色的演员,这就是今天常说的“传字辈”。其中如张传芳、周传瑛、朱传茗、顾传玠、郑传鉴、沈传芷、倪传钺、华传浩、王传淞等,都成为昆曲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可惜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昆曲传习所被迫停办,“传字辈”也风流云散。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处境极为悲惨。我幼年曾经见过其中的几位,真已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令人心酸。

昆曲的绝处逢生,是在解放后的1956年。一出《十五贯》引起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提出了抢救昆曲遗产的号召,大江南北立刻出现了复兴昆曲的热潮,流落各地的“传字辈”以及北方的昆曲传人被重新组合起来,或重登舞台,或整理剧目,或传授弟子,极一时之盛,真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后来曾在昆坛独当一面的著名演员,如岳美缇、梁谷音、王芝泉、计镇华、张继清、范继信、李淑君、蔡瑶铣以及现在国外的华文漪等,几乎都是那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可以说,那确实是昆曲历史上的一个春天。

谁料“一夜西风凋碧树”。一场反右、一场“文革”,昆曲又被当作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资修黑货”,惨遭摧残,昆曲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许多富有才华的演员因受《红梅阁》的株连,受到残酷迫害,成了“牛鬼蛇神”。从此昆坛万花凋零、万马齐喑,昆曲真正跌入了低谷。

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强调抢救祖国文化遗产,近十多年来昆曲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但是,毕竟由于伤了元气,加上名家相继谢世,观众出现断层,昆曲的振兴和发展仍是举步维艰。尽管如此,民间的昆曲爱好者中不乏有识之士,为了昆曲这一祖国文化瑰宝不至成为广陵绝响,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现在,国家作出了保护昆曲艺术的重要决策,真可谓盛世雅乐继

余绪，昆曲欣逢又一春。难怪佳音一出，海内外同好额手称庆。作为一个目睹昆曲沧桑的外行，只想表达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扎扎实实坚持下去，不要只是热门一阵；二是希望广延目前有数的“遗贤”，倾听意见，以期真正按照昆曲的规律来保护、发展昆曲。因为无知的“保护”，危害往往不亚于有意的摧残。

2001年6月26日



## 难忘深深一鞠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日子里，每当电视播放反映党的丰功伟绩的历史纪录片时，我总是最热心的观众，而且老等待着出现这样一个历史性镜头：1950 年 10 月 1 日，首都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盛大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一位长须白发、穿着长袍的老人，忽然离开队伍，走到金水桥前，向城楼上的毛主席恭恭敬敬地鞠了深深的一躬。

这个镜头出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老人的这一鞠躬，代表全中国人民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感激，对人民领袖的由衷爱戴。此时无声胜有声，记得当时银幕上一出现这个镜头，影院里几乎全场观众都静静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新闻纪录片，是 1951 年夏天，在上海交通大学的礼堂里。那年，国家第一次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为了号召毕业生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国家把几千名毕业生集中在交大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学习班，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开始，很多学生思想不通，填写志愿表的去向一栏时，有的连填三个“上海”，有的甚至填上“第一黄浦区，第二卢湾区，第三徐汇区”，以表示坚决不离开上海。这种情形和若干年后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差不多。但是，经过学习和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绝大多数应届毕业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在后来座谈思想转变的过程时，许多人都提到那位老人的一鞠躬起了重大作用。

记得当时圣约翰大学有一位名叫翁恒生的同学，是新闻系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早在毕业前一年，就有一家私营企业打算以 600 个“折实单位”的高薪聘他去工作，而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生，工资一般只有 100 多个“折实单位”，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十元，相差好几倍。翁恒生正在思想矛盾之际，看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被那位老

人的深深一鞠躬所震撼。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毅然放弃了那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无条件地服从了国家的需要。

几十年来，这件事情经常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1950年，距新中国成立不过一年时间，原来国统区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很深刻，为什么一位普通的老人对共产党会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和敬意？他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会在广大群众中激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原因既简单又深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百姓是最实际的。他们是通过一年内共产党所做的每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看清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老人的深深一鞠躬，代表了他对共产党纲领、宗旨、路线的理解和拥护，对他来说，此时此刻已无法用其他语言来代替这个举动。

难忘这深深一鞠躬，难忘这一鞠躬包含的千言万语。它留在我们共产党人心中的，永远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嘱托，人民的鞭策。

2001年7月8日



## 漂亮的回答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转播正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01世界游泳锦标赛”实况。我对体育本是外行，尤其对女子花样游泳表演更是看不出门道。引起我注意的是，当美国女子花样游泳队出场时，赛场里响起的好像是中国江南丝竹，随着回肠荡气的乐曲，8条美国的“美人鱼”在碧波中翩然起舞。我正疑惑：这真的是用中国音乐伴奏吗？身旁11岁的外孙女肯定地说：“没错，是中国的《百鸟朝凤》！”

果然，电视记者说话了：“美国队的表演很有特色，她们用的音乐是中国的《百鸟朝凤》……”

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说外国体育表演用中国音乐伴奏的不止这一次，比如在国际花样滑冰大赛中，美籍华人女运动员陈露用的也是中国音乐，有些武术表演也用过《满江红》之类的乐曲，但是由清一色外国运动员表演花样游泳时用中国音乐伴奏，则“未之闻也”。而且这发生在中国申奥成功后的第六天，即使属于巧合，也很耐人寻味。

我向来不喜欢牵强附会，更反对“挟洋自重”，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越来越被全世界瞩目，中国的音乐艺术正在逐步引起国际乐坛的重视。这有一连串的事实可以证明：在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乐队指挥破天荒第一次用中国话祝贺“新年好！”中国交响乐团破天荒第一次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献艺；中国钢琴家破天荒第一次以满分获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中国的昆曲破天荒第一次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相比之下，中国丝竹《百鸟朝凤》被采用作为世界游泳锦标赛的伴奏音乐，实在算不了什么了。

本来嘛，中国也是一个音乐之邦。中国的音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独具魅力。只是过去中国的国际地位衰落，洋人既看不起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的音乐，中国

音乐很少能在国际重要场合露面。有些中国人也妄自菲薄,认为中国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见竞相用西方交响乐甚至迪斯科音乐为京剧、昆曲伴奏的,未见有中国的丝竹管弦为《天鹅湖》《卡门》伴奏(当然,我并非主张如此)的。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使中西双方都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重新认识中国。中西文化的扩大交流和结合,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个交融的过程中,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既敢于吸收外来的,也勇于保护自己的,更善于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前几天,也是从中央电视台,看了一个由英文《中国日报》举办的“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节目,其中有一位名叫朱静秋是北京广播学院女学生,面对外籍评委的临时提问,机敏地说了一番令人赞叹不绝的话:

外籍评委:“从现在起25年内,你对中国有什么希望保持不变的?有什么非常值得珍惜,希望继续发扬、保持原状的?”

朱静秋:“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我想用今天我穿的这身衣服(旗袍)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穿着中国传统的服装,不但不妨碍我用流利的英语同您交谈,而且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我想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会和欧洲、美洲、非洲一样,保持许多本民族美好的东西,如同我穿着这件特别的衣服。在人们的印象里,旗袍是一种很传统的东西,但我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现代女孩子。我想这两者的结合并不太复杂,我们一定能把它们结合好。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我们有能力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回答。”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连那位提问的外国人也满意地笑了。

2001年8月4日



## 有山无水又何妨

在《水浒传》里，施耐庵以生花妙笔，对水泊梁山的自然环境作了有声有色的描写。梁山的好汉们就以这个环境为依托，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壮的活剧，使得后人对梁山产生无限的神往。

漫漫烟水，隐隐云山。不观日月光明，只见水天一色。红瑟瑟满目蓼花，绿依依一洲芦叶。双双鸂鶒，游戏在沙渚矶头；对对鸳鸯，睡宿在败荷汀畔。林峦霜叶，纷纷万片火龙鳞；堤岸露花，簇簇千双金兽眼。淡月疏星辰夜景，凉风冷露九秋天。

这是何等诗情画意！

山排巨浪，水接连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阻挡官军，有无限断头港泊；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如雨。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又是何等肃杀险恶。

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迁，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块农民起义军“根据地”的肆意践踏，加上“文革”期间“批水浒”造成的破坏，梁山已经面目全非。特别是作为梁山之魂的八百里水泊，已经完全变成村庄农田，梁山好汉们神出鬼没的湖汊、芦荡已经荡然无存。山上山下的山寨遗址也所剩无几。难怪慕名而来的游客，经常发出这样的慨叹：“不到梁山是遗憾，到了梁山更遗憾！”

尽管早知如此，我们还是顶着初秋的烈日来到梁山，目的是想领略一下究竟如何遗憾。

果然，如同传说的一样，梁山除了山体还在，已经很难找到《水浒传》里描述的

那些景物了。虽然我们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也不免嗒然若失。但是经过半天的流连,逐渐找回了感觉。在山风传来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呀”的歌声中,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复活了:那一段段巨石垒成的旧寨墙,那层层漫山遍野的黑松林,那一片片被刮掉的摩崖石刻,都在无言地告诉我们当年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这时,我们猛然省悟:梁山是一部需要从无字处去细读的“书”,一部需要凭借自己历史、文学知识和人生阅历去读懂的“书”。有了《水浒传》这部书的“导游”,它就留出那么广阔的空间容你去想象,去体味,去发思古之幽情,这实在比满目琳琅更耐咀嚼。历史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为了开发梁山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现在梁山县正在努力恢复梁山的“旧貌”。入山口,“宋代一条街”已初具规模,两排宋式的茶楼酒肆即将竣工;在进山的石径两旁,将竖起一百零八将的雕像,现在已雕成的有黑旋风李逵和小李广花荣,倒也雄姿英发。据说还有人建议修个大水库恢复八百里水泊面目,或者干脆到微山湖去再造一个“梁山”等等。对于这种种宏图大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非专家,岂敢妄言,只是呆想:这得花多少钱呀?再说,当年那水已随梁山好汉逝去,即使真再来个八百里水泊的人造景观,除了看个热闹,还引得起人们的深沉历史感么?

离开梁山时,梁山博物馆的同志索字,我想了半天,写了一首打油诗:

莫嫌水泊变农桑,  
莫憾难寻旧战场,  
留得施公名著在,  
有山无水又何妨?

2001年9月3日

## 再谈母教

读今年第18期《读者》杂志,有篇文章引用的一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

感人即在平易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三岁看老”,幼儿时期所受的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足的是,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第一位老师——母亲。如果没有良好的母教打下基础,幼儿园的教育是不可能巩固的。据我了解,许多幼儿园的教师经常抱怨,孩子们在家里受到的是与幼儿园截然不同的教育,他们在幼儿园一星期内训练成的好习惯,回家一天便被抵消,甚至前功尽弃。这是一桩十分令人担心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天,我到“麦当劳”去为外孙女买一点她爱吃的食品。那天顾客特多,店堂里排了好几条长龙。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衣着靓丽的年轻母亲,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等的时间长了,她显得很不耐烦,便命令孩子挤到前面去“加楔”。那孩子大概受过幼儿园的教育,对母亲的命令迟迟疑疑不肯服从,当妈的勃然大怒,当众大声呵责:“你白活了?长这么大还不会买东西!平日妈是怎么教育你的?幼儿园老师是怎么教育你的?”一边骂,一边扯着孩子到前面去亲自“示范”。

当时我真想教训一番这位年轻母亲,但看周围的顾客并没有什么反应,也就罢了。事后我把这一幕讲给一些年轻人听的时候,他们只是淡然一笑,无动于衷,其中一位还反问我一句:“那又怎么了?”好像错的是我。

我真的有点悲哀。如果那位母亲的行为只是一种特例,倒也不足为虑,可怕的

是人们对这种现象好像已经习以为常,神经麻木了。假若我们的下一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很难指望他们能够成为具有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因为在他们踏进社会以前,尽管可能学会了许多知识、技能,可就是还没有学会怎样做人。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强调进行道德素质教育。我非常赞成。道德素质教育靠谁去做?当然要靠各级学校、各级组织,靠全社会。但是我觉得基础是家教,特别是母教。在儿童的启蒙阶段,母教的潜移默化功能比其他教育所不能替代的。“人知以教子,责之父师,不察于母教之尤也。”这就是我突然想起写《孟母碑前思“母教”》(见6月7日《夜光杯》)的主要原因。当然,重视母教不等于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更不是提倡封建色彩的母教,而是希望每一位当母亲的充分认识自己作为“第一位老师”的责任,按照时代的要求,事事、处处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从点滴小事入手,言传身教,去影响自己的子女。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一致,我倒很希望《新民晚报》就此开展一番讨论。

2001年9月29日

## 流风遗韵忆画坛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缘故吧，我十五六岁时就几乎跑遍了上海著名书画家的家。现在回忆起来，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那时，大部分书画家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像现在有些书画家稍有名气，就在别墅公寓里深居简出，门禁森严，连通个电话都不容易。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家里天天宾朋满座，有的是来求字索画，有的是来拜师学艺，有的是笺扇店来订货取件，有的纯粹是来聊天，一坐就是一天。主人总是一边挥毫，一边应对，来时不迎，走时不送，非常随意。经常在这种环境里看看、听听，可以长许多见识。不过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扎在里头凑热闹的却不多，所以有人戏称我是“小老茄”。

当年上海滩画坛公认的首领，当推吴湖帆、冯超然两位前辈。他们都住在嵩山路，对门而居，见他们就比较难些。我去拜访吴湖帆，门房看我是个孩子，两次闭门不纳，第三次才放我进去。吴湖帆性格豪放不羁，不拘小节，经常穿着睡衣作画、见客。他的“梅景书屋”以收藏丰富闻名海内，他高兴起来，就捧出一堆让我自己观赏，有一次竟把一幅元代大画家盛懋（子昭）的绢本工笔山水借给我去临摹，连我住在何处都不问。我过了好几个月才去归还，他也毫无愠色，真有点古代名士之风。

冯超然的性格与吴湖帆大不相同，作画笔笔严谨，平时不苟言笑。连铺纸、研墨、用印都有法度。站在他旁边观画，个个屏息凝神，不敢随意说话。他的得意弟子郑慕康，大概继承了老师的严谨作风，作画也是一丝不苟。有一年夏天，我到他家，室内温度很高，他照样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衫，端坐挥毫，为怕汗水沾湿画纸，特在腕下垫着几层手帕。我问他为什么不开电扇，他说怕扬起灰尘落在调色盘里，影响颜色的纯度。这种对待艺术的认真态度，令人终身难忘。

著名山水画家贺天健，家住复兴中路，家中陈设十分简朴。他的画风泼辣，性格狂放，谈吐率直。夏天作画时，经常赤膊上阵，真有一副“解衣盘礴，目中无人”的

气概。我拿出自己的画向他请教，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问我：“依是跟啥人学格？”我据实以告，他有点不屑地说：“伊旣没见过名山大川，画的都是土堆堆，依应该跟我来学！”我一听这口气，吓得不敢再去了。不过他的豪爽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间白蕉、西泠石伽，是后起之秀，他们兼擅诗书画，风格潇洒飘逸，令人耳目一新，出道不久，就蜚声艺坛。白蕉住愚园路，石伽住江苏路，平时上他们家谈诗论画的很多，颇有文人风致。我曾和同学一起多次拜访白蕉，他一派儒雅风度，娓娓而谈，见解精辟，每次登门求教，都像上了一课。不料后来竟屡遭厄运，盛年早折，真是令人惋惜。石伽据说尚健在，我从报纸上见到他的近作，仍是那么细密工整，洋溢着书卷气。

我去得最多的是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金谷村陈定山、陈小翠两位兄妹诗人画家的家。他们二位都够得上是旷世奇才，在他们家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雅韵浮动，逸兴遄飞，置身其间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像我这样的孩子，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了。

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上海艺坛文化现象，现在是否应该有人来好好研究呢？我很希望上海能像编纂《上海新闻志》那样，组织力量编纂一本《海派书画家志》，使他们的流风遗韵能为后世更多人所了解。

2001年10月7日

## 雨歇波平政亦闲

湖南长沙有座爱晚亭，因毛泽东同志早年经常在此读书、会友而闻名，现在已成旅游胜地。不过，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离亭子不远的地方，有块不甚起眼的石碑，刻的是清代大书法家钱沅（南园）撰写的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开头两句：“雨歇波平政亦闲，相与结伴一登山。”

对于这两句诗，我曾和几位朋友议论了一番，大家对“政亦闲”三字大感兴趣。当时我只知道钱南园以颜体书法见长，前人对他有“能以阳刚学（颜）真卿，千古一人而已”这样的极高评价，却不知他是否当过官。但是从他的诗来看，他很可能当过地方官，而且当得不错。理由是：一、“政亦闲”的前提条件是“雨歇波平”，隐含着地方上秩序正常，生活安定，否则政务缠身，忙于处理矛盾，哪来结伴登山的闲心？二、“政亦闲”实际上是忙中偷闲，善于利用政务的间隙，放松一下神经，清理一下思路，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反映了作者举重若轻的行政能力。

为了证实这种猜测是否正确，我特地查阅了一下有关钱南园的资料。不出所料，他是云南昆明人氏，乾隆辛卯（1771年）进士，曾官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湖南学政等。为人耿介，《清史稿》赞扬他“以直声震天下”。可见他的政绩相当好，绝非游手好闲之徒。“雨歇波平政亦闲”，确实是他一种高境界的领导艺术的写照。

最近，我到山东邹城作文物调研，又意外地发现另一位被老百姓“感恩立碑，以志不忘”的“闲官”。此人名叫王尔鉴，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曾任邹县县令，后迁济宁，再转徐州。地方志上对他的评价是“有断才，多惠政”，就是说他善于断案，又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民间流传关于王尔鉴的一句顺口溜：“十天案子三天断，余下七天上峰山。”（峰山在邹县，秦始皇曾到此祭天）乍听之下，王尔鉴是个典型的不务正业的“甩手掌柜”，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偏偏那么喜欢他？那是因为他“余下七天上峰山”，本身也是深入民间、访贫问计的过程。他爱桃花，写过许多桃花诗，然

而就是在这过程中，他总结了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提出让近山的农民环山种植桃树，不但使峰山出现了“红雨春风到万家”的独特景观，而且使老百姓普遍增加收入，富裕起来。因此，王尔鉴离任时，邹县百姓在峰山盘路口树了一块“王公去思碑”，也就是给了这位十天中间七天游山的地方官员一份最高的“鉴定”。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自古以来，老百姓不但敬仰“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式勤政为民的好官，也爱戴“相与结伴一登山”、“十天案子三天断”钱南园、王尔鉴式闲政为民的好官。他们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一天到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而是看他行政的实际效率，看他究竟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要不然，喜欢吟诗作赋、写字作画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郑板桥等怎么会在民间留下那么好的口碑？

“照你这么说，难道提倡今天的官员也去效仿古代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许有人会这样说。非也。时代不同了，对官员的要求当然也大不相同。不过如何处理“忙”与“闲”的关系，仍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几年前，我曾问过一位西方比较著名的政界人士：“您是否很忙？”不料得到的回答竟是：“不，不，我不忙，忙了还能做好工作吗？”

套用一句王羲之的话：“虽世殊事异……其致一也。”

2001年10月17日



## 华年二十去如飞

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馭气入苍溟，身凌群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侣万星。  
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鬓有童心，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

这首七律，是我 1981 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机中之作。那时我还是刚“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不久，既是第一次出国，又是第一次乘坐飞机。这次出访机会本来属于总编辑赵阜同志，他却把它作为一种奖励给了我这个小人物，我的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第一次登上飞机，处处感到新鲜。有经验的旅客一进机舱就拉上窗帘，闭目养神，我却一直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注视着窗外的一切，从天上的日月星辰、碧空白云，到地上的山水林田、城镇村舍，都看个不够。在此情此景中，难免俯仰平生，百感交集，既痛惜失去的岁月，又憧憬未来的年华，于是从心底跳出那么一句诗：“再乞华年二十龄。”

为什么不多不少祈求天公再赐给二十华年呢？当时想的是，只要能够追回蹉跎的二十年，就足够再拼搏一回了，到那时已是七十老翁，还有什么奢求？

想不到后来的二十年，中国竟会发生那么巨大、精彩的变化！乱世苦夜长，盛世恨日短，眼看国家一日千里的发展进步，越来越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想做的事情太多而做不完。一进入 2001 年，猛然意识到，预支的二十年快到期了，不禁悚然惊心。这时才体会到季羨林老先生为什么过了“米寿”，还要“相期以茶”。

今年夏天，几位新闻界老朋友为穆青同志庆贺八十寿辰，席间穆老说了一番动情的话：“当年真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到八十。抗日战争时期，只盼望能活到看见日本鬼子投降；解放战争时期，只盼望能活到看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只盼望能活到看见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只盼望能活到看见‘四人帮’垮台；进入新时期，只盼望能活到看见走进小康社会……”说到这里，有人急问：

“现在呢？”穆老笑答：“盼望能活到看见 2008 年的奥运会！”

可见人们对于生命的冀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童年战乱频仍，经常听到大人怨叹：“活得苦煞哉，索性早点闭上眼睛吧！”现在很少听见这类声音了，原因很简单：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所以写字作画的，喜欢在作品上写个“年方八十”“年方九十”；唱歌跳舞的，喜欢选择一曲《夕阳红》。回想我的外公，还不到古稀之年，就写了“告别词”：“修短本前定，底事苦留连，十洲三岛假耳，何处见真仙？……”两相对照，不足以说人在乱世和盛世迥然不同的心态么？

我是从乱世走到盛世的，所以对盛世倍感可贵，倍加珍惜。每当夜深人静，在灯下为《夜光杯》写“笔记”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再乞华年二十龄”的“支票”快过期了，华年过后是衰年，趁着现在脑子还没有十分糊涂，抓紧时间再多写一点吧！就这样，不知不觉已写了近 60 篇。据编辑同志相告，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出版社已决定把它结集出版。我在感动之余，欣然续写了第二首七律：

华年二十去如飞，相见惊看影渐颓。眼底江山真似画，梦中岁月苦难追。归期何敢论茶米，来日还须勤剪裁。灯下冥思频搁笔，知音多谢《夜光杯》。

2000 年 11 月 10 日



## 黄浦源头说清浊

因为身居北京，平时看“上海卫视”的机会不多。11月7日晚上，偶然看到它的“新上海假日”专栏正在播映《黄浦江源头》，引起我的好奇，便从头至尾把它看完，真的长了不少知识。

我是在黄浦江边长大的，从小看到的黄浦江水就是黄而浑浊，还散发一种难闻的臭味。尽管有一艘挖泥船成年在江中疏浚，也不见有多大改变。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污染的日益严重，黄浦江水也越发浑浊。近几年上海市政府为了改善城市环境，下了很大力气进行治理，情况大有好转，据说现在已经闻不着臭味了，这实在是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虽然和水清还有距离。

然而，过去我从来没有考证过黄浦江浑浊的由来，只知它源出淀山湖，相传由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开凿成浦，至于它源头的水是清是浊，却从未深究。这次看了《黄浦江源头》，不禁大为惊讶：原来黄浦江源头的水从山涧潺潺流下时，竟是如此清澈，如此纯净！从上海市区来的游客，见了这样的好水如获至宝，不但捧掬畅饮，还争相把水灌满随身带来的空瓶，有的说要带回家去让家人分享，有的说要给家里的金鱼“尝尝新鲜”，情景十分动人。

看完电视，我特意查了一下《辞海》。据载：黄浦江从淀山湖东流到闵行以东，折向北流，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纳吴淞江（苏州河），到吴淞口入长江，全长114公里。在这不太长的距离内，它是怎样从清澈纯净变为浑浊污秽的？按常理推测，无非是水土流失和工业、生活污染。千百年来，在这114公里河道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居民、船户、作坊、工厂往里面倒垃圾、刷马桶、扔秽物、排污水……终于使这条清清的河流完全改变了它的原来面目，思之令人感叹不已。

再仔细想想，黄浦江由清至浊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很自然地会由此联想到社会环境的保护问题。比如说，最近几年，

揭露、惩处了不少包括高官在内的腐败分子，情节之严重、恶劣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冷静分析一下他们犯罪的经历，可以看出，其中有些人原来就是人中的败类，也有不少人原来并不太坏，甚至还比较清廉、勤奋，但是在地位发生变化之后，经不起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的诱惑和侵蚀，逐渐地变坏的，就像黄浦江水在流淌的过程中由清变浊。当然，这样类比并不完全确切，因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毕竟和自然物体的河水不一样，人有思想，有理智，可以激浊扬清，抗拒污染。事实上，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还是占大多数，但是不承认、不正视客观环境对人的思想意志的影响，也不是唯物主义。承认和正视，为的是更加警惕。

记得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在初入仕途时写过一首题为《瀑布》的自警诗，全诗八句，这里摘抄前面四句：

迥与众流异，  
发源高更孤，  
下山犹直在，  
到海得清无？

这里，范仲淹以清且直的瀑布自况，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你刚出山的时候，是何等气势磅礴、清正刚直，迥异于小溪浊流，可是经过千回百转，流入大海时，不知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清纯不污？

像范仲淹那样具有瀑布品格的伟大人物，尚且需要如此朝乾夕惕，何况我辈凡夫！如果我们徜徉于黄浦江畔，目送它滚滚东流去的时候，再细细品味一下范仲淹的诗句，想来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1年11月19日

## 新《阅江楼记》

一楼飞峙大江边。虎踞龙盘的金陵古都，如今在长江沿上的狮子山巅矗立一座五十米高的“江南第一楼”——阅江楼，成为南京市标志景观的“点睛之笔，扛鼎之作”。

初闻阅江楼，不免一怔。少年时读过明代大学士宋濂写的《阅江楼记》，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以后，为了“壮京师以镇遐迩”，下诏兴建斯楼，而且尚未动工，就亲自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又命诸文臣各写一篇，共一百多篇，其中以宋濂所作为最佳，后来收入《古文观止》。奇怪的是热闹了一场，楼终未建，留下的只有君臣两篇《阅江楼记》，给后世无限遐想。正是：有记无楼六百年，空余宏著忆宋濂。

阅江楼究竟为何没有建成？历来其说不一。有的说是后来朱元璋百废待兴，无暇顾及；有的说是因为国库空虚，无力顾及；也有的说是朱元璋受了宋濂文章的影响。——据说宋濂的《阅江楼记》形为歌颂，实为规劝。《古文观止》对此文的评点是：“奉旨撰记，故篇中多规颂之言”，分明话里有话。

前几天，我到南京开会，有幸登览这座由下关区建造的阅江楼。果然碧瓦朱楹，画栋雕栏，宏伟壮观，气势不凡，与目前流行的“假古董”大不相同。各地到此游览者络绎不绝，登高临下，俯仰盘桓，下视则滚滚长江，环视则绵绵崇楼，令人气壮神怡。但是，谈到为什么要在长达六个世纪之后，改变它“有记无楼”的历史，看法就各有千秋了。有的认为这是“画龙点睛”；六百多年来，中国历经战乱，国势衰微，今天终于欣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建楼可以昭示前人没有做成的事在我们这一代做成了，足以令人扬眉吐气。有的认为这是“画蛇添足”；有记无楼可以给人以历史的悬念，胜于有记有楼；何况现在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何必耗费巨资去大兴土木盖这样一座楼阁？这一大笔钱用来办上百所希望小学岂不更好？也有的认为，建造这座阅江楼，为南京开发了旅游资源，也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也给市

民增加了一处漂亮休憩游乐的场所，何乐而不为？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道理。游览归来，久久思索，没有理出头绪。灯下随手翻翻刚借来的《古文观止》，突然发现《阅江楼记》后面是一篇刘基的《司马季主论卜》，结尾有一警句：“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一下子使我豁然开朗：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有”与“无”原来都是相对的，辩证的。“有记无楼”也罢，“无记有楼”也罢，“有记有楼”也罢，都要从实际出发，关键是一要看需要，二要看可能，三要看民意，四要看是否科学。只要符合这四者，就不为“过”或“不足”。

据了解，现在阅江楼正以万金重奖向全国征集新《阅江楼记》和诗同楹联。我这篇短文也算来凑个热闹吧。

2001年12月4日



## 惊听洋人说评书

我看过洋人演京剧，听过洋人说相声，可是听洋人说评书，而且是地道的扬州评书，还是头一遭。

一个月前，国家文化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国际研讨会”。来自五大洲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进行了交流，气氛十分热烈。轮到最后上台讲演的，是一位碧眼金发、体态雍容的中年女学者。她在台上就座以后，忽然圆睁双目，扫视了一遍会场，“啪”的一声拍了一记响亮的醒木，顿时全场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待到大家肃静下来，她才清清嗓子，用带有洋味的扬州口音，有声有色地说起了《景阳冈武松打虎》：

“那正是七月天气，太阳偏西，英雄武二郎走了一天，又饿又累，很想休息一下。他提着哨棒，大踏步往前走，只见山路两边，古树参天，怪石嶙峋，武松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说到这里，全场掌声四起。尽管大部分外国人听不懂她说的内容，但是从她的表情、手势，也都能意会讲的肯定是非常有趣的故事。中国人则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丹麦人文学科高级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维贝根·伯恩达赫女士，就用这样独特的方式开始了她的演讲——《中国说书大记录》。

演讲开门见山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

“中国说书，是世界口头艺术的瑰宝。从宋朝起，职业化说书已在中国存在，广受欢迎。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现代媒体和现代生活方式，这门艺术能否流传到第二个千年？我认为，现在该是国际社会负起责来，保护这种独特的口头艺术的时候了！新的媒体技术既是对说唱艺术的一种威胁，也应该是保护这些现存艺术的一

种绝佳手段!”

作为正在关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命运如何传承、发展的中国人,我从一位外国人口中听到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接着,维贝根·伯恩达赫女士系统地叙述中国说书、特别是扬州评话四大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其现状,提出:“在中国,如果我们想完整地保存那些通常在传统的书场里表演的说唱剧目,那么所剩的时间已经无几了!但是现在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师每天在表演着完整的剧目,因此,用录像方式记录老一代扬州评话大师们的表演,还为时不晚。目前第一要务是为扬州评话四大流派经典剧目准备录像记录,然后转换成VCD,即王派‘水浒’,康派、吴派‘三国’,戴派‘西游’。”为此,她呼吁中外有识之士和自愿参加的说书艺人共同努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

维贝根·伯恩达赫女士的热心建议,赢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就在掌声未绝之时,她突然又一拍醒木,续讲“武松打虎”:

“话说英雄武松把老虎打死,已经精疲力竭,躺倒在地,正想休息片刻,忽然草丛里又窜出两只老虎。武松叫了一声:哎呀,我命休矣!这时,其中一只老虎忽然站了起来,开口说话问武松:‘你究竟是人是鬼?’——要知武松遇到的究竟是什么,请列位明天来听分晓……”

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笑声。我随着掌声站起来与维贝根·伯恩达赫女士握手,向她致敬,心里在想: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如此深入的调查研究,为的是什么呢?作为中国人,又该做什么?

2002年1月22日



## 谢 季 老

《敬宜笔记》结集出版以后，我曾打算“就坡下驴”，到此打住。不料蒙季羨林先生抬爱，在4月20日《夜光杯》发表一篇《读〈敬宜笔记〉有感》，对拙作谬奖有加，还特别“奉劝”读者见到《笔记》“千万不要放过”。这样一来，倒教我有点欲罢不恭了。

说实在话，在《敬宜笔记》出版之前、之后，我都萌生过请季先生为之作序或作评的念头。这主要出于对先生道德文章的景慕，同时也有苏辙所谓“闻一言以自壮”的动机。然而转念一想，过去我和先生素无深交，只是开会时见过一面，估计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况且他已年过九十，向他求文未免有悖情理。这样，便自觉地把那非分之想打消了。

三月中旬，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遇到一位熟悉季先生的北大年轻学者，我谈起了对先生的仰望之情，甚盼面聆教益。他说，“季先生是《夜光杯》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对你想必会有印象的。不过他现在身体不好，很少见客，但我可以转达一下你的愿望。”我以为这只是一“婉辞”，想不到过了两天，就接到反馈：季先生表示非常欢迎，时间定在3月28日下午3点钟。我自然大喜过望。

那天，我准时来到北大燕园季先生的寓所，并带去了《敬宜笔记》和《范敬宜诗书画》。季先生的精神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在他身边工作的李老师对我说：今天先生特别高兴，一早就嘱咐把他的“礼服”拿出来，准备见客。所谓“礼服”，就是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做的一套藏青涤卡中山装，即使出国访问，穿的也是它。季先生听了，莞尔一笑说：“在穿衣问题上，我有点逆潮流而动。”

在交谈中，季先生对我的人生经历似乎很有兴趣。我告诉他，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一是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熏陶，一是二十年“右派”生涯的磨炼。季先生感喟地说：“我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遗憾没有当上‘右派’——也许因为我还不够好；二是遗憾没有享受过母爱——因为过早地离开了母亲，想不到从此没再见到她。”

言谈之间，流露出深深的怅惘。

也许因为我之所无，为他之所有；我之所有，为他之所无，两个忘年之交的距离迅速缩短了，竟然越谈越投机，完全不像初识。但我想到他有病在身，半小时就起身告辞，当然更不会提起请他写文章的事情。

第二天，我忽然想起临别匆匆，不曾道一个“谢”字，便往季先生家补打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位热情豪爽的李老师，她说：“我原来以为你会请季先生为你那本书写文章的，其实他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可你昨天为什么不提呢？”我只好自责过于拘谨，坐失良机。李老师说：“我替你试试看，也许还有希望。”

真是意想不到，第四天早晨，季先生的文章就传过来了，六页稿纸，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哪像是91岁老人的手迹！我捧在手里，读了一遍又一遍，又喜又悔。

几天之后，我才从那位青年学者那里获悉，医生根据季先生的健康状况，是不允许他写稿的。那天傍晚，他忽然告诉李老师，自己有些事情要做，请她早点“下班”；第二天早晨，当李老师来“上班”的时候，发现那篇《读〈敬宜笔记〉有感》已经写好放在桌上了。谁也说不清他前一天晚上是什么时候才休息的。我听说后，在感动之外，更加增添了后悔。

这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之中。古人云，人之相与，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我与季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倾盖如故”了。正因为“如故”，直到今天还没有为这篇文章当面或打电话向季先生道一声谢，生怕说俗了反而有读清听。但是，心意是不可不表的，于是又想到借助于《夜光杯》——我们实际上是从《夜光杯》由相知而相识、由相识而更相知的。在今天，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人之间淳朴的神交，似乎越来越近乎神话了。因此，把这种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告诉万千读者，也许比只告诉一个人更有意义。

2002年5月23日



## 蚕豆滋味究若何

今年春夏，北京农贸市场上的新鲜蚕豆特别多，这是多少年来的罕见现象，说明南北蔬菜流通渠道越来越畅了。对于我这个江南人来说，确实是个福音。

我生于苏州，长在上海，儿时每到春天，能够天天吃到新鲜蚕豆，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每当一盘碧绿、鲜嫩、喷香的蚕豆端上餐桌，便是大快朵颐之时。二十岁以后到了北方，最大的遗憾之一是彻底失去了这份享受，蚕豆便成了梦中乡思的内容。“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天来了，尽管塞北山区也有杏花如云、梨花似雪的壮美景色，却总也替代不了对江南水乡弥漫的蚕豆清香的回忆。怪不得有位古人秋风一起，便兴“莼鲈之思”，连官也不想当了。

近几年，北京农贸市场上开始出现新鲜蚕豆，但是量少难觅，而且由于运输费时，买到的往往豆荚已经发黑，味道大为逊色。而今年春天上市的，新鲜度大为提高。第一次遇上，就兴冲冲地买了一斤，想让家人都来尝尝新。不料，十二岁的外孙女却对外婆炒得青翠可爱的一盘蚕豆不屑一顾，再三动员，才勉强吃了一粒，嚼了几口便皱起眉头。问其故，答曰：“真难吃，一股脚丫子臭！”

我大吃一惊，清香扑鼻的美味怎么到她嘴里变成了臭不可闻？我立刻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

五十年代初，我刚到东北，有一位东北籍老同志问我：“听说上海人吃火腿粽子，那玩意儿能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不信，以后让上海家里寄几个给你尝尝。”不久，家里果然寄来了几个咸肉粽子，我首先给那位东北同志送去了一个。第二天问他味道如何，满以为他会赞不绝口，没想到他说：“哎呀，你可把我坑苦了，一股脚丫子臭，我咬了一口就赶紧把它扔了！”此事后来成为笑谈，一位南方同志听说后，捧腹大笑说：“谁叫你送错了人，送给我就对了！”

从此，我懂得了对食品美恶的评价，南北大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

切取决于不同地域的不同生活习性和审美观念,南方人之所好,很可能为北方人之所恶,反之亦然。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就绝不参加任何关于南北口味孰高孰低的争论。

进京以后,我经常参加一些外事宴请,又发现了新问题。过去常说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外国人对中国佳肴美味赞佩得如何五体投地,我也曾经为之飘飘然。经过深入观察,发现这种说法有相当的片面性。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由于民族、地域、阶层、习性的不同,对中国菜的认同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东方人观念中的山珍海味、珠玉饌食,例如海参、鱼翅、鲍鱼、燕窝等,在许多西方人吃来简直是味同嚼蜡,甚至厌恶得要呕吐。问题是西方人出于礼貌,绝不会当面表露,相反还会眉飞色舞地夸奖“太美妙了!太神奇了!”其实他们宁可去吃低档的鱼香肉丝,也绝不愿尝一口最害怕的“黑色软体动物”或“燕子的唾液”。

这就要回到本文的主题:蚕豆滋味究若何?这是一个无法简单用“好”或“坏”回答的问题。爱之者曰好,恶之者曰坏,一切决定于品尝者本身的口味,而口味的形成又有其多方面的因素,甚至可以追溯到襁褓时代吃第一口食物的感觉和经验。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和丰富多彩,对于蚕豆之类味觉的差异,只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大可不必去较真,更不可将自己的习性强加于人,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我曾想过,如果当年老和东北同志争论“火腿粽子”和“酸菜白肉”哪个好吃,我也许不会有今天了。

明乎此理,可以养性,可以睦交,可以匡谬,可以避祸,可以延年。

2002年6月3日

## “一样话，千样说”

“一样话，千样说。”——这句话是我二十多年前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其意为，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上千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富有排难解纷经验的老农民，就常用这话开导年轻人。

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身边的“案例”，发现中国人的语言艺术和语言技巧实在太丰富了，怪不得几千年前就产生过触蓍、东方朔、苏秦那样的语言大师。试看生活中，正话不仅可以正说，还可以反说；实话不仅可以实说，还可以虚说；直话不仅可以直说，还可以弯说；硬话不仅可以硬说，还可以软说……凡此种种，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千变万化，以达到最佳效果为目的。

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就是以善言著称。谈吐幽默诙谐，即使谈到最不愉快的事情，也委婉曲折，令人解颐。时下书画市场仿冒他的赝品甚多，有人买了请他鉴别，他发现是伪作，只是微笑着说：“这幅写得比我好多了！”大家哈哈大笑，买主也借此下了“台阶”。这叫“反话正说”。

楚辞专家文怀沙教授，高寿九十有三，但思维敏捷，一如少年，尤擅“正话反说”，闻之令人捧腹。不久前他读了拙著《敬宜笔记》，竟在电话里把我大“骂”了一通：“范敬宜，你真不是玩意儿，写出这样的书来害我。老年人以健康为中心，你却搅得我睡不着觉，老泪婆娑，损害了我的健康，这书的毒性实在太大了！”他“骂”得痛快淋漓，我听得也十分开心。这可谓“正话反说”之妙品。

以上两例举的都是学者，在普通老百姓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智慧，可以从中学取营养。

我有时吸烟。一次单独从郑州回北京，一路忍了十几个小时没有抽烟。车快到北京时，我问扫地的列车员：“现在可以抽支烟了吧？”她很有礼貌地嫣然一笑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抽，不过需要劳您驾多走几步……”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车厢外的

车体接合部。我一听笑了,明明还是不让抽,可是说得顺耳,既达到了禁烟的目的,又给人留了面子。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抽”和“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抽”在这里的实质是一样的,但去掉了一个“不”字,使人感觉大不一样。

还有一次是关于骑自行车。过去自以为骑自行车的技术还可以,往往在人堆里骑行不愿下车。不久前却惹了麻烦,前轮撞着一个人高马大的小年轻的脚后跟,我正心想非闹一场不可,不料他回头冲我噗嗤一笑,说:“哟,年纪不小,技术还不错咧!”把我臊成了大红脸,其效果真比打我还厉害,从此我再也不敢逞强了。

活到老,学到老。最近有位记者参加《“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活动,从云南丽江回来,给我讲了一个亲历的故事:

一位外国旅游者,被丽江田园诗一般纯朴、宁静、恬淡的生活迷住了。他不解地问一位当地的农村老太太:“你的生活节奏这样舒缓,你没想过这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太不协调了吗?”老太太一点也没有被问题难住,她不紧不慢地回答:“每个人生下来就每时每刻走向死亡,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走得那么急急忙忙呢?”说得那位外国旅游者连连惊呼:“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可不是吗,中国人中的语言天才太多了,但是,为什么反映在纸上的往往是那么呆板、干涩?

2002年6月20日

## 站在“旱桥”看上海

被上海人称为“旱桥”的，是徐家汇公园里一条长约五百米的钢木结构悬空人行便桥。

近几年来，上海市政府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憩场所，在几个街区新辟了街心小公园。这种小公园占地不多，耗资不大，但小巧玲珑，很受市民欢迎。徐家汇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而旱桥属于它的一个景观。

六月中旬，我到上海出差三天，可是自由活动时间只有三小时。怎样利用这三个小时？朋友建议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去参观“中国第一”的88层金茂大厦；另一个是去浏览两个街心公园，并特别提到了徐家汇公园的旱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我想的是：金茂大厦固然美轮美奂，十分诱人，但只能居高临下，俯瞰上海之大；而在街心公园，则可以细察品类之微，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感受。

我们走进徐家汇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座旱桥。其实，它不过是一条用硬质木方连接起来的走廊，朴实无华，开始不觉有何奇特，待细细观察，才发现设计的匠心：第一，公园本身面积不大，有了这条蜿蜒曲折的“长廊”，便延伸了“景深”，使人不觉其小。第二，公园只有“平原”，没有起伏的地势，而旱桥设计得高低有致，走在上面，自有一种登山涉水的感觉，使人不觉其平。第三，旱桥的坡度比较平缓，老人、小孩走起来很舒服，使人不觉其累。如果我的看法没错，那么设计者和决策者对游客可真说得上体贴入微了。

不仅如此，我还惊讶地发现，公园对这座旱桥保养得十分精心。此桥虽已建成年余，桥面的地板、护栏依然光洁如新，不见一点污迹。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我就看见两拨清洁工，一前一后进行清扫，前一拨刚用掸子掸去护栏上的浮尘，后一拨紧

接上来用抹布仔细擦拭，一天不断如此循环往复，那认真劲儿，就像家庭主妇在护理心爱的家具。

走下旱桥，刚要离开，忽然又被园内一座红砖大烟囱吸引。原来这是“文物”，现在它的底座镶着大理石，一面刻着浮雕，一面刻着碑文，无言地向游客诉说公园的历史：

“徐家汇公园，占地八余公顷，东自宛平路，西抵天平路，南镶嵌在衡山路和肇嘉浜路之间，由加拿大 WAA 合作公司与上海市园林设计院合作设计。原地为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和部分居民区。现园内烟囱、红楼和留存数幢民居，建于二十世纪上叶，以资纪念。”

碑上的浮雕，就是那两家拆迁企业的鸟瞰图。看着看着，不禁浮想联翩：

聪明、务实的上海人呵，你们连这样一座小小的普通街心公园都这样当作“精品”来精雕细刻，我还用去看金茂大厦，看东方明珠吗？我还能对实现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有任何怀疑吗？

2002年7月3日

## 刮脸刀的联想

在我的记忆里，上海的美妙享受之一是理发，特别是理完发之后的刮脸。高级理发厅自不必说，即使是中低档的也差异不大。我走过许多大中城市，像上海这样的刮脸水平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上海理发店的刮脸，是传统技艺与现代化服务的综合：规范、卫生、娴熟、细致、周到、舒适……给予顾客的最终的感受是神清气爽。离开上海之后，这种享受便在生活中消失了，即便花了高价，也买不来这十几分钟当“皇帝”的感觉。反正在理发普遍成为城市一大“难”的年代，人们对刮脸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奢求。近几年来，各地理发店、发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以为从此对刮脸也会讲究起来，不料理发店、发廊追求的是蛇妆、晚妆、鬼妆等等带来的高经济效益，刮脸这个服务项目竟悄悄销声匿迹了。拿北京来说，至少百分之九十的理发店不管刮脸，理由据说是新一代的理发师已经不学刮脸了，谁要想怀旧一番，请到路边小摊上去找退休、下岗的老师傅，可是一看摊上的卫生条件便望而却步，不敢问津了。

于是，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难得一去的上海。最近到上海出差，下车伊始，便去找可以刮脸的理发店，走了几家都碰了壁，后来找到一家小门面的理发铺，唯一的理发师是位小年轻，他倒应承下来，还蛮虚心地说：“我手艺不好，您多包涵。”我一再鼓励他：“没关系，胆子大一点！”待他一下刀，才发现他确实是个生手，那刀锋总是在离皮肤零点几毫米处颤悠。我反正已经横下一条心，闭上眼睛，由他摆布，但心脏却像悬在一根游丝上，在胸腔内晃荡，脑子里忽然又出现了那条黑字标题：

“刮脸刀不能操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

说来话长，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专程到“老大哥”那里取经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带回来了一种新型文体——讽刺性小品文。在上面的推广下，一时间这种专事针砭社会弊病的文体风靡全国报坛，我所在的那家报社属

于其中的“排头兵”，而我又荣幸地被选为这种专栏的编辑。当时流行的是一条舶来理论：讽刺小品是一把“刮脸刀”，它专门清除生活中的各种污垢，为的是使社会主义祖国的仪表更加光洁鲜亮！

既然有这理论根据，那就放心大胆地干吧！不料1957年的那场风暴一来，“小品文”就首当其冲成了“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最恶毒的“武器”，“炮制者”纷纷落马，我自然也难以幸免。开始，不谙世理的我还傻乎乎地拿出“刮脸刀”的理论进行申辩，结果还落了个“认罪态度不好”。终于有一天，报纸上赫然刊出一篇题为《刮脸刀不能操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的大块文章，大意是：刮脸刀固然有整容的功用，但是如果它操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借刮脸之机，在你咽喉上狠狠割上一刀，会是什么后果？岂不令人毛骨悚然？问题的可怕还在于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我们身边，等等。我一看就明白，自己已经列入“别有用心的人”的队伍，真正应该毛骨悚然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往事都已渐渐淡忘，唯独这个对“刮脸刀”的妙喻记忆犹新。虽然历史已为我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正名，但是每当真的刮脸刀在我颊上游动的时候，总是觉得背脊上一阵发紧，生怕那操刀的也是个“别有用心的人”。可惜至今还没有尝到过咽喉被狠狠割上一刀的滋味，可见世界上要碰上专门给人咽喉来上一刀的理发师的概率实在太小，因此尽管有时还心有余悸，却依旧对刮脸情有独钟。现在感到遗憾的倒是，给人刮脸的理发店太少，善于使用刮脸刀的高明理发师更少，要不，为什么街上满腮长着脏兮兮胡子的人会那么多？



2002年7月16日

## 巧得丁总新“教程”

我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任后，校方提出希望我开一门课：“新闻评论”或“评论与专栏”。我是办报出身，对这项任务自然义不容辞。

开课就得有教材。我过去虽然天天和评论打交道，也经常撰写和修改评论，却从未从理论上对评论写作作过系统的总结，对评论教学更无研究。现在要开评论课，按规定必须先向教务处报采用的教材。说来惭愧，我对国内当前究竟有哪些比较权威的评论教学著作不甚了了，只好委托同事帮我收集。

几天之后，同事从图书馆给我捧来一大摞评论著作，我翻了一遍，大部分是评论写作的经验谈，缺少可供教学用的教程。正在发愁，终于发现了一本《新闻评论学》，丁法章著。“内容提要”上说，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本《新闻评论学》；再看一遍目录，也正符合教学需要。乃大喜过望，毅然拍板：“就报这本！”

丁法章同志，人称“丁总”，是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过去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是对他在上海报界的业绩和声誉非常了解，十分敬佩他的多方面才能。尤其是像他这样又办报、又教课、又著书的，在总编辑中可谓凤毛麟角。十年前，我应他之邀，到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晚报工作会议，他亲自到机场接我，因为已过饭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在近郊一家路边小店吃了一碗素菜汤面，方知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讲究排场的“官”，更增加了对他的好感。现在得到了他的著作，自然倍感亲切。

我用了两天时间，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本《新闻评论学》，深深为它的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立论之精当、文字之活泼所倾服，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此书作于1984年，距今已将近二十年，而这二十年中，我们国家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闻媒体的变化尤其明显，评论的品种、技法也更趋多样化，更趋讲究和成熟，这些重要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不可能在二十年前的著作中即有充分反映，更

不能苛求于编著者。好在基本框架很理想,我就满足了,问题只是如何增添一些新视点、新内容。

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年6月20日,我应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记协邀请,到上海讲课。下了飞机,想不到又是丁法章同志来接我。老友重逢,分外高兴。上车以后,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牛皮纸袋交给我说:“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请你提提意见!”

我打开一看,又一次喜出望外,原来是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评论教程》!

我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正是关键时!你难道知道我正需要它?”

丁法章同志说:“那本《新闻评论学》出版以后,一直很受欢迎,后来修订过一次,共印了三万多册,还是供不应求。出版社的同志希望我根据近二十年来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独力再作一次全面修订,力求反映这门学科的最新水平。可是因为太忙,迟迟未能完成。今年春节以后,出版社的同志限定我必须四月底以前交稿。我只好尽可能地辞掉外面一切活动,几乎天天闭门谢客,日夜兼程,有时真达到了废寝忘食,终于按时交稿、出版了。”

听了他的简单叙述,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他是新闻圈子里的大忙人,虽然已退居二线,兼职仍然很多。能够挤出这么多时间著书立说,太不容易。相比之下,我只能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在宾馆刚住下,上海就大雨倾盆。下雨正是读书天,干脆把预定的下午一切活动都取消,定下心来读这本《新闻评论教程》,边读边做笔记。这时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修订,实际上是重写。特别是读到“电视新闻评论”“网络新闻评论”等新章节时,不禁暗想真是天助我也,丁法章这本书怎么好像是专为我写似的……

2002年7月25日

## 明天毕业唱什么？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每个时代都有代表它不同时期的毕业歌。

我所说的毕业歌，不一定是正式命名的《毕业歌》，而是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广泛传唱的歌。它既是毕业生当时理想、追求、憧憬、精神状态的抒发，又是时代脉搏的跳动。

今年暑假前，北京各高等学校出现举行毕业典礼的高峰。时值罕见的高温天气，骄阳似火，挥汗成雨，可是校园里人气更比天气热。拿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来说，到处是一群群穿着学士服、戴着方帽子的学子，欢聚一起，说啊，笑啊，唱啊，照相啊，摄像啊，全然不把酷暑放在眼里。直到夜幕降临，暮云四合，校园里还不断闪烁着照相机的闪光，回荡着各种各样欢快的青春歌声。

我沉醉在这闪光和歌声里，思绪潮涌。半个世纪以来各种毕业歌在脑际此起彼伏，交汇成一支忽低沉忽高昂、忽幽远忽雄壮的时代交响曲。

我第一次看到大学毕业典礼是1938年夏天。那年我8岁，时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姑母，特意带我去领略上海教会大学在大光明电影院联合举行毕业盛典的“大世面”。当时国难当头，场内冠盖如云，场外战云密布。大概人们都意识到前途的渺茫暗淡，当唱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毕业歌》时，我看到许多学生神情肃穆，眼噙泪水。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痛楚，不亚于都德的《最后一课》。

值得庆幸的是，我大学毕业已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1951年，全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建设人才。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岁月已经结束，面临的却是另一个问题：能不能无条件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那年夏天，全市几千名应届毕业生集中在交通大学参加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们每天唱的是这样一支歌：

年轻的心在跳跃/满腔的热血在燃烧/听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响  
应她的号召/让我们走/走在最前头/让我们走/走在最前头……

雄壮豪迈的旋律,激发着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开始,有些不表示服从统一分  
配的同学还不好意思大声唱它,渐渐地,年轻人的心律和歌声的旋律融合在一起,  
跳动在一起了,最后作出了终生无悔的选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大批大学毕业生自  
觉地奔赴“祖国最需要地方去”建功立业。这时,最熟悉的歌便是——

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  
奔向那灿烂的前程/到北方去/到南方去/到艰苦的边疆去/到工厂去/到  
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年唱着这支歌走上新征途的年轻人,今天虽已白发苍苍,仍然喜欢哼着它,  
毫不怀疑这些豪言壮语确是出自肺腑。

接踵而至的十年浩劫,中断了一代人的梦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恢复高  
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时,他们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曙光,热情奔放地放声高唱  
《年轻的朋友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  
/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当年唱这支歌的年轻朋友们,现在都是中年人了。歌中所憧憬、企盼的一切,  
都已成为现实。今天他们的子女也都开始跨进大学的大门。时代的变化,带来  
的是审美情趣的多层次化。当这批年轻人毕业的时候,作曲家们给他们准备了  
什么新歌呢?他们又该唱些什么呢?这几天从荧屏观看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  
奖赛时,我不住地想着,想着……

2002年8月4日

## “吃不了的统统给我！”

今天，我应邀出席一个午宴，席间发生的一件小事，令我心潮难平，以致未等终席就匆匆提前告辞，只想找个地方让心情安静下来。

宴请的主宾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身任多家著名企业的董事长，据说财产在香港名列前十几位。但是他最大的志愿和兴趣是传播孔子学说，在国内国外到处发表演说和著作，弘扬孔子精神，可以说是一位地道的儒商。

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位香港巨商，肯定是一身富贵气。想不到从外貌到衣着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见面时连一句寒暄都没有，开口就讲孔子学说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对于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入席之后仍是滔滔不绝，纵谈当今世界各国研究孔学的状况，甚至当别人已把第一道菜吃完，他还一箸未动。等到第二道菜上桌，他翻看了一下菜单，正色发话：“今天的菜太丰富了，完全没有必要。儒家从来是崇尚俭朴，反对浪费的。请你们马上通知厨房，把菜单削减，免得浪费。如果你们有吃不完的，统统给我吃，不能扔掉……”

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都笑起来，有的还说：“看来汤先生的胃口很好。”

汤先生的夫人在旁解释说：“他就是这样，在香港人家请他吃饭，他面前盘子里的菜必须吃光，谁把菜剩下，他都拿过去吃掉，舍不得扔进垃圾桶。”

看来汤先生是认真的，否则像他那样的身份，绝对说不出“你们吃不了的统统给我吃”这样的话。

后来的情况如何，我就知道了，因为提前退了席。原因一半是确实有事，一半也是担心看到后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

其实，我也看过了那张菜单，比起许多我参加过的宴会，绝对算不上豪华，只能说是中等偏上的水平。作为一位不知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富商，竟然会觉得这已是“不必要”的奢侈，不免使人感到不易理解，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决不是矫情。

近几年来,吃喝之风越演越烈。请一次客动辄千金万金,已经司空见惯,而席间的浪费,更是令人咋舌。有时整盘的山珍海味,原封不动地端下去扔掉,也很少有人表示可惜,或者很少有人敢说可惜(怕别人笑话)。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把浪费看作是某种身份的标志。有一次参加某地地方官员的宴请,本来已经是饭饱,即将散席,主人忽然提出今天没上饺子是个不应有的疏忽,限令厨房在十分钟内把饺子做好端上来。这下可把厨师搞得措手不及,但官令如山,谁敢违抗,结果真如变戏法似的把一盘现剁现包、热气腾腾的饺子变了出来。众宾客热烈鼓掌,盛赞领导有方,“一呼百应”。结果是只有少数人每人吃了一个,但目的总算达到了:当众显示了领导的权威和魄力。当时我想,如果一位官员把权威和魄力用在一盘饺子上,岂不可悲! 进而言之,如果把挥霍摆阔当作是“观念更新”,岂不更加可悲!

2002年8月14日



## 好山何以不“入岳”？

从小就向往名山大川，更羡慕遍游过名山大川的古人。壮岁以后，走南闯北，浪迹天涯，才发现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多数古人到过的地方，比今人要少得多，也差得多。有些被誉为“天下第一”的胜迹，未必名副其实，主要靠帝王、名人品题而得名，而真正的好山好水，真不见得挂得上号。

比如，黄山景色之美是世所公认的。有人作过这样的评论：许多名山是“看景不如听景”，唯独黄山是“听景不如看景”。但是黄山过去一直未入“五岳”之列，尽管它比有的“岳”强得多。难怪著名新闻工作者艾丰登了黄山之后为它大鸣不平，在山崖上留下了“如此黄山不入岳，莫叹人间多不平”的题句。

其实，该鸣不平的远不止黄山，因为黄山毕竟已经出名。而大量不逊于“五岳”却至今默默无闻的大山在。随便举个例子：辽宁鞍山附近有座千山，又名千朵莲花山，景色绝佳，秀、幽、奇、险兼而有之，特别是它秋天的满山红叶，红得气势宏伟，比北京的香山另有一番风光，可惜它远处关外，过去有名的文人墨客足迹罕至，没有得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类顶尖评价，虽然国画大师谢稚柳先生说过“最入画的要数千山”，它的名气仍然不大。

不久之前，天津市人大在蓟县举办通讯员座谈会，邀我去讲课。散会之后，主人又盛情相陪去游览盘山和黄崖关，说是风景“特别好”。我有点不信，因为蓟县离北京不过一百多公里，却从未听说过有这两个好去处。及至到了那里，大出意料。盘山兼有江南的秀美和塞北的壮美，据记载乾隆皇帝初次来此，曾惊叹“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以后连续来过三十多次，可谓百看不厌。黄崖关则是长城要冲，其雄奇险峻，较之八达岭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还留下明代名将戚继光的遗迹。登高四望，顿觉苍茫的历史风尘扑面而来。可是世人往往只知八达岭，很少知道这个黄崖关，所以游客要比八达岭少得多，岂不遗憾！

我说这些，并非为这些不甚知名的胜迹做义务广告或为它们抱怨叫屈，只是由山想到了人，想到人的命运有时也与山相似。在我们周围，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很多很多，可是或者由于缺乏“地理优势”，或者由于不善“自我包装”，或者由于无人品题，或者由于无缘进入关键人物的视野，往往很难脱颖而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与山不同的是，山是不朽的，只要地壳不发生大变动，它将永久存在，总有被发现和出头之日。九寨沟、张家界等国际名胜，原来不也默默无闻，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声名鹊起的吗！而人是速朽的，一生不过草草几十年，说埋没就埋没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社会的损失。

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一种真正能够实现“野无遗贤”的用人机制呢？——徜徉于黄崖关头的时候，我在不停地遐想。

2002年9月1日



## 艺坛勿忘吴湖帆

这个题目在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促使我终于动笔的，是读了7月10日《文汇报》的一篇报道——《吴湖帆〈佞宋词痕〉现身》。

这篇冠以醒目大标题的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上海书店出版社首次公开出版吴湖帆这本词集的经过及其背景，展示了这位画坛一代宗师在书画之外另一方面的才华。作为一个吴湖帆的崇拜者，读了十分振奋。不过，报道中说《佞宋词痕》透露出吴湖帆那“不为外人所熟知的创作才能”，这“不为外人所熟知”七个字，却引起了我的几分惆怅。

原因是，吴湖帆在诗词方面的才能不是“不为外人所熟知”，而是早已为人所熟知。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吴湖帆即以书、画、诗、词四绝驰誉。当时大江南北，艺坛高手如林，但具有吴湖帆那具有全面素养而且造诣高深的，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凤毛麟角。即使流派完全不同的大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超人才华。我曾亲闻海内收藏鉴定大家庞虚斋说过：“吴湖帆是元代赵孟頫以后第一人。”这样高度的评价出自一生严谨的庞老之口，太不简单。张大千是誉满中外的一代宗师，眼界之高，见识之广，非同一般，他对吴湖帆同样十分钦佩，曾经说过：“吴先生的书房底子我是学不到的，所以在艺术上也不容易达到他的境界。”所谓“书房底子”，指的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这种造诣，反映在他的绘画、书法上，就是无处不在的浓厚书卷气。当年师法吴湖帆的可谓多矣，也有功力不错的，但论气质无人可以企及，差别就在“书房底子”上。

因此，吴湖帆不仅以画名重一时，也以文名重一时。在他的周围，不仅有众多书画大家，也有众多文化名流。抗战初期，他的夫人潘静淑因病逝世，遗留下“绿遍池塘草”的佳句。吴湖帆即以此句遍征海内名家作画或题咏，后来结集出版，约二百余件，名为《绿遍池塘草》，皆当代俊彦精品，一时传为艺坛佳话。仅此一举，也足

以证明吴湖帆在艺坛、文坛的声望和号召力。不知此书现在还有遗存否。

那么,为什么现在吴湖帆文学方面的才名已经“不为外人所熟知”了呢?原因非常复杂,但我看归根到底是对他在文化艺术上的地位如何正确评价上。一个奇怪现象是,近年来出版了许多近代著名书画家名录,很少收录吴湖帆的条目,有的只有寥寥数语,有的一字不提,似乎他在中国艺坛上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相反,有些名不见经传、甚至初学涂鸦的人物,倒是大书特书,这是很不公正的。

好在人心是碑,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造诣在人们心目中是抹煞不了的。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重新发扬,近来重提吴湖帆的声音大起来了。《文汇报》以罕见的版面介绍吴湖帆的词作,就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艺坛勿忘吴湖帆! 文坛也勿忘吴湖帆!

2002年9月9日



## 修车摊上话“瘦身”

闲时喜欢在附近街头修车小摊坐坐，观观街景，聊聊家常。这既是一种老年人的生活情趣，也是一个观察世情、社情的小小窗口。

上星期日，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推着自行车到摊上来打气。只见她拿起打气筒就一筹莫展，气杆在她手里既拔不动又压不下，最后她无奈地央求修车师傅：“对不起，麻烦您替我打一下吧，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我端详了一下这个少女，细高个子，约在一米七〇以上，面目清秀，衣着新潮，可是骨瘦如柴，两条胳膊正像北方人形容的“麻秆儿”。

修车师傅抬头瞅了她一眼，一声不吭，又埋头干他的活计。我顿生怜悯之心，从她手中接过气筒：“还是我替你打吧！”她面有惭色地说：“那就谢谢您啦，真不好意思……”

等那少女离开以后，修车师傅叹口气说：“你多余去帮她。这都是减肥闹的，十几岁的娃娃就开始想当‘骨感美人’，再减就快成骷髅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她是减肥减的？”他说：“我见得多了。邻居家有个女孩儿，才上初中，就天天不吃早饭，饿着肚子上学校，前几天上体育课，跑了几圈就虚脱，晕倒在地，把老师吓坏了，赶紧送医院输液抢救过来。这样闹下去，这下一代人的身体不毁了吗？”

我忽然想起，两年前上海报纸报道，两个女孩子为了瘦身，长期节食，得了不治之症，最后医治无效，相继死亡。修车师傅听我这一说，摇头叹息说：“现在这种减肥好比慢性中毒，暂时感觉不出来，恶果要十年八年以后才暴露，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说到这里，修车师傅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堆报纸杂志，指着上面的广告和文章，忿忿地说：“你瞧，还在那里鼓吹‘减肥’‘瘦身’呢——看这个：‘二十一世纪瘦身前

沿’，‘风头最健的曲美’，‘安装在肚皮里的减肥仪器’，在胃里钉钉子，缩小胃容，体重可以每月5~10公斤的速度递减……听说现在最标准的美人是‘鹭鸶腿、排骨胸、鸡爪手’，这还成人形吗？”

我笑道：“你老兄的观念太陈旧了。过去我们学美学，对美的经典定义是‘健康即美’，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讲过，最美的是‘血色艳丽的女人’。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瘦即是美’代替了，过时了。”

修车师傅不以为然，和我争辩起来：“我不懂什么美学，只认一个笨理：人活在世界上，最要紧的是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我就不信，一个人假如连打气都打不动，将来能吃什么苦，耐什么劳，成什么大事！”

我故意继续激他：“你这又是陈腐观念。你还以为她们想的是将来也像你那样当修车工，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干苦力活吗？你还以为她们准备像大寨铁姑娘那样‘冰冻三尺不停镐，雪下三尺不下山’吗？时代不同了，对美的追求自然也就不同了……”

没等我说完，修车师傅就急了：“不论什么时代，都不该把病态当作美，把病夫、病妇当作美。我想的不光是这一代，还要想到下一代、再下一代。常言说得好：‘母大子肥’，弱不禁风的母亲决生养不出体格健壮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国家三分之一的母亲都属于扛着‘一副忧郁锁骨’的女人，已经摘掉的‘东亚病夫’帽子，又会重新戴在中国人头上！那些为减肥、瘦身卖力鼓吹的人，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过这一点没有？”

这回我真的无言以对了，争论只好草草收场。当天晚上，我给一位历史学家打电话谈了此事的经过，他竟十分激动地说：“这位修车师傅还真有见地。我记得托尔斯泰说过这样一番话：正是那些体态丰满健硕的女人，使俄罗斯民族剽悍强健的血统延续了下来……”

我急问：托翁此言出自何书，他说一时记不清了，但一定会帮我找到的。我相信他的博闻强记。

2002年9月29日

## 莫把“大资”当“小资”

我认识一位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不久前见面，问他又读了什么新书，他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批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小资”情结的作品，把他看得如痴如醉。最后他叹息道：“原来以为自己够‘前卫’的，想不到六七十年前上海的‘小资’们就远远超过了现在，我真有点‘白活’了的感觉……”

当时我只付之一笑，没有深问，因为不清楚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最近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从杂志上发现几篇文章，引述了一些那类小说的内容，总算了解了一个大概，觉得非常有趣。原来在那些作者笔下，三十年代的上海是这般摩登，这般时髦，这般迷人：

“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之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空气中融化了冲淡了的吉士烟草，汽油，水头，三花牌爽身粉和四七一一的混合味，伙食店里的大玻璃门流出一大批引起食欲亢进的烤咖啡的浓味，发光的广告灯：‘新鲜咖啡，当场烤研！’霓虹灯下面给统治着的：小巧饰玩，假宝石指环，卷烟盒，打火机，粉盒，舞鞋长袜子，什锦朱古力，柏林的葡萄酒，王尔德杰作集，半夜惨杀案，泰山历险记，巴黎人杂志、新装月报、加当、高泰克斯……”

“……第一座咖啡馆、第一场交谊舞、第一部好莱坞影片也是出现在上海。现在，随便一个上海人都会举例说：‘依晓得哦，那时候日本的有钱人想看好莱坞大片，还得坐飞机来上海看’……”

“知道咖啡里要加炼乳有什么了不起？早在60年前，上海的老婆婆们都知道皇家咖啡和俄式牛肉里，要放点肉桂叶子一起煮的。”

“可以这么说，今天的‘小资’们才刚刚步入上海生活，比如喝咖啡、吃牛排、泡酒吧、听爵士乐，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就被上海滩那些‘密斯张’‘密斯特白’们玩

腻了。”

实在太美妙了，怪不得惹得我那位年轻朋友对三十年代的上海“小资”们如此心向往之。

于是，我开始从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记忆里，搜索老上海“小资”的痕迹。

我是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生活的，住过法租界，也住过英租界。家庭成员中既有收入不薄的留美医师、教授，也有收入一般的中学教员，从经济状况来说，该能代表当时的“小资”吧。可是我家住的既不是花园洋房，也不是新式公寓，而是没有煤气、没有浴室的普通“弄堂房子”，更谈不到自备汽车（现在叫私家汽车）。上班、上学乘的都是有轨电车（而且总坐三等），难得坐一回黄包车。一日三餐，早餐照例是泡饭、腐乳、酱瓜，午晚一般是一荤两素，假日才加点排骨、黄鱼之类。在我们周围的“小资”们，生活大致如此。我去过大名鼎鼎的王蘧常教授家里，早餐同样只有一碗稀饭、一碟腐乳，偶然有一点肉松。在当时老百姓眼里，这就算是过的“好日脚”了。

那么，像现在那些小说里描写的豪华生活是不是事实呢？确是事实，可惜不属于靠工薪生活的“小资”们。即使在我上过学的著名贵族化学校——圣约翰大学里，坐着自备汽车来上课、晚上出入于夜总会、跳舞厅、咖啡馆的也只是极少数富家子弟，大多数同学生活和我差不多。当时我也在霞飞路、迈尔西爱路一带幽静的街道散散步，看见过夜上海的“各种神秘和放纵”，可是说实话，直到我二十岁离开上海，还从没有进过一次舞厅、咖啡馆，甚至连国际饭店的大门都没有跨进过。因为我知道自己和这种生活隔着太大的距离，而且比起闸北、南市一带的广大平民来，自己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

显然，现在那类作品里太抬举当年的“小资”了。它们写的不是“小资”，而是“大资”——外国的大商贾和冒险家，中国的大富翁和暴发户，洋行的买办，帮会的大亨以及形形色色的吸血鬼，等等。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是属于他们的世界。贫富的极度悬殊才是三十年代上海的真实“风景线”，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上海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我丝毫没有责怪那些作者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没有亲历过三十年代年轻人——那个时代离他们实在太遥远了。他们写作依据的只能是喝过“皇家咖啡”、穿过“烟笼月纱”的阿公阿婆们的口头文学和近年外国流行的

洋人怀旧资料。——那反映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实，而绝不是整个历史的真实。

莫把“大资”当“小资”！颠倒这个次序，就会颠倒了历史。

2002年10月12日



## 《登楼赋》回归记

“登高楼以藏修兮，时掩卷而凭栏，闲仰观以俯瞩兮，觉地旷而天宽……虽桃源之足乐，奈人世之未安。溯扬尘于北海兮，忽寒暑已屡更。金瓯倏其破碎兮，怆铁骑之纵横。嗟流离之载道兮，念故国之可伤。花凄其以色变兮，鸟愀恻而心惊。凭轩槛而西望兮，意感激而难平……睹邦家之豆剖兮，孰能如太上之忘情？遭举世之烽烟兮，幸弦歌之未辍。天赋余亦良厚兮，敢玩愒而自绝？庶好学之有成兮，拯斯民于火热……”

上面这几段文采飞扬的骈文，摘自1942年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学生王福穰的作文《登楼赋》。当时的国文教授王蘧常先生作了十二字评语：“缠绵悱恻颇有得于骚人之旨。蘧”。那年，王福穰年方二十一岁。

整整60年之后，2002年4月4日，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沈为平专程来到北京，登门造访王福穰，从满头银发的王老手里接过《登楼赋》的原稿，并向他颁发了捐赠证书。从此，这篇具有特殊意义的作文，作为校史档案回归交大。

对于我来说，深深为能够在这次传奇性的回归中充当一个媒介而感到欣慰。

九年前，在京工作的无锡国专老同学张慎趋给我寄来这份《登楼赋》的复印件，并告诉我，此文作者是我国著名国际金融投资学家，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任职，为我国国际投资工作颇有贡献。他一生从事经济工作，又长于诗词歌赋。写这篇《登楼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交大的徐家汇校舍被日寇占领，被迫暂借在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新厦四楼上课。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交大的处境更加艰难，但仍坚持办学。在这种形势下，王蘧常先生效东汉王粲作《登楼赋》以纾家国之痛的先例，给学生出了《登楼赋》这个作文题目，自然有深意存焉。而学生们也心领神会，借题发挥，同仇敌忾。王福穰的作文序言说得十分明白：“但蕲众志之成城，定卜河清之有日。爰为赋以自励，仿仲宣（王粲）之体，亦名

之曰《登楼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敢于出这样的题，作这样的文，真够有胆量的了。

由于有王蘧常先生的亲笔批语，王福穰一直把这份卷子随身珍藏，辗转南北。“文革”中它曾被抄走，十年后始得归赵。我读着它的复印件，惊叹不置，也感叹不已，一直想通过适当途径加以传播。1994年秋，从《文汇报》获悉，上海交大为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正在筹建校史展览室，我突然想到，何不把王福穰《登楼赋》这份珍稀资料推荐出去？便以“卫晋”的笔名，写了一篇《交大的启示》，刊登于1994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后来又由《文汇报》转载。想不到这个“卫晋”给不少人添了麻烦：交大因为不知“卫晋”为何许人，无法寻访王福穰；王福穰耳闻有个“卫晋”写了有关《登楼赋》的文章，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开始还怀疑是抄袭；连张慎趋也不知“卫晋”与他有何干系。就这样几方面找来找去，直到2001年下半年，张慎趋从上海博物馆王运天编撰的《王蘧常先生年谱》中发现一段记载：范某曾以“卫晋”笔名发表《交大的启示》云云，才恍然大悟，真相大白，可是已整整耽误了八年时间。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王福穰先生的《登楼赋》原稿回归交大以后是否已经公开展出。如是，我想冒昧提三点希望：一、希望详细说明这篇作文产生的时代背景，激励莘莘学子勿忘历史，珍惜今天；二、希望详细说明王福穰如何六十年如一日地保藏老师的手泽，倡导树立尊师重教的风气；三、希望说明当年交大如何重视中国传统文学的教学，连财务管理系的学生，古文根基也如此深厚，而且像这样精彩的文笔，也只给打了“八十五分”。

2002年10月21日

## 谒柳祠，念公仆

在唐宋八大家中，我对柳宗元情有独钟。前人评论他的文章“深、雄、雅、健”，然而我崇敬的不仅是他的文风，更多的是他的政风，或曰“官风”。

柳宗元一生只活了四十七岁。他二十岁中了进士，三十二岁官至礼部员外郎，在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可是，后来参加了王叔文等人的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转任柳州刺史。柳州自古为蛮荒瘴疠之地，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曾被流放于此，至今柳州的龙隐岩下，还留着他们的大量遗墨。作为一名正被“看好”的年轻高官，一下子受此沉重打击，柳宗元的心境可想而知。可是他不但没有消沉，没有颓废，反而更加奋发蹈厉，全身心地投入了柳州的兴革，在短短的四年中，释放奴婢，兴修水利，挖井修路，开荒种植，兴教办学，用现在话说，为老百姓办了大量好事、实事，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与此同时，还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名文。柳州老百姓为了纪念柳宗元的功德，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自发捐资修建罗池庙，即后来的柳侯祠。

正是出于对柳宗元的仰慕，今年十一月间，我和全国人大代表聂大江、宋木文等同事一起到柳州考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情况时，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谒柳侯祠。我原来以为，经过千年战乱和自然损坏，柳侯祠一定已经破败不堪，面目全非。没有想到它保护得那么完好，柳侯的衣冠冢、柑香亭、罗池、思柳轩等修葺如新。美竹绕屋，嘉木成荫，奇石峥嵘，游人如织。每到一处，总有人深情地说，柳州人至今还在享受着柳侯的遗荫。这使我想到了，尽管世殊事异，时代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柳宗元还活在柳州人民心中。

一个封建时代受贬黜的官吏，而且任职不过四年，为什么能够受到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怀念？在同广西柳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徐焕邦同志交谈时，他讲了一个观点：因为柳宗元身上有一种朴素的“公仆”意识。有何为证？他当场一口气

给我背了一篇柳文：《送薛存义序》，后来又录赠给我。好在只有 134 字，不妨抄录如下：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其值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我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其大意是，作为一个地方官，他的职责是当好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把老百姓当作仆役，因为官员是老百姓用赋税养活的。可是有的官员既不好好为老百姓干活，还要搜刮偷盗老百姓的血汗，而老百姓还不敢像对待家中手脚不干净的佣仆那样去处罚他、赶走他，岂不可怕？

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官员，能有这种公仆意识，实在够“超前”了，难怪毛主席那么重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离开柳侯祠的时候，我在感慨之余，信笔写了这样几句：

昔读柳侯文，梦魂追踪迹。  
今谒柳侯祠，凛然动颜色。  
美竹绕廊庑，嘉木庭前植。  
奇石托雅怀，青山铭手泽。  
遗爱在一方，口碑何用刻。  
临风发幽思，豁然开郁塞：  
政绩岂在多，所贵廉与直！

2002 年 12 月 2 日

## 谁在坐这“冷板凳”？

离北京故宫不远的南长街上，有一座“皇史宬”。它是收藏清朝历代皇帝重要文书档案的大宝库，现在属于中央档案馆。一道朱红的高墙，把它和车水马龙的街道隔得远远的，使这座古老的建筑显得分外神秘和寂寞。墙外匆匆而过的行人，恐怕很少了解那是什么地方。

我瞩目于它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直到最近才有机会跨进它的大门。对我来说，两小时的浏览实在是太短了，好像面对浩瀚的大海匆匆地投了一瞥，而仅仅这一瞥，已经足够为之心摇神移。

且不说那浩如烟海的奏折和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朱笔御批，单说那密室里几十座高及天花板的樟木大柜里皮藏的清室宗谱，恐怕任何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完。站在它们面前，不得不浩叹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促。

过去，这座宝藏是不轻易展示的，现在已经部分向社会开放了。我问工作人员：到这里来阅档的人多不多，他摇头说不多，有时候倒是外国学者和留学生来得比中国人还多一些。我又问近些年来有关清宫的历史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非常红火，它们的作者、编剧、导演、演员是否来过？他说：很可惜，从来没有来过一个。要是来看一次，就不至于那么“离谱”了。

我们走进一间清代地方官员奏折的展室，里面只有寥寥五六名读者，其中倒有两位是外国留学生。我走近一位来自德国的研究生，他正专心致志地抄录一份山西官员的奏折。问他抄的是什么内容，他说他是学法律的，正在研究中国清代对于精神病患者杀人如何判刑的判例，而这份奏折对他很有用处，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

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大海捞针似的从成捆故纸中搜索到这份历史资料的。在中国，现在究竟还有多少学者肯于坐这样的冷板凳？

由此想起去年结识的那位丹麦女学者维贝根·伯恩达赫(汉名易德波)。我曾在今年1月22日《夜光杯》上写过一篇《惊听洋人说评书》，介绍她潜心研究扬州评书的感人事迹。一个多月前，突然收到她从丹麦寄来的研究成果——一部厚达400多页的专著《扬州古城与扬州评话》，并附短简：

“尊敬的范敬宜先生：您好！很感谢您的有意思的小论文《惊听洋人……》。有朋友上网发现了！”

我断断续续用了十多个晚上才把这部书读完，确实被她那种“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的治学精神所震惊。在这部书里，不仅详尽地追溯了扬州评话的发展历史，对著名艺人王少堂、王筱堂、戴步章、高再华、费正良、任继堂、惠兆龙等不同流派的传承关系和特点调查得清清楚楚，还把他们的主要段子都翻译成英文，甚至把他们说书的表情和手势都摄影记录下来。也许我孤陋寡闻，对扬州评话作这样科学严密的记录和研究，恐怕不仅在外国人中是第一份。

由此想到目前我国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比如有些学者著书靠抄袭，靠“扒网”，靠“包装”，靠“炒作”，不用多久就“著作等身”，俨然成为权威了。这样下去，真不知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也不知将来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是否也要靠舶来“进口”？

2002年12月13日



范敬宜画作《桐荫夜话》并题跋：数十年不作画矣，今岁见《读者》杂志刊清人小品，不觉技痒，率尔操觚，成此两帧（一帧见另页《山水》），笔墨荒疏，不禁为之汗颜。（2001年夏）



范敬宜画作《山水》(2001年)

## 重游卢浮感慨多

巴黎的卢浮宫，是世界艺术的宝藏，也是法国的骄傲。每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数以千万计。

上个世纪的1995年，我第一次参观卢浮宫，深深被这里的艺术珍品所震撼。今年12月，有幸第二次进入这座艺术殿堂。时间相隔六年，虽然展品依旧，却另有重大发现，也可以说是重大变化。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参观者大大增加。六年前，参观者绝大部分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黄皮肤的多属日本人、韩国人以及东南亚人，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少。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大陆的同胞。我问卢浮宫管理人员，每天有多少中国游客，他说：“这可没法统计，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穿着、举止已经和从香港、台湾来的没有明显差别；不过肯定已经大大超过日本人和东南亚人。”最后他友善地笑着说：“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卢浮宫开始有了中文的导游图和说明书。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国家外文局工作时，一直为外国重要旅游点不肯接受中国导游资料而苦恼，为此做过不少工作，始终没能解决。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卢浮宫，在入口处看见摆着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十几种文字的导游资料，唯独不见中文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现在不仅有了，而且摆在显著位置。尽管上面印着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赞助”，也使我深深为之欣慰。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许多卢浮宫的说明员和导游人员用中国普通话进行讲解，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普通话讲得相当准确、流利，而且富有风趣和幽默感。在维纳斯的雕像前，我看见一位法国女导游用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向一群中国旅游者如此讲解：

“这是维纳斯。维纳斯是爱神，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所以她是众神中最美

的神。你们说，她美吗？（众答：美！）不，我认为她不美。（众笑）你们看，她有许多缺点。她的鼻子太高了，嘴太小了，腰太粗了，身材太丰满了。（众笑）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她算不上美人。现在流行的是骨感美人，瘦瘦的，长长的，时装模特儿都是这样，你们中国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众大笑，鼓掌）所以说，审美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尺度，说不定过了几年，维纳斯又成标准美人。（众鼓掌）……”

我听着心里暗笑：莫不是她读过我在《夜光杯》上写的《修车摊上话“瘦身”》，在批判我的观点吗？

据说，现在法国正在兴起一股学中文热，尤其是中国“申博”成功后，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说来奇怪，法国人学中文还真有点天赋，加上他们开朗、幽默的性格，说出来的中国话还真别有一种风味，说不定将来会有一些超过那位会说中国相声的加拿大人“大山”。

真是不到外国，难以深刻体会“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几年前出国，只要穿得整齐点儿，在街头，在电梯里，经常有外国人打量着你，问一句：“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现在变了，对方经常会冒出一句：“北京来的？上海来的？”然后再翘起大拇指，说：“真棒哎！”

2002年12月28日

## 初闻“健康长寿”

每逢新年、春节，照例会收到一些亲友或同事的贺卡。今年也不例外，只是有些贺卡的祝词内容有所变化——除了常规的“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之类，多了一句祝“健康长寿”。

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心头猛然一震：多可怕呀，已经到被人祝“健康长寿”的年龄了！

我对这四个字所以那么敏感，可能是有点受任仲夷同志的影响。据我所知，尽管他已届九十高龄，还是不爱听这句祝词。几年前他来过人民日报，有的同志说了一句“任老，祝您健康长寿”，他立刻正色声明：“同志，你这话说得不好哟，凡是需要祝健康长寿的，说明他已经不怎么样了，要不为什么对少先队员只说‘祝你天天向上’，不说祝你‘健康长寿’呢！”当时我只认为是一种幽默，现在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这也是老年人的一种心境，或曰心态。

这种心境，最近我已出现过两次。上一次是去年12月25日，北京连续下雪的第三天，一个朔风凛冽，天寒地冻的日子。上午，我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常委会议。快到西南门时，忽然听得一声断喝：

“老头儿！别往前走！”

我扭头一看，喝声来自马路中间一位指挥开会车辆的交警，冲的是我这个“老头儿”。我急忙止步，从怀里掏出出席证。门口的工作人员忙向那民警示意，并连连向我表示歉意说：“他没看清是谁，乱嚷嚷！”我一再说明：“没关系，他是执行公务！”话虽这么说，这一天心里惘然若有所失。

后来，我是这样想开的：第一，叫我“老头儿”是名副其实。七十二岁了，难道还不算“老头儿”吗？问题在于近些年来，听惯了人们经常夸我不老，什么“一点儿没有变样”，什么“你究竟有什么养生之道”，甚至说“看上去还不到六十”，等等。我虽

然明知其言含有水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现在看来，那位素不相识的交通警说的才是真话、实话。第二，那位工作人员说的也是一种真话、实话。他之所以批评那位交通警，并不是因为交通警忠实执行公务，无非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楚我的“身份”。如果不具有目前这个“身份”（其实这个“身份”很快就要结束），那就只是个地道的普通“老头儿”，那交通警的吆喝就不能算是“乱嚷嚷”了。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过去，我一直自以为是个比较旷达的人，对世间的代谢，人生的荣枯，早已参透。可是最近两次出现的心境，折射出自己对于老、特别是对当个普通“老头儿”还是缺乏自知之明和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满以为这么认识就够有“深度”了，谁知和一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同事一说，对方很不以为然，说：“你这么想、那么想，好像是想开了，实际上还是很在意的。不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早在二十年前就被人叫‘老头儿’了，从来不会觉得难受；你怕听、不爱听人家祝你健康长寿，我还巴不得有人祝我健康长寿呢！——这恐怕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我正想解释，他继续说下去：“你好好听我说。叫你‘老头儿’也好，祝你‘健康长寿’也好，都是好心，没有坏意，你听了欣然接受就是了，不能去驳人家，这才是真正保持了一颗‘平常心’，才能真正心情愉快地度过你的晚年。”

我想，他说得似乎有点道理。看来，“曾经沧海”的人要想保持一颗“平常心”，还真不那么容易哩！对待年龄问题是这样，对待其他事情何独不然！

2003年3月6日

## 我与“的哥”常交往

九届全国人大即将换届,有人问我:你当了五年人大常委,最值得回味的事情是什么?我答:是和“的哥”们打了五年交道,他们帮助我了解了许多社情、民情。

“的哥”,是北京人对出租汽车司机的戏称。外地人常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业余政治家”,往往能把国际、国内大事以至各种社会现象和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侃”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这确非夸大。当然,其中难免有些属于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但多数还是能够反映一点真实情况。对于人民代表来说,不失为一条了解社会、了解民意的特殊渠道。

有人觉得奇怪:你有自己的专车,又有尽职的司机,怎么会去和“的哥”们打交道?说来纯属偶然: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一天由于我的疏忽,弄错了开会时间,只好临时匆匆忙忙“打的”赴会。那位司机从我佩戴的出席证上了解了我的身份,出于对人大代表的信任,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对体制改革、工人下岗和城市交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希望我带到会上。当天晚上,我把这些见闻写了一篇题为《“打的”赴会》的“两会漫笔”,发表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广泛注意。后来,我还把这位“的哥”的另外一些具体意见面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他听了很受感动,说想不到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能够这样关心国家大事。

从此,我便成了出租汽车的常客。“打的”的主要目的是和“的哥”们聊天,想听听在机关里和会议上不容易听到的事情。

刚到人大,就接触到对文化市场中所谓“三陪”问题看法的争议。有的认为情况严重,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有的认为发展健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取缔会影响招商引资和从业者的生活;有的认为所谓“三陪”事实上都属色情服务,有的认为还必须区分“有偿”与“无偿”的界限;有的认为已大有收敛,有的认为愈演愈烈,等等。对这些问题,我纯属外行,根本没有发言权。后来终于把实底搞清了,“老师”就是

“的哥”们，他们见多识广，对个中的一切内幕背景都了如指掌。长期坐而论道、争论不休的问题，打几回“的”心里都有数了，从而避免了在判断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人们往往认为，“的哥”们的“侃大山”不过是些低层次的信口开河罢了，只能姑妄听之。后来发现他们中间不少人文化层次不低，还颇有政治头脑。和他们聊天的内容，竟然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时间和标志，东南亚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高校扩招的利弊得失，分配不公有无积极意义、出租车行业的“份儿钱”为什么那么高……真是五花八门，有时竟把我问住了。有些似乎不顺耳的话，还真有助于我们这些“官员”换个角度想问题。

中国申奥成功那天晚上，举国欢腾，北京更是欢欣若狂，兴奋的人群甚至使主要交通干线途为之塞。第二天在出租汽车里和司机谈起群众为什么这样兴奋，他说：“对这种场面要作分析。主流当然是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感到骄傲、自豪、扬眉吐气，但是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想法：商人想的是有钱赚了，下岗工人想的是有活干了，无房户想的是有房住了，居住条件不好的想的是旧房拆迁改善条件有希望了，还有一些人，老实说是起哄、发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你们考虑问题可要冷静点！”最后他补充一件事：前一天深晚，他从机场拉了好几个香港房地产商人，他们是一看到电视新闻就连夜飞到北京来“抢滩”圈地的。他说：“如果这样，北京的老胡同可要遭殃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我也曾把这番见解向有关部门“宣传”。

五年和“的哥”们常交往，听了许多真话实话，也记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实话录”。有的有时还互相通个电话聊聊。“的哥”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与他们的职业有关——和乘客只有一面之缘，一下车就各奔东西了。不过他们恐怕万万没有想到，还真有那么一个“老头儿”会经常把他们的声音转达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2003年3月6日

## 盼盼的“逆反诗”

外孙女盼盼,从小就是个聪明、温顺、听话的乖孩子。可是自从进了初中以后,性格渐渐地发生变化,变得沉闷、孤傲、不爱和大人说话交流,经常独自在她的房间里默默地写呀,轻轻地唱呀,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有人说:这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心理的反映,慢慢会过去的。我却总觉得纳闷:我也是从青春期过来的,怎么没有经过这么“逆反”的阶段?

忽然,最近情况有了好转:话多起来了,笑声也多起来了,气氛又开始活跃。特别有意思的是,“三八”妇女节那天,她居然给外婆写了一张卡片:

“原谅我的一切过错,让它们像落叶一样飞走吧!”

我正纳闷,“逆反心理”怎么逆转得那么快?前几天偶然翻翻她的作文本,突然发现她写了一首不短的诗:《呼唤》:

大人们,停住你们忙碌的脚步/用你们平时教育我们的认真劲儿/仔细听听这番话吧

别再老生常谈了/原谅我未用“请”字/地球上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你们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毕恭毕敬/而且用粗鲁的口吻命令道/把地上的灰尘扫干净

世俗的扫帚很沉重/它扫不走我们心头的乌云/却让我们对你们——可笑的大人们愈加怨恨

我们,渴望自主,渴望创造,渴望放纵/我们渴望自己的生活/可是作为大人的你们/却用那些老掉牙的“想当年”/一遍遍把我们想象的翅膀锁定/拉起遮盖光明的窗帘,我们看不到自由的天空

再说些什么“为你们好”/尽管语言是那么真诚动人/我们不想做楚楚依人的小鸟/我们的理想是展翅高飞的鸿鹄/告别了你们用玩具和糖果编织的梦的摇篮/我们会在只属于我们的世界找到真正的幸福

别再说什么“需要交流”/不同时代的人之间无形的代沟是永恒的/我并不祈求你们的理解/因为落伍的人永远体会不到领先者的快乐/当你们手举报纸/大肆批判前卫思想时/我们却在某个角落匿笑那些被时代车轮甩开的可怜人

别再说什么“这样不对”/乏味的解释难以填满我们贪婪的好奇心/我们需要尝试,尽管可能伤到自己/我们不在意/失败的结果反而会带来胜利的喜悦

大人们,你们不了解我们/我们同样不了解你们/但对于逐渐成熟的我们/不要再叫我们“小孩子”/请听一听,我们内心的呼唤

读完这首诗,我觉得体内血压呼呼上升。这世界真是变了!才十三岁,竟敢如此狂妄,把大人们平时苦口婆心的引导都蔑视为“被时代车轮甩开的可怜人”的“老掉牙”的“老生常谈”!用笔教育了一辈子别人,真没想到公然以如此轻蔑的姿态出来挑战的竟是自己的第三代!

我再往下看,诗的后面是老师用红笔写的几行评语。我心想:且看老师是怎样批评她的吧!

看了这首诗,相信任何一个“大人”都会被触动,也会莫名的感伤,但随后还是要用你不愿接受的方式来教导你。

别忘记,就像每一个果实都曾是美丽的鲜花,每个大人也都有过纯真的童年。

你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请永远不要放弃。

我突然醒悟过来,忙问盼盼近来的“逆转”是否和这位老师的评语有关?她点了点头。呵,这世界变得实在太快了,不但孩子在变,老师也在变,教育方式也在变,教育语言也在变,再用“老掉牙”的语言确实已经打动不了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了。就看老师那几句亲切、含蓄、委婉的朋友式的评语,我这个写惯了“应该指出”“必然强调”的老报人就写不出来。时代发展到今天,老脑筋、老方法是该变变了。

恕我这篇“笔记”写长了,原因是盼盼有个嘱咐:“如果你想引用我的诗,那就一个字也不要删不要改。”

2003年4月7日

## 垃圾桶上的文字游戏

大约是去年秋天罢，宿舍大院贴出公示：为了搞好废品回收，改善生活环境，决定对全院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希望得到全体住户的大力配合。

对于这样的好事，当然谁也不会有任何异议。几天之后，每幢楼旁都出现了三只不同颜色的高档垃圾桶，上面用白漆大字标明它们的用途：绿色的是“生活垃圾”，黄色的是“金属玻璃”，蓝色的是“塑料废纸”，标志鲜明，外观漂亮，居民们自然欢喜。每天上午，庞大的密闭式翻斗垃圾车隆隆开进院内，戴着口罩、手套的清洁人员把一只只垃圾桶的废物分类装车拉走，真有点现代文明生活的气象。

不到半个月，美丽的垃圾桶开始发生变化。不知道从哪位天才儿童开始，用刮刀对垃圾桶上的白漆标志实行“汉字简化”，先是“生活”被刮成了“牛舌”，接着“金属”被刮成了“人尸”，后来“废纸”被刮成了“发氏”，这种“简化”不断发展，最后的结果如下：

生活垃圾——牛舌立及

金属玻璃——人尸皮离

塑料废纸——土斗发氏

每天我往“牛舌立及”或“人尸皮离”里倾倒废物时，总不免笑出声来，好像听了侯宝林的一个什么精彩段子。中国的文字有多奇妙啊！中国业余文字简化专家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啊！说不定几千年后考古学家发掘出这几个垃圾桶时，得费多少脑筋去考证这“人尸皮离”是不是一种剥皮机器，就像过去有的考据家考证出“大禹是条虫”，陶渊明老先生的诗句“刑天舞干戚”应该是“形天無千歲”等等。

可是，这种文字游戏却招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当垃圾桶的标志还没有断臂缺腿时，住户们还真规规矩矩地实行分类倒垃圾；垃圾桶“易帜”以后就乱套了，“牛舌立及”扔进了“人尸皮离”，“人尸皮离”又扔进了“土斗发氏”，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连那庞然大物来运垃圾时，清洁工也只能“不分彼此”了。

现在，垃圾桶外观美丽依旧，清洁工每天还用消毒水细心擦拭，可是内容已经变了。为什么很多事情初衷本来是好的，干着干着就变了样，变了味儿？……

行文至此，一场“非典”突然袭来，干扰了继续写下去的雅兴，一搁就是一个来月。今天把这半截文字重捡起来，是因为读了5月5日《新民晚报》第8版上“全球关注非典”专栏上的一篇《透视日本防非典秘诀》，其中有一段标题为“垃圾细分类”的文字，内容如下：

“垃圾分类在日本尤其细致，住户必须按可燃和不可燃分别装入袋子，避免暴露在外，待固定的垃圾收集日前一天晚上扔出去……日本或许并非是远离‘非典’的净土，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实非秘诀，但正是这些细微之处，成为抑制病毒蔓延的法宝。”

确实，这个垃圾分类既谈不上秘诀，更算不上法宝，文章作者也并没有把它上多高的“纲”，仅仅说是“个人习惯好，环境卫生佳”。殊不知世界上许多最容易做到的事情，恰恰是最难做到的事情。——难就难在人们经常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当作一种文字游戏！

2003年5月13日

## 不爱长城非好汉

这行标题，是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门口一张海报上看到的。当时吃了一惊：怎么把毛主席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篡改”了？待到看了内容，才明白这是一位外国学者来清华作学术讲座的题目。

因为有事，那天没能去听这个讲座。据说讲的是关于如何了解和爱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问题。这里说的“长城”，是一种形象化的泛称，指的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构思还真够巧妙。不过，由一个外国人来讲这个主题，我不免既兴奋，又感汗颜。

对于当今国人来说，对自己的历史遗产确实存在一个“爱”与“不爱”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谁也比不了，谁能说不爱？但是在事实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不爱”的还真大有人在，包括有些颇有知识和地位的人在。要不，为什么近几年来会发生那么多破坏历史遗产的事件？

“不爱”，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毫不可惜的存心破坏。比如最近北京一块全国最大堪称国宝的九龙玉砚，竟被有些捣乱的游客砸坏，引起舆论的强烈愤慨，但已无力回天。其实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情多得很，某省在修高速公路时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国内罕见的大汉墓群，施工单位担心如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告后将会改变工程设计、影响工期，竟擅自雇用大批民工连夜将墓群砸烂埋上，毁尸灭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另一种是所谓“好心办蠢事”。比如为招揽游客，在旅游胜地大兴土木，建造宾馆、饭店，架设缆车电梯，添些俗不可耐的大佛彩塑、霓虹彩灯、激光音乐，等等。说起来是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实际上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把好端端的“纯情少女”变成了“三陪女郎”。

再一种是在城市建设中，凭着“长官意志”，不顾街道、建筑的原有风貌，不顾专

家学者的呼吁劝阻，肆意大拆大改，把一座座本来各具特色的城镇搞得面目全非，千城一面，其历史价值荡然无存。

尽管动机、表现不同，根子都是“不爱”或不懂得爱。其源盖出于无知。既是无知哪能有爱呢？有道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反过来说，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譬如介绍对象，如果你对对方的品貌、性情、才能一概茫然无知，怎么爱得起来？

在上述三种类型中，最可怕的是第三种。因为这种人无知又有权，有权又狂妄，不但听不进任何正确意见，反而认为别人都是观念陈旧，自己才是最有“现代化意识”的“好汉”。这样的人一意孤行起来，其危害远远超过那种砸碎九龙玉砚之辈。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文化遗产是它的记忆，它的灵魂，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经常讲爱国主义，而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如果不懂得自己祖先创造、传承下来的历史遗产是何等可爱，何等光辉灿烂，不懂得它对于培养民族精神有着何等重要的价值，爱国主义从何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应该如何去珍爱和呵护，岂止算不上是什么“好汉”！

“不爱长城非好汉”，这个口号提得好，有非常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因此我斗胆建议：应该把这个口号醒目地写在或刻在重要历史遗产（包括各种自然景观）上！

2003年6月2日

## 诗家情怀史家笔

——致《留学美国》作者钱宁

贺小钢给我寄来了您的力作《秦相李斯》和《留学美国》。这两本书，伴随我度过了这段“非典”肆虐的严峻日子，使我常常忘了窗外紧张、凝重的气氛。

《秦相李斯》是刚出版时就读过的，今天重读仍使我感到惊心动魄；《留学美国》则是初读。我真没有想到它会带给我那么多惊喜和感慨，以至有一次读至凌晨两点多钟，着枕时竟来不及熄灯。

说实话，我开始只是想把它当作故事随意翻翻的，因为这些年来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作品（包括像《北京人在纽约》之类的电视连续剧）实在太多了。吸引我把它从头到尾读完的，不只是那些新鲜有趣的故事，而是太厚重的历史感和太深沉的时代感。您不仅以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力，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展示了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向往、追求、奋斗、欢乐、挫折、困惑、艰辛……更重要的是您还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笔法，写下了从1872年首批迈出封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以至今天国门大开以后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一百多年中国的命运。您熟练地交错使用了通史、编年史、断代史和个人奋斗史的写法，谱成了一部特殊的中国命运交响曲。诗家情怀史家笔，在您的书里得到如此完美的融合，这完全出乎我意料。

在这封短简里，我没有能力对这部书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价，只想告诉您为什么我对它产生如此浓厚兴趣的另外两个原因：其一，读了您的简历，我才知道您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过人民日报记者。作为您的“先后同事”，我可能比别人更懂得您当年迈出那一步是何等不同寻常。其二，是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我的两位已故的姑母——范承俊和范承杰——竟是您密歇根大学的“先后同学”。她俩在二十世纪初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作为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赴美，而且都在密歇根学医，回国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和医学教学。她们有着和您相同的经历，却远远没有

您的幸运。当年她们除了忍受各种歧视和屈辱，埋头刻苦地学习知识和本领以外，没有您那样的机会和条件，去更深刻地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比较制度。只是期望“他年期满学成，体用兼备，翊赞国家，宏图丕烈”（晚清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官员李圭语）。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俩终身未嫁，像著名教育家、医学家吴贻芳、林巧稚那样，把毕生心血全部投入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们和同时代数以千百计的早期留学生一样遭到了厄运，一夜之间成了“洋奴”被“批倒批臭”。她们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她们能够活到今天，有机会读到您在《留学美国》结尾说的那一番话，大概就可以得到最后的安慰了：

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这个梦虽然几经破碎，却从未因领袖的变换、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衰和社会的巨变而破灭。为了这个梦，一个民族不惜变法、造反、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包括这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想法是很中国式的，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肩负着历史的重担，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这是一个悲壮的结语。您为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留学生说出了想说而没有机会说、或说不出的心里话。如果谁不懂得这种“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就难以理解我那位当了一辈子医学教授又饱受磨难的承杰姑母，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被批准入党之时，竟会奇迹般地从病床霍然坐起，在一幅三尺白布上，用红笔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大字，然后把它轻轻覆盖在自己身上……

如果您的《留学美国》将来有可能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请把这个浓缩着几代中国留学生血泪的细节增添进去吧！这样也许可以使更多的留学生懂得该如何珍惜现在，把握未来。

2003年6月23日

## 陪着孙辈一起长大

一个月前，我给《夜光杯》写了一篇《盼盼的“逆反诗”》，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常见的“逆反心理”，发了一点感慨：“这世界变得实在太快了，不但孩子在变，老师也在变，教育方式也在变，教育语言也在变，再用‘老掉牙’的语言确实已经打动不了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了。”最后的结论是：“时代发展到今天，老脑筋、老方法是该变变了。”

文章于6月4日见报后，居然引起了一些共鸣，有的文摘报还作了转载。我暗自欣喜：看来我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老头吧！

可是，我把这篇文章的意思讲给清华“弟子”们听了之后，他们的反应竟和预想的很不一样。其中一位很直率地对我说：

“范老师，您的呼吁应该说实际上也是过时的。现在和年青一代沟通，仅有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您还必须陪着他们一起长大，重新经历、学习他们所喜爱的一切，和他们混在一起，打成一团，这样他们才认为你‘够懂’他们的世界，有‘资格’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候，您才可能以一个长者的智慧和远见去向他们做‘老生常谈’，去‘遥想当年’。也只有在这时候，您说‘这样不对’‘是为你们好’，他们才能接受。”

听了这一番话，想想也真有道理。可不是嘛，平时我们经常讲“代沟”，而且感叹这“沟”的时间间距越来越短，就像计算机、手机的更新换代一样快。这种“代沟”，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社会、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与孩子们之间“见识”上的差距。想想我们这老一代，十二三岁时，电话、电报还是稀有之物；我儿子那一代，十二三岁时能组装个矿石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就满不错了；而现在这第三代，十二三岁已经是玩网络、E-mail的老手了。见识如此悬殊，观念能无差距？常言道：“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获得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资格，确实得“陪着他们一

起长大”才行。

认识到此似乎已经完成,可是当我向同辈们谈起这番新的感悟时,又听到另一番议论:

“他们说的我都赞同,但是你别忘了,作为生活阅历比孩子们丰富许多的长辈,你的责任不仅要在现代知识方面陪他们一起长大,还应该指导他们懂得鉴别,告诉他们哪些喜爱的是健康有益的,哪些是不健康和有害的;哪些‘逆反’是有道理的,哪些‘逆反’是没道理的。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地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孩子,不加区别地一切都‘顺’着他们,这恐怕也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看来,把这两种意见合在一起,可能比较接近真理了。

这篇短文写到这里,本来已经准备煞尾,无意中发现盼盼的一份暑期语文作业,其中有道题目是:

“请你为动物园写一块宣传牌,提醒游客不要给动物喂食或其他东西。要求语言生动、形象,游客易于接受。”

我先不看盼盼的答案,试着考考我自己这个教授级的“老学生”,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一个像样的,最后只好看看盼盼的答案是什么,想不到她是这样写的:

“谢谢您,我不饿!”

我不禁叹曰:要取得“陪着孙辈一起长大”的资格也不容易啊!

2003年7月8日

## “岂能如尽人意”？

### ——请电视导演学点书画常识

平时常看电视连续剧，由于爱好书画，便对场景中的书画特别注意，发现谬误甚多。现将随手记录的“案例”略举一二，以期引起注意。

例一：最近播映的一部收视率甚高的反贪连续剧中，一位领导干部客厅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而且反复出现：“岂能如尽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按：这是一副人们熟悉的老对联，但上联应是：“岂能尽如人意”，而不是“岂能如尽人意”。现在一字之差，不仅意思不通，而且对仗也错位了。

例二：一部反映陈毅同志军旅生涯的连续剧中，新四军军部墙上竟挂着陈毅同志写的诗作：“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按：陈毅同志此诗作于1960年12月，属于《冬夜杂咏》中的一首，比新四军转战江淮时晚了将近二十年，怎么可能出现在新四军军部？看了未免令人联想到“关公斗秦琼”的相声。

例三：在一出古装戏里，墙上挂着八个大字的条幅：“所贵者胆，所要者魂。”

按：“所贵者胆，所要者魂”，是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名言，不知哪位古人有此先见之明。

例四：在一位教授书房里，挂着一个条幅写的是半首杜甫的《望岳》，还把“阴阳割昏晓”写成“阴阳割晓昏”。

按：杜甫的《望岳》是一首五律，应为八句，可是这位有学问的教授不知为何只写了前四句，特别是把此诗最关键的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舍弃了，实在难以理解。

例五：在唐代的皇宫里，大屏风上画的是写意墨竹。

按：写意墨竹到宋代才出现，唐代画竹都是双钩填色。

例六：一部描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大资本家生活的连续剧，客厅的整面墙壁是《清明上河图》的巨幅复制品。

按：这样巨幅的放大复制是现代高科技产物，我国近十多年才从日本引进，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而且当时《清明上河图》已被末代皇帝溥仪掠入伪满皇宫，世人不得一见，遑论复制。稍有书画常识的人看了，便觉得太违反历史真实。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影视作品中，适当地运用书画作品，有利于烘托环境氛围，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修养。因此，它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环境，该用什么样风格、什么样层次的书画作品，都大有学问，大有讲究，最低标准也不能出笑话。因此，作为导演或美工，都应该懂一点中国书画常识，有一点书画艺术修养。否则，出现类似上述的问题，就不只是“白璧微瑕”了。

记得几年前有一部回忆周培源先生的电视纪录片，在拍摄他的书房环境时，对墙上悬挂的一幅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画的山水给了一个特写镜头，那淡雅飘逸的笔墨不仅含蓄地展示了周先生作为大科学家的淡泊胸襟，也在无言中告诉观众周先生还是一位具有很高艺术品位的书画收藏家。事隔多年，我还常常称赞那位导演或录制者的眼力。

2003年7月16日



范敬宜临陆廉夫山水册《秋声赋》(1948年)



范敬宜临陆廉夫山水册《落花吟》(1948年)

## 季老病中写新书

很久没有见到季羨林先生，没有读到他的文章，心里十分惦念。去年，先生入院动过一次大手术，刚好一点，又因指甲发炎，造成血液感染，加重了病情，更是叫人担心。去看望他吧，那个医院制度太严，谢绝所有人的探视。无奈只好给他写了一封信，却久久没有回音，这更增加了我的忧虑。

今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先生的研究生崔向全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季老的病情大有好转，今天正是他的九十三岁生日，北大、清华的领导要到医院为他祝寿，问我是否能够参加。我喜出望外，不巧的是，前几天我骑车上街，不慎摔了一大跤，行动不便，只好委托小崔代我向先生表示祝贺，并希望能约一个见面的时间。

小崔带来了一封先生两个月前给我写的、但迟迟未能寄出的信。信不长，但对我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课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他写道：“你现在讲授《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课》，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你驾轻就熟，当无困难，不过你提到‘范文’……到了今天已经陈旧。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文章，而是能充分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对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同），能够理解人的。至于文字，我认为，一要准确，不夸大，不缩小；二要生动，有灵气，如果你的学生中能有人写文章能稍稍接近你的文章的水平，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现在是出院尚无定期，季荷开放之日，当能回到北大。真诚欢迎你来看一看季荷。”最后的祝福语是：“既寿且康。”

读了先生的信，我内心激动不已。他写此信的时间是6月15日，正是他病情很不稳定之时，可是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一字不提，关心的只是改进文风，改进教学方法，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并且切中时弊地表达他对新闻评论的观点，字里行间充溢着长者之情，学者之风。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写了四十行长歌：《寿季老》，准备见面时作为补送的

“寿礼”。

十天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在一间整洁朴素的病房里，我见到了睽违两年多的季老。他的气色、精神比想象的好得多，只是比以前略见清癯。谁也难以相信，一位受了一年多病魔折磨的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能够保持这样精神状态。

没有任何寒暄，季老第一句话便是：“我一直在想，你的评论课应该怎样讲。我建议你，不要用任何现成的教材，也不要花许多精力去找范文、备教案，那是会束缚学生思想的。你应该主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向同学们讲我这篇当时是怎么构思的，那篇当时是怎么立意、论证、运用材料的，让同学们去心领神会，千万别把八股腔传染给他们，那样会害他们的……”

我怕先生说得太累，便把话题岔开：“季老，您过去是天天写文章的，现在住在医院里一定受到限制了，是不是很不习惯？”

季老笑了，开心地说：“不，还照样写。很快就会出版的，书名叫《病床杂文》，将近十万字。”

一直陪护季老的李老师在一旁补充道：“写作是先生的命根子，他从不间断。连一天需要输液十七瓶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想，还在那里写。比如，哪种药液每分钟滴多少滴，他都观察、记录、联想，然后把这些感悟写进书里。”

我忽然发现，季老在谈话时腰板一直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两膝上，像小学生听课一样。我再三请他放松，在躺椅上靠一下，他摇头说：“不用，习惯了，我一辈子看书、写字、吃饭、会客都是这样。”

我说：“您祝我‘既寿且康’，其实这四个字送给您才是最恰当不过的。所以我借您这四个字为您写了一首诗，现在念给您听听，请您指教。”——

仁者寿，智者康，既寿且康古难全。唯我季翁能兼得，华夏文坛谁比肩？耳聪目明扛鼎笔，神清气爽人中仙。桃李三千何足数，四海喁喁仰高贤。论文自古重风骨，道德文章孰为先？历代文豪如星汉，欲求铁骨属大难。当年沧海掀浊浪，几人谔谔敢诤言？先生一身担道义，雨骤风狂腰不弯。史家正气诗家性，一卷宏文留人间。云开日出仰天笑，等身著作成指南。门前冠盖若云集，名高天下犹谦谦。一袭青衫三十载，爱书爱猫爱季

莲。爱书为养浩然气，爱猫仁心出天然。爱莲托物明心迹，出淤泥不染守清廉。荷塘白猫相为伴，心如明月照清泉。癸未七月介眉寿，谈笑风生百花妍。嗟余伤足难举步，徒羨欢声绕尊前。权将芜词四十句，恭献师表意绵绵。班门弄斧翁休笑，失粘错韵翁莫嫌。

2003年9月8日



## 五十年后才相会

从大学时代开始，魏巍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缘悭一面。直到今年9月16日才第一次握手，这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他绝对不会想到，是他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到魏巍的名字，是上个世纪的1951年4月11日。那天下午，我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旁听新闻写作课。讲课的教授是被称为《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的刘克林先生。那年他才28岁，已担任《大公报》的国际部主任。他头脑敏锐，才气过人，经常为上海的大学生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报告。他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力和卓越的口才，一时不知倾倒了多少青年学子。那天，他走进课堂，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人民日报》，严肃地对同学们说：“今天，我要先给你们读一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本来就热情似火的刘克林先生，朗读这篇文章时更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特别是读到最精彩的结尾时，全体同学都为之肃然动容。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也是从这一天起，我就萌生了“当魏巍”的念头。

1951年是实行大学毕业生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第一年，我正逢应届毕业生，便面临何处去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放弃了留在上海当助教的机会，作出了到“白山黑水去当魏巍”的决定，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不归之路”。

在“白山黑水”的三十多年，尝遍了人间酸甜苦辣，但是想起《谁是最可爱的人》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那段抒写，依旧热血沸腾；哪天能够见上魏巍一面，依旧是我的梦中追求。——当然，在那个年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云开日出，我在54岁那年调到了北京的新闻单位，我首先想到的是有机会能见到魏巍了。可是，由于我本身性格的拘谨，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仍然是“缘悭一面”。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第一次见面纯属意外。9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总工会联合举办纪念已故著名女作家草明九十诞辰的座谈会，我因在东北时曾经采访过草明同志，也被邀请参加。走进会场，发现前排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鹤发童颜的老人，心里一动，定睛一看座前的名签，赫然是：巍巍！

我顾不上和旁人寒暄，直奔巍巍。许多人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又耳背，很费力地应对着。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不顾礼貌地挤到他身旁，俯在他耳边大声说：“巍巍同志，我叫范敬宜，是您几十年的崇拜者，您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吸引我走上了新闻工作道路。谢谢您！”

巍巍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经过旁边一位老作家介绍，他才露出笑容，合掌向我致意。

轮到我发言时，我着重讲了作家的一句话对读者产生的终身影响。由草明讲到巍巍，我仿佛又回到五十二年前的课堂，像刘克林老师那样背诵完《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那段记了大半辈子的话。我提高嗓门喊道：“巍巍同志，您的文章把我‘坑’了（全场大笑）！不过我一点不后悔，因为它使我懂得了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

巍巍侧耳听着我的发言，我讲一句，他旁边的那位老作家向他俯耳“传译”一句。当他听到我说他“坑”了我时，不禁也笑出了声，大声问我：“你在东北待了多少年？”我答：“整整三十四年。”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五十二年的“巍巍梦”就这样圆了。没有年轻时憧憬的热烈拥抱，尽情诉说，激动的泪花。一切都那么平静。毕竟都是饱经沧桑的人了——他八十三，我七十二，燃烧的激情已经变为悠长的恒温。

2003年10月2日

## 温馨的小黄花

今年9月10日,是我生平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过教师节。

那天早晨,我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要过自己的节日,照例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课。走到办公室门口,发现门把上插着一枝小黄花,不禁一怔。踏进房间,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两小盒酸奶,底下压着一张小卡片:“范老师,祝您节日快乐,今晚我们陪你赏月,喝酸奶!”

这时我才蓦然反应过来:今天是教师节!怪不得刚才路过附近的花店,门口围着那么多小孩子。

一枝黄花,两盒酸奶,算不上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可是在我心头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并使我立刻想起了一桩难忘的往事。

1984年5月,我曾有机会随当时全国记协常务副主席王揖访问匈牙利。王揖同志曾是东北日报社长,1951年我刚开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时的老领导,承他事隔三十多年还想到了我,当然兴奋得难以安眠。到达布达佩斯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一起到街头散步。当时正是丁香盛开的季节,家家门前、院内的丁香树,繁密的小紫花缀满枝头,一股清香,沁人心脾。忽然,我们发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学生,个个手捧一束丁香花,觉得很新鲜,便问翻译。翻译告诉我们,匈牙利人特别尊师重教,每到春天,都要把家里最早开花的丁香献给教师,表示对“园丁”的尊敬和感谢。

凑巧得很,我们当天上午的日程正好是参观一座小学。果然,看到每个教室的窗台上、讲台上都摆满了丁香花。走进教室,就感到一种温馨的气氛扑面而来,在这种温馨的氛围中,教师讲课的声音是甜甜的,学生脸上的笑容也是甜甜的。穿着盛装的女教师,每从孩子们手里接过花束,都要像慈母那样亲吻一下他们的双颊,说一句:“谢谢你,我的宝贝!”目睹此情此景,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破“师道尊严”的人,不仅深受感动,而且大吃一惊,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心里默想:我

们国家什么时候也能出现这种师生温馨融洽的气氛啊！

结束访问回国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温馨的丁香花》，交给王揖同志。他看了标题，沉吟良久，喃喃自语：“温馨？温馨？温馨算啥子？用这样的词儿合适吗？”王揖是一位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同志，竟然还怕这“温馨”两字，说明刚刚走出“文革”的噩梦，谁也难以心有余悸。我同他“争”了好一会儿，他勉强同意按原题发给《人民日报》，请他们裁定。那几天里，我心情很紧张，既怕他们改，又怕他们不改，出了问题来个“文责自负”。没想到文章很快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国际版发表了，标题没有改动——毕竟“大气候”开始改变了！

今天向年青一代讲这段插曲，似乎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因为“温馨”已经成为最时尚、也最吸引人的词儿；而在教师节给老师送一束花，似乎也已成为正常不过的社会风尚。谁能想到，这一点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得来是何等不易！没有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一场社会大变革，今天这种“温馨”的举动不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才怪呢！

当然，在尊师重教问题上，当前还存在不少值得忧虑和亟待改变的现象，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绝不应该满足于一些表象上的变化。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前面冷静想一想，我们的社会确确实实在飞快地进步——我面前的小黄花也这么告诉我。于是，我借用十九年前用过的标题句式，再写这篇短文。

2003年10月22日

## 雪窗静思

11月6日晚，一场罕见的大雪悄悄降临京城。说它“悄悄”，是因为它来得突然，来得无声无息。后来才知道，有人听到过雷声。当时我正在灯下写稿，直至深夜，竟毫无察觉。早晨醒来，拉开窗帘，才发现外面已是一片银白世界，但雪已停了。

我站在窗前，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雪景：楼前的那块草坪，昨天还是绿茵茵的，现在好似盖了一床厚厚的雪被，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草尖，组成了一幅奇特的现代派图画。园中三棵苍松，树冠堆满又厚又重的雪团，越发显得伟岸挺拔。小径还没有人迹，只有几只喜鹊，迈着颇有绅士气度的步子，在雪中觅食。

此情此景，使我突然想起1948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曲选”大考时做的一套散曲：

宵来柳絮扬，皓色照书幌。庭院堆盐，冻雀相偎傍。寒鸦点点翔，费猜详，亭阁新添缟素妆，更有那松枝披上天鹅氅，梅萼绽来冰麝香。漫评量，丰年有兆庆江乡。只可惜鸳瓦琳琅，曲径琼璜，抵不得绵和纴……

我不禁哑然失笑。那时我住在上海，哪见过这样的雪景！一套曲文，不过是堆砌辞藻加合理想象而已。眼前的景色，倒真有点符合曲中的描写呢！

正在冥想，电话铃响。是谁这么早打来电话？拿起耳机，传来一阵急促的语音：“昨晚一场大雪成灾了！马路两边的树，成片被冰雪压断，横倒竖歪，遍地枝杈，有的树从梢到根，裂成两半……”

我不相信：“我在东北待过三十多年，大雪见得多了，从没这种情况，你是少见多怪吧！”

对方断然否定：“不信，你上街看看！”

天寒地滑，我没有敢“上街看看”，但是信息不断传来，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联播》也作了现场报道，方信所传非虚，同时也弄清了原因：一是往年下雪，一般都在树叶落尽之后；这次是气温骤降，而且是先雨后雪，大多数树木还“木叶未脱”，就承受不了雨雪的重压了。二是受灾的绝大部分是木质比较松脆的树木，如杨树、榆树，至于青松、翠柏则安然无恙。

听了这些解释，不免浮想联翩。树犹如此，人何独不然？中国人自古习惯把花木人格化，喜欢歌颂抗风耐寒的松柏、翠竹、霜菊，以此来砥砺气节、操守。但是，在正常气候的变化下，它们与杂树、凡卉的差别并不太大，只有在风云突变、“林花纷谢一时稀”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看到两者的霄壤之别。这次可真是大开眼界了。

记得三十多年前，初读陈毅元帅的名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心中不免有点疑惑：雪中“挺且直”的树木岂止是青松？其他树木不也都好好的吗？现在才体会，这位刚毅不屈的元帅观察世界的深刻，我当时毕竟还是涉世未深。

于是，我又翻开不久前逝世的穆青同志的讣告。穆青是我国新闻界的泰斗，他的名篇佳作早已人所共知，无庸介绍。最值得注意的倒是讣告中列举的两件事：一是他在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上海分社担任领导时，正值反右运动，他“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一批记者”（据我所知：一个“右派”未划）；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始终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与‘四人帮’等进行不屈的斗争。1975年，他与朱穆之、李琴同志一道，联名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问题，再次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

了解当时时代背景的人，都会懂得，做到这样的“挺且直”，是何等不易！

当我快写完这篇短文时，已经日出雪融，依窗遥望，又是满目青翠。但是这场大雪给我带来的思考，可能未有穷期……

2003年11月14日

## 回应“许嘉璐的话”

11月28日《夜光杯》刊登了一篇贾海红写的《许嘉璐的话》，因为话题涉及新闻记者的修养，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

许嘉璐副委员长的话题，是由《故训汇纂》出版座谈会上新闻记者的表现引起的。据说，那天面对着这部耗时十八年竣工的大型工具书，这部提供了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书面典籍多层次信息的皇皇巨著，以及众多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专家、学者，到会的许多新闻记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记者，表现了极度的冷漠，签到后拿到资料、领到礼品就纷纷离场而去。此时，一向很尊重新闻记者的许嘉璐忍不住说话了，他说：“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我个人认为他们失去了一次从‘小记者’成长为‘大记者’的机会，因为在这里就座的都是他们的老师、甚至是他们的‘太老师’……”

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看了许嘉璐的一席话，我既惋惜，又感叹。

惋惜的是，我无缘参加这个隆重的出版座谈会。出版《故训汇纂》的消息，我是从前些日子的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曾想，这样重要的大型中国传统文化工具书真该先睹为快，可惜无人请我。而有机会遇此盛事的人，却没当回事儿；而且事后也没有读到（也许我孤陋寡闻）一篇有关的重头报道。

感叹的是，这类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不仅发生在这类出版座谈会，连有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会议，记者的这类表现也屡见不鲜。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一次江苏宜兴市在北京举办的关于该市环境保护的新闻发布会，费孝通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可是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后面唧唧喳喳地开“小会”，详细作记录的只有我一个老朽。次日各报刊登的都是一条干巴巴的简讯，倒是我写了一篇实录性新闻：《再给后代五千年》。这使我很悲哀。

发生这种现象，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有些会议内容确实比较空泛，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有些会议给记者提供了“通稿”，养懒了记者的手脚。然而不少会

议还是很有内容的,有的总体来说虽然比较平淡,但中间也会出现“闪光点”,只要记者耐心听下去,很可能抓住一条“活鱼”。因此我说过,会议是信息最集中、议论最集中的场合,不愿意“听会”、不善于从“听会”中沙里淘金的记者当不成好记者。

在我认识的新闻记者中,“听会”最认真的有两位: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爱泼斯坦,他不论参加什么样的会议,都在认真记录,即使到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如此,我曾问他:您记了这么多,都有用吗?他淡然一笑说“不一定都有用,但也说不定有用”,反正是职业习惯了。据说他保存着从1936年来到中国以来的全部采访记录,这已不仅属于他个人的宝贵财富了。另一位是现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他从当普通记者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还是最普通的座谈会、新闻发布会,都是手不停笔,从不停歇。大概在十年前,我曾问他累计用掉了多少笔记本,他说:“大概要有两千多本吧!堆满了一间小屋子。”那么现在至少已超过三千了。最近我读他新出版的《与年轻记者谈成才》,进一步明白他本身的成才与他平时勤于积累有多么大的关系。

其实,在年轻记者中也有善于从会议上抓取“闪光点”的。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过一条独家新闻:《温总理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据说,温总理这“三件小事”是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离开讲稿即兴讲的,不料被人民日报很有新闻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单独成篇,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看来,在会议新闻这个领域里,记者的用武天地同样是很大的,问题是要有“三心”——留心、耐心、责任心。

2003年12月9日

## 流光何曾把人抛？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每到年末岁首，细数一下过去的一年里，计划中要做的事情究竟落实了多少，落空了多少，总不免轻轻惋叹，想起宋人蒋捷这两句词。

词确实很美，但后人喜欢它，大概还是因为它把一切懒惰的责任推给了“流光”，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其实，流光何曾把人抛？流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分一秒都没有偏心。倒是世人易把流光抛。《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说得比较公正：“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生出以上这番感慨，是在今年岁首看了一段关于成思危先生科学利用时间刻苦治学情况的报道。真想不到，在人们埋怨当前社会浮躁纷华之风的时候，竟然还有这样“只争朝夕”的人。

大家都知道，成思危是身居高位的副委员长；但是对于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化工专家、软科学家，则知之不多。近几年来，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自著和合著著作数十部，还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 10 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指导 20 名博士。头衔这么多，他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熟练地掌握六种外语——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尤其是西班牙语，是他 67 岁才开始学的。缘由是那年他接待一位西班牙学者，因为语言不通，需要依靠翻译，当时他就向客人许愿：“明年你再来中国，我一定要用西班牙语和你交流！”事后，他就发愤学习西班牙语，果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流光”对成思危没有丝毫优待。他的时间完全是靠一点一滴“挤”出来的。

请看他是如何安排业余时间的：每天早晨6点起床，先打太极拳，然后学习外语；下午下班回家后，浏览各种报刊；7点晚餐，同时看《新闻联播》，嘴眼并用；然后读书、写作2至3小时；10点半以后上网；12时入睡。周六、日都是他的工作日，除有时打打桥牌外，所有时间都用于写作。每年三次长假，都在家写作，每次长假都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和成思危副委员长有过一些接触，所以深信报道完全真实。有一次，我随他到湖北省考察义务教育情况，对他严谨、科学的学者作风感受特深。每天的日程，他都安排得环环紧扣，不让有宴请或游览的时间。7点早餐，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餐厅，第一个吃完，准备出发。开始，有些年轻同志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来到餐厅时发现首长已经在大门口等待上车，只好把早餐免掉，后来谁也不敢再行动迟缓了。晚上，他匆匆用完晚餐，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按计划读书、写文章和准备第二天的发言，免除一切应酬。地方领导多次动员他游览道家圣地武当山，他都婉言谢绝。直到最后一天，在视察归途经过武当山时，他才勉强下车，匆匆浏览了不到一个小时。当时我心里觉得他过于执拗，读了他的事迹，才明白要想在事业、学问上真正有所成就，非得对“流光”有点这样的执拗劲儿不可。

古往今来，有多少过客都是嗟叹“韶光易逝，人生易老”，埋怨造物者的不公。到了现代，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说法，什么“生活节奏太快”呀，“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呀，并以此作为没有时间读书、做事的借口。其实，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无论对谁都是分秒不差地赐予的。它虽然留不住，却可以抓得住；它虽然来无影去无踪，却可以物化为一件件、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空叹“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忍看”，“空惆怅韶华，一时虚度”，实在是最没出息的人。

行文至此，不禁成打油一首：

天公从来最公道，  
流光何曾把人抛？  
你若抛它它抛你，  
理所当然莫混淆。



2004年1月12日

## 求 阙

大年初三，一位青年朋友来向我拜年。他曾是我的硕士研究生，现在一家新闻媒体当记者。近两年来，他工作得很出色，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和褒奖。学生干出了成绩，当导师的内心自然不胜欣喜。但是，我没有过多地流露，只是默默地听着他的叙述。

当他起身告辞时，我请他稍待片刻，走进书房给他写了一条只有两个字的横幅：“求阙。”

他接过字幅，看了半晌，似有不解之色。于是我向他解释：“在古文中，‘阙’与‘缺’同义。现在你得到的已经很多，今后应该多在‘缺’上下工夫了。”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我明白您的心意了。我一定把它裱起来，挂在办公室里，时时记住您的格言。”

我说：“这不是我的格言，而是我们老祖宗的格言。中国古代的哲人，是最懂盈亏、满阙的辩证关系的。”

我怎么会想起送给他这样两个字的呢？其中还有个故事。

去年，一位事业有成的年轻企业家来找我，要求为他写一个横幅，内容就是“求阙”两字。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像这样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的年轻人，要我写的往往是“腾飞”“高翔”“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之类的吉言、豪语，为什么他偏偏选择了“求阙”呢？难道他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吗？

想不到我的疑问引出了他一番高论。他说：“我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恰恰相反，现在正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越是顺利，我越担忧。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的。苏东坡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我现在的顺境，很可能就潜伏着逆境甚至险境；现在的圆满，很可能就伴随着亏损。如果缺乏这种预见和思想准备，

万一将来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浪，精神就先垮了。”

“其次，世界上任何事情，‘圆’总是相对的，而‘缺’却是绝对的。十全十美、完美无缺是不存在的。如果自以为已经做到了完美无缺，就会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现在流行一句广告词：‘追求零缺陷’，那完全是形而上学或者是骗人。怎么可能有‘零缺陷’呢？既然已经‘零缺陷’，还需要什么改革、创新、发展、进步？只有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缺’，才有不断进取的愿望和动力。”

“再说，作为一个人的人生追求，我觉得应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现在也流行一种‘享受人生’的说法，对年轻人很有诱惑力。可是人生的享受是无止境的，而能不能够获得所谓理想中的享受，则受各种条件制约。譬如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有了小别墅，又想要‘豪门庄园’……求之不得，有的人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分析一下有些腐败分子走过的道路，往往都是从过于追求‘完美的人生享受’开始。这实在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求阙。不过，真正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需要时时有人给提个醒。求您写这两个字，就是准备挂在墙上，当个座右铭……”

真想不到，这样一位年轻人对人生竟有如此感悟。于是我欣然为他命笔，给他，给自己，也给更多寄予厚望的青年朋友。

2004年2月7日

## 李双江谈“拼文化”

这已经是将近四年前的事情：2000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内，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七天《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过这次大奖赛，一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歌手，令人欣喜；另一方面也暴露一些青年歌手的综合素质不高，闹了许多笑话，令人忧虑。

有感于这种状况，我写了一篇笔记：《青年歌手，请你理解》，希望青年歌手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修养。

这篇短文在2000年5月15日《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发表以后，反响不一。不少人赞同，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唱歌就是唱歌，跟文化知识有什么关系？别搞文化神秘主义！”后来，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扩展到其他领域，连中国书画要讲究“笔墨”，讲究文化底蕴，也被视为远离时代的迂腐之见。我也闹糊涂了，怀疑是不是真的成了老朽。

事有凑巧，不久前看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节目，正好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训练，许多音乐系的学员对主持人提的各种与音乐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对答如流，表现出相当高的文化修养。这使我十分惊讶，后来听了音乐系主任、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介绍，才知道他们在两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受到触动，这几年下决心加大综合素质训练的分量，把全面提高学员文学艺术修养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现在，全体学员都做到能够熟背20余万字的综合素质教材。这真不简单呀！

使我最受感动的是，李双江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的学生如果没有全面的文化素养，充其量只能当一个歌手，成不了大家。我们搞音乐的，拼嗓子、拼技巧，拼来拼去，最后要拼的是文化。你长得再美，嗓子再亮，可是脑袋空空的，一头雾水，你就得不到观众的尊重。你长相差一点，技巧差一点，观众都能原谅，但是你如果

没有起码的文化修养，观众就不能原谅，那就是最大的丢人——而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听了李双江的快人快语，我很想了解他这番见解的由来。过完春节，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教学非常紧张，因为青年歌手大奖赛又快开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参赛，主要是搞好“基础建设”。当他听完我提的问题，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不论干哪一行的，在这世界上总得做人吧，做人就不能丢人，总不能老停止在愚昧状态吧！我说拼这拼那，归根到底是拼文化；实际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拼经济，拼科技，拼到最后还是要拼文化。中国五千年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拼文化的历史。中国在历史上遭了那么多外来侵略，遭受那么多苦难，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还不是靠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吗？……”

“我的文化修养也不高，说的也许不全面，你别见笑。”李双江爽朗地笑道，“等稍闲一点，咱们再好好聊聊，我请你吃饭！”

2004年2月17日



## 邓颖超的“电话更正”

在纪念邓颖超诞辰 100 周年期间，读了不少追忆她高风亮节的文章，感人至深。其中特别使我感慨的，是《人民日报》的《社内生活》刊登的一篇《事实就是事实——忆邓颖超的一次谈话》。

这篇文章的作者温宪，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的工作人员。1976 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审阅。12 月 30 日晚 8 时 40 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来电话，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温宪作了详细记录，从内容看，邓颖超至少讲了半个小时。

邓颖超在谈对稿子的具体意见之前，首先谈了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她说：“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邓颖超对三篇文章指出的不实之处，概括起来有六：一、讲她和周恩来一起去过三次大寨，实际上她只去过最后一次，前两次她都未去；二、讲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蒋介石“抱头大哭”，根本没有这回事；三、讲 1945 年重庆谈判时，李少石被国民党特务谋杀，事实早已查明，这属于意外事故，不是谋杀；四、讲 1938 年长沙大火，是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事实是国民党对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政策，“谋害”之说是夸大；五、讲在红岩村时，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浇水、种菜、浇粪，这是渲染夸大，实际上只是偶一为之，不是“经常”；六、讲周恩来在重庆和毛主席“寸步不离”，也起码是不科学，因为当时两人各有各的活

动,不可能“寸步不离”。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以上六点除二、三、四点属于比较重要的事实出入,其余三点都是细枝末节,无伤大体。可是邓颖超如此严肃对待,不但要求人民日报加以修正,还要求把“新华社的稿子也看一下”,一致起来,“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近些年来,有关伟人、名人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越出越多。从补充和丰富正史、“官史”之不足的角度看,这是件好事。但是看多之后,不免产生许多困惑。且不说对有些重大史实“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的矛盾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单说有些细节的描写,就好生叫人怀疑:有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已经隔了几代,掌握的又都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居然能把几十年前的旧事、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连主人公喝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菜、独自在房间里如何“仰天长叹”“拍案而起”,“冥想”这个,“遐思”那个都写得具体而微,好似作者当年就在现场,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至于完全子虚乌有的虚构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党史权威逢先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苦笑道:“那就只能把历史都当作《三国演义》读了。”著名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曾气愤地告诉我:有人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仅仅几千字中,虚构的情节竟达25处之多,甚至无中生有地说宋庆龄是爱泼斯坦的媒人,还亲自为他主持婚礼。造谣竟敢造到孙中山先生夫人头上,夫复何言!

今天,党中央号召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对于历史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中的“胡说”现象,是否也应该好好整治一番呢!否则,把重要历史事实都随意变成了《三国演义》,叫后人如何相信我们,如何“以史为鉴”?

2004年2月26日



## 假的多了真变假

8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我在乘车赴会途中,忽然看到在滚滚车流中,出现一辆红色私家车,车身披着一幅大红标语,上面写着8个大字:

“小平同志,别来无恙!”

一瞬之间,我被震撼了。小平同志早已离开我们,怎么能用“别来无恙”的问候语呢?再转念一想,猛然醒悟:小平同志虽然已经去世七年多了,但他依旧活在我们心中。“别来无恙”,和“小平您好”一样,包含着人民对他无比深情的怀念!

开完大会,“别来无恙”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当天晚上,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小平同志,别来无恙!》。

文章发表后,颇得读者的好评,但也招来一些读者对文章真实性的怀疑:“这是真事吗?范敬宜怎么老有这种巧遇呢?”连一位辽宁的同行一见面也问:“这样的新闻你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没有见到其他记者报道?”

这样的怀疑,我已经碰到不止一次了。记得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有一天开常委会,我记错了时间,误了班车,临时截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赴会。司机从我的胸卡上知道我是人大代表,便问我:“我有几个建议,您能不能带到会上反映反映?”我想报纸正需要来自会外群众的声音,便欣然同意。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对市政建设方面的三条意见,都比较中肯。我边听边记,当天晚上就赶写了一篇“两会漫笔”:《“打的”赴会》,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在会上、会外都引起了一点反响。万没想到,问题来了:尽管我在稿子里把出租汽车司机的姓名、公司的名称、车号交代得清清楚楚,还是有读者表示怀疑,有的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查询核实,有的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我“导演”“策划”的,把我弄得哭笑不得。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实在感到委屈。自问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别的不敢说,对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向来是严谨的。这应当归功于开始做新闻工作时,东北日报、辽宁日报领导对记者报道真实性要求得特别严格。记得有一次由于时间紧迫,经主管领导同意,未到现场采访,只是作了间接采访,结果在细节上出了一个差错,不仅受到严肃批评,而且立即撤销“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这个教训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不敢稍有大意。再说,只要深入采访,生活中真实感人的情节从来都是满载而归,写都写不完,何须弄虚作假?

平心想想,现在读者对新闻报道真实性每每产生怀疑,并非没有来由。——虚假报道实在太多了!不但添枝加叶、合理想象、张冠李戴、任意炒作已经司空见惯,可以畅通无阻,连无中生有、全部失实都受不到惩罚,难怪看到完全真实的报道,反而引起怀疑了。这叫做:

假的多了真变假,

真的少了假成真。

这难道不是新闻工作真正的悲哀吗!

2004年9月13日



## 话说“认不得了”

“哎呀，变化太大了，变得认不得了！”

不论是从外地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人，还是从北京到外地出差、旅游的人，几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

众口一词的“认不得了”，生动地概括了祖国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是，同一个“认不得了”，在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涵义却不尽相同。有的人说“认不得了”，是盛赞那里城市建设发展之快，比如：高楼越来越密，马路越来越宽，设施越来越先进，等等。有的人说“认不得了”，则是惋惜那里的城市面貌越来越趋同，失去了原来各自的特色和风韵，含有深深的憾意。

我则两种心情兼有，既为“认不得了”兴奋，又为“认不得了”惋惜。

拿我的故乡苏州来说，我的心情就是矛盾的。我生在苏州，长在上海，以前常把这两个城市拿来对比。总是嫌苏州太古老、太陈旧、太狭窄，太小家子气，太缺乏现代化气息，老嫌它的房屋破烂，河水肮脏，总想苏州哪年才能赶上现代化的上海。现在呢，她已经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我又为很难找回孩提时代熟悉的“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楼一夜听春雨”的风韵而感到怅惘。对于国内其他城市的变化，心情也是如此。

人生就是这样矛盾。人的价值取向总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正如北京一家粥店的一副对联所云：“艰苦岁月想吃肉，小康生活要喝粥。”时代已经进入与世界接轨的21世纪，人们渴望的是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住上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楼房，开着最新款式的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奔驰……当这一切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又开始怀念旧日的情调，埋怨当初拆迁得过于彻底，缺乏远见。纵然再复原一些旧貌，毕竟是些“假古董”，唤不起思古之幽情了。

城市建设部门呢，也确有它的难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经济相对落后，而广大居民急迫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情况下，只能舍熊掌而取鱼，先解决燃眉之急。

否则人民政府不能急人民之所急，岂不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要紧，一时也顾不得许多，这完全可以理解和原谅。当然也不排除有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以及其他成分，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但是，积累了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城市建设、包括旧城改造，确实到了可以也应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特别是在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发展和保存原貌的关系、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问题上，需要认真借鉴一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最近读到一本张光磷教授写的《季羨林先生》，其中“重返哥廷根”一章，读了很受启发。

季羨林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居住了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回国。三十五年后（1980年11月）他率团访德，重访哥廷根。当时他以为经过了三十五年的岁月，那里的一切肯定都人非物非了，没有想到，一切都同三十五年前一样：“季羨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他走到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似乎就是当年的那一位。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季羨林去重访当年住过的房子，房东虽早已离开人世，但房子还在，“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他走到旧址前“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总之，季羨林在短短的逗留期间，看到了他一直盼望看到的一切，除了故人以外。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他怀旧、念旧的情怀。

这就使人想到，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除了它的实用价值（舒适、宽敞、光线等等），还要有审美价值（包括对历史、文化氛围和怀旧心理的满足等等）。不久前，一位光明日报的女记者从上海回来，打电话告诉我，上海的变化确实惊人，但她希望看到的茅盾《子夜》里描写过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亭子间、石库门始终没有看到，只好怅怅而归。她问：如果把怀念中的和想象中的东西都抹掉了，对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旅游者还有多少吸引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许多发达国家在改造旧城方面积累的经验，已经足够我们借鉴——那就是让愿意住在保持原貌的建筑物里的人们，同样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物质文明。

2004年10月6日

## 请为爷爷奶奶写点书

今年国庆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走访北京社区干部时，特意和退休老人见面。除了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发挥余热外，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好好负起教育第三代的责任。

总书记的话虽然不多，许多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老人听了都很感动。看完电视新闻第二天，我和徐惟诚同志（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通电话。他说：“凭总书记这句话，说明他很了解今天中国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所面临的问题。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都成为学龄儿童、学龄少年了，而他们的父母正处在忙于工作、事业的阶段，许多家庭都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孩子们家庭教育的责任，大量落到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肩上。他们教育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一直建议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为爷爷、奶奶们写一点书。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去年一年，为父母们写的书出版了数百种，而为爷爷、奶奶们写的书却一本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听了徐惟诚同志的话，我心里一直在想：既然有了那么多为父母们写的书，为什么还有必要为爷爷、奶奶们写书？后来想明白了：一是从亲属关系来说，祖孙属于“隔代人”，当爷爷奶奶的容易宠爱溺爱孙辈，既怕管不住、管不好，又怕管深了、管多了惹儿女不满意；二是时代发展、变化太快，老一代人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形势，至少在三方面需要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一是知识需要充电。虽说当今的“祖字辈”都有一定的知识，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已经逐渐老化，或者正在老化，对许多新事物懂得还不如孙辈。六年前我在全国人大时，有感于有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审议法律草案时，对不少新事物、新名词不甚了了，曾经写过一篇《回家

问问孙子》。现在不懂不会的东西就更多了。在孙辈面前，知识不如他们，说话就缺乏权威。

二是观念需要更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思想观念、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老人们“看不惯”的事情越来越多，与孙辈形成很大反差。这种“看不惯”，有些是正确的，也有些是由于我们头脑里的观念陈旧，未能与时俱进。因此，在教育孙辈应当如何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时，首先需要我们弄清楚自己的思想观念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过时的。

三是方法需要改进。现在看来，简单化的、粗暴的训斥、说教和责罚不但越来越不管用，而且容易激化矛盾。当前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旦出现顶牛，就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不管。所以，研究新的与孩子的交流方式而不仅仅是管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既要学习国内的成功经验，也可参考一些西方国家家庭的做法。据我所知，西方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花钱、交友、约会、出游等等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办法，很值得借鉴。

由此看来，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编写一套“教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肯定会受到欢迎。如果把国内外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力量整合起来，此举不难成功，其社会效益相当可观，说不定还能成为畅销书呢。上海出版界、教育界向来在全国开风气之先，此事曷不一试？

2004年11月6日

## 猫的喜剧

即使最富有想象力的人，恐怕也难以想出在欢迎国宾的庄重晚宴上，突然闯进一只猫，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我可真的遇到了这种场面，它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1999年4月1日，李鹏委员长一行结束对希腊首都雅典的访问之后，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克里特岛。这是一个很少人工雕琢痕迹的小岛，据说居民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老的生活习惯，热情好客，粗犷俭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因英勇抵抗法西斯入侵而闻名于世。

这天晚上，克里特岛大区领导人以极其热烈、隆重的方式，为中国贵宾举行盛大的欢迎晚宴，宾主发表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后，便是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歌舞，很快把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

就在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一只肥硕的黄猫，旁若无人地闯进了宴会大厅。它先在开阔地带好奇地东张西望，接着就钻到宾客座席下面，蹭蹭这个，嗅嗅那个。大厅里顿时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些胆小的女宾竟发出尖叫。那猫却毫不理会，后来干脆跑到主桌前面，在离主宾不远的地方坐下，大大方方地“洗”起脸来。

大厅里的侍者一时慌了手脚，急忙分头兜捕那个不知礼仪的家伙。可是谁能跑得过它！那位头发花白、穿着黑礼服的胖领班，急得汗流满面还是奈何它不得。

在这喜剧性插曲进行的过程中，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主桌。有担心，有焦灼，有歉意。可是，李鹏委员长一直在和主人谈笑自若，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场内紧张的空气很快恢复了轻松。

趁着那胖领班过来给我换盘子的机会，我悄悄问他：“这猫是你们养的吗？”他摊开双手，耸耸肩膀，小声说：“不，它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两年多了，经常来

参加宴会。先生,你喜欢它吗?”我点点头,他便显得很高兴地“啧啧”两声,那猫招之即来。领班从我的盘子里切下一片奶酪,塞进它的嘴里,爱怜地咕哝了一句:“小乖乖,别胡闹。”“小乖乖”真就安安静静地趴在桌下品尝美味了。

宴会结束,宾主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步出大厅。那猫大概也知道时间已到,站起来伸伸懒腰,缓缓地尾随人群离场。看来,它对这样的生活已经非常习惯。

在回住处的路上,这件事情成了中国同志谈论的热点。有的说,如果这事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将会怎么样;有的说,当时万一主宾流露出一丝不快,将会怎么样……不过,有一点感受是相同的:这出小小的喜剧,给隆重的晚宴增添了一种温馨的人情味。而喜剧能够有个完善的结尾,是因为人间有着宽容,有着纯朴。

生活本该如此。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纯朴,便多一些喜剧。

2004年11月7日



## 安于当个“老头儿”

“打的”回家。当出租车在大院门口停下时，“的哥”扫了一眼周围环境，好奇地发问：“您，家住这儿？”

显然，他有点不相信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老人，会是这里的住户。

我冲他一笑。于是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

“噢，我明白了。您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对吧？”

一句话把我逗乐了。难怪人们常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业余政治家”，明察秋毫，一字增减，就把问题的要害点破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玩味这“头儿”和“老头儿”的微妙不同，越发赞叹中国语言的丰富幽默，这样的妙语，在外国语言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老头儿”从来不算是尊称。记得在纪晓岚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酷热难当，纪晓岚赤着膊在书房里编修《四库全书》，忽闻一声“皇上驾到”，他来不及穿衣迎驾，情急之下，慌忙躲到桌子底下。过了好一会儿，不见动静，以为皇帝走了，便大声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不料皇上正悄悄坐在旁边翻看书稿，闻言大怒，当场命令纪晓岚从桌底爬出来，要他解释清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在这危急关头，大才子纪晓岚竟然有板有眼地奏道：老，寿者之谓也；头，至高无上之谓也；子，视万民如子之谓也。（大意如此）皇上虽知他在胡编，却也转怒为喜，赦了纪晓岚“大不敬”之罪。

尽管纪晓岚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老头子”（或曰“老头儿”）毕竟不是中听的称谓。像穆青同志那样，在新华社被上上下下直呼为“老头儿”，已成为一种尊称、爱称，则属于特例，另当别论。对于众多曾经当过“头儿”的人来说，一旦升为“老头儿”，总是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甚至心有不甘的。

由于不习惯或不甘心当普通“老头儿”，就容易生出各种奇特的心态。“问廉颇

老矣，尚能饭否？”便是不甘心当“老头儿”心态的突出表现。于是，明明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还是喜欢听“宝刀不老”，喜欢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明已经不在其位了，还是忍不住对不该再干预、过问的事情过分“热心”，从而凭空添出许多烦恼。学句时髦话，这恐怕也算是一种“老头儿综合征”吧！

从“头儿”到“老头儿”，既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的“老头儿”，应当顺应这种变化，习惯这种变化。像《诗经》里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好好地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小休”人生，安于当个“老头儿”，甘于当个“老头儿”。这其实也是一种贡献。

写到这里，我打电话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老朋友宋木文讲了自己的想法。他似乎颇为赞许地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再补充一句：当个健康的‘老头儿’，快乐的‘老头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毕竟是老领导，想得比我更周全。

2004年12月25日





范敬宜临石涛山水册(1982年)

## 五年·百篇·四谢

年尾岁首，媒体流行起一个时髦词儿——“盘点”。什么“一年国际形势大盘点”，什么“奥运辉煌大盘点”等等，大有取代“回首”“回眸”之势。本人无产、无货，便在除夕之夜“盘点”起一年笔耕的收成，发现这一年居然还算是个“平年”，其中“敬宜笔记”一项，到2004年12月25日，前后叠加正满100篇。这个数字，给已经跨进74岁门槛的自己一份意外的惊喜和欣慰。

“敬宜笔记”是1999年3月25日开栏的。当初完全没有在这块“阵地”上盘踞五年的思想准备。因为自知腹笥不丰，又不十分勤奋肖恒。虽说已从人民日报的岗位退下，社会活动却有增无减，各种事务、教务、债多（包括文字债、书画债、人情债）缠身，每天疲于应付，要想为一个专栏长期供稿，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难以为继。现在居然能够坚持下来，并非我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有各方面外部条件的支撑。所以，“盘点”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动笔写2005年第一篇——也即第101篇“敬宜笔记”的时候，首先要由衷地表达内心的感谢。

一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写不尽的写作题材，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宽松、和谐的写作环境。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感到：天涯无处无“芳草”，江河无处无“活鱼”。既不用担心“资源枯竭”，也不需担心“言多必失”。想想同样是为晚报写专栏，我的前辈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为一个“燕山夜话”，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新民晚报社长林放同志，为一个“未晚谈”，又招来多少麻烦。我的才能、水平无法与他们相比，但遭际迥然不同。每念及此，怎能不感谢邓小平同志开辟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谢新民晚报领导的慷慨。晚报副刊的版面有限，在寸土寸金的版面上，让一个作者长期占一席之地，是要计算“成本”，考虑“平衡”的。我这五年100篇，以平均每篇1200字计算，至少是12万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作为一个老报人，深知

其中的难处，也深知其中包含的宽容。

三谢广大读者的鼓励。读者的鼓励是这个专栏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动力。这五年中，难忘的事很多。有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偶然在飞机上与我的一个朋友邂逅，打听到我的住处，竟专程从上海飞到北京，目的只是为了见个面，要我在已出版的《敬宜笔记》一书上签个名。有一位青年读者，写来两封热情洋溢的信，说他在灯下读我的“笔记”，是他一天中最温馨的时刻，再三嘱咐我要保重身体。更有趣的是，一位老年读者读到我一篇谈现在理发师不会刮脸的文章，特地来信告诉我，上海有一名退休理发师，刮脸的技术极佳，希望我回上海时一定要通知他，由他陪我去刮脸。每当看到案头那一叠叠充满友情的读者来信，倦意顿消，精神倍增。

四谢责任编辑的盛情。我很早就知道，《夜光杯》编辑部是一个敬业精神特强的群体，他们对读者、作者的热心负责，有口皆碑。一直和我联系责任编辑贺小刚同志，对我的稿件不仅精心处理，而且每次收到去稿必有电复，每次作品见报必寄样报。对于报纸编辑来说，给作者打电话组稿、寄报属于本身业务，似乎不足为奇，难得的是五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实在太不容易了。凭这一点，我也不敢、不忍再偷懒。

常言说得好：情重不言谢。尽管可以不多言，还是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回报读者，回报为我付出无私奉献的朋友们。当然，人老了更需要多一点自知之明。不久前我写过一篇《甘于做个“老头儿”》，提出要做个“快乐的老头儿，健康的老头儿，有所作为的老头儿”，事后收到一位福建的朋友来信，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又补充一句：“还要做一个不讨人嫌的老头儿。”此言极是。所以，我的“回报”应当加个前提：不要“回报”到“讨人嫌”的时候……

2005年1月25日

## 京城餐韵

无意中发现，京城新建的大厦、酒店，越来越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

走进著名的保利大厦，迎面映入眼帘的是镶在大理石上的巨幅“石鼓文”，气势恢宏，动人心魄。走廊里悬挂着清末民初任伯年画的四扇人物屏条，休息室里墙上则是张大千的泼彩山水。虽然未辨真伪，却也引我驻足观赏良久。

万寿路上新开一家“寰岛博雅酒店”，进门就见矗立着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黑色大理石巨碑，上面镌刻着放大的汉“张迁碑”，蔚为壮观。我路过这里时，经常进去仰读一番。“张迁碑”是我国汉隶中的极品，朴茂凝重，每次读它，都有一种目迷神移之感，得到很大的艺术享受。

这种风尚，似乎正在传播到一些中低档的宾馆、饭店，甚至路边小店。我家附近，去年夏天开了一家粥店，门面不大，档次不高，却从早到晚，门庭若市。其原因之一，是店堂里一副自撰对联——“艰难岁月想吃肉，小康生活要喝粥”吸引了众多顾客。此事我在《人民日报》一篇短文中已经详述，不再重复。无独有偶，不久前在这家粥店附近，又开了一家名为“田师傅红烧肉”的饭店。由于“好吃、不贵”，刚一开张，门前就排起长龙。顾客多为工薪阶层和学生。我在好奇心驱使下，进去看看，没有尝红烧肉的滋味，首先被墙上一篇《田师傅红烧肉赋》吸住了眼球。奇文共欣赏，我花了五分钟把此赋抄录下来：

红烧肉者，其名甚俗，其源甚古。高人雅士，贩夫走卒，流品虽异，嗜好不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爱红烧肉者无。东坡居士，余事烹肉，老饕一赋，名播千古。一代天骄，伟业宏图，百味杂陈，难免留箸。做红烧肉不难，居常家庭，土缶陶盆，差能应付。若夫志在美食，欲超凡俗，则需博采众长，锻炼功夫。难矣哉！为人师不难，《关雎》后妃，人云亦云，亦可充

数；然必真才实学，庶几传道解惑，桃李三千，心香一炷，难矣！

经营餐馆亦不难。饮羊登垄，鄙焉不取；不义富贵，于我云浮。不难在守己，甚难在忧道孤。道之所在，吾不孤矣！

尽管个别用典遣词稍嫌牵强，总体上不失为一篇亦庄亦谐、琅琅上口的文字，可惜不知出自谁人手笔。

前几天，又路过一家家常菜小饭店，这家实在过于简陋，不想逗留，但是墙上贴的一篇散文，引起我的好奇。当时未带纸笔，便向服务员要了一张空白菜单，把它抄录下来：

家，是一个温馨的甜蜜的字眼儿。在家可以撒娇，可以打鼾，可以舒展筋骨，也可以培植起志趣，可以无拘无束尽享天伦，可以冲破时空的界限，去聆听儿时的笑声，可以观鱼赏花，自做佳肴，美化休闲的时光，也可以打点行装，充气加油，准备扬帆远航……

不知是自撰，还是抄来的，但把“家”与“家常菜”相连，也算是用心良苦。服务员见我既不点菜，也不吃饭，只是一个劲儿地抄，疑惑地上前问我：“先生，这写的有问题吗？”我连声否认：“不，不，写得很好。”

我和朋友们谈起这些见闻，有的笑我太书生气，说这不过是“商业包装”为了多赚钱；也有的说这是附庸风雅，不足为训。我想的是，搞商业开始懂得归根到底要“拼文化”，应该说是个进步，至于“附庸风雅”，总比“附庸低俗”要强得多。

2005年3月20日

## “艾培”还在期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杰出的国际新闻战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走过了九十年既辉煌又艰辛的风雨历程，匆匆而又安详地离开了他一生为之奋斗和眷恋的中国大地。

他的挚友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在电话中哽咽地告诉我：“艾培（对爱泼斯坦的爱称）在临终昏迷中喃喃自语：‘我想周恩来正在召唤我去见他……’”

我对爱泼斯坦的离去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一个月前，也就是4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爱泼斯坦九十岁生日的茶话会上，刚出院不久的爱泼斯坦还作了一个充满深情和哲理的答谢辞。为此，我写了一篇《广阔背景下的理性思考》，讲了四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一句未提自己一生为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一句未提自己和中国三代领导人的亲密关系；一句未提自己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和磨难；一句未提人们庆祝他的生日是对他的感谢和褒奖。他只用平静而谦和的语言结束他的讲话：“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把你们今天的热烈情绪看作是我的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开始，而不是对我过去历程的一个总结。”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五个“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我认识爱泼斯坦是在1984年调到国家外文局之后，对他来说，我只能算是他的一个新朋友。二十多年来，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堪称良师益友。使我最难以忘怀的是他对中国的无比热爱，热爱到几乎不能容忍一点对中国的非议和诋毁。朋友们在一起经常说他“比中国人更爱中国”，“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正因为爱之深，他对有些问题也责之切。记得在1985年他八十寿辰那天，他向前来祝寿的邓小平同志恳谈了半个小时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应该加强针对性、贴近性的意见，也对新闻报道中的弄虚作假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些意见在第

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作了披露。几十年来，他对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能释怀。

几年前，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他突然过来严肃地问我：“你对新闻报道的虚假现象抱什么态度？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可以容许‘合理想象’？”我说：“我是反对‘合理想象’的，但是现在新闻、文学、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争议很大。”爱泼斯坦激动地说：“这有什么可争议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个原则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如果新闻可以凭想象，将来还有谁相信我们的新闻！”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动怒，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最近某报登载了一篇关于他和已故夫人邱茉莉的爱情生活的报道，其中有16处虚构，甚至说宋庆龄是他俩的媒人，还亲自出席了他俩的婚礼，这纯属捏造。“造谣都造到国家领导人头上了，还有什么不敢干的！这就是容许‘合理想象’的结果！我要向他们抗议，一定要他们更正！”

后来他真的这样做了，报纸也作了公开检讨。遗憾的是，从那以后，虚假新闻愈演愈烈，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每年春节团拜会见到他，总会提起这个问题，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一声叹息。

现在，爱泼斯坦走了，人们都说艾培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无憾了。不过我想他还是带着一件未了的心事闭上他睿智的双眼的——他正在期待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打假”取得最后的成果。

2005年6月6日

## 清华园的“孩子们”

“清华园，我永远是您的孩子，将来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是您的孩子……”

7月13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位毕业生的长信，深情地追忆四年中清华给她的终身难忘的熏陶。上面这段话是信的结尾。

读着这封感情真挚的信，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尤其是“孩子”二字，令我怦然心动。

我受聘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三年。清华崇实的校风，严谨的学风，认真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弥漫在整个校园中的那种浓浓的亲情。教师视学生如子女，学生视教师为父母。老师称学生为“孩子们”已成习惯，学生也有把他们喜爱的老师称为“妈妈”。这是一道很独特的风景线。我感到最自豪的是，经过三年的相处，学生们对我的称呼已逐渐由“院长”“老师”改为“爷爷”或“范爷爷”，即使在课堂上也是如此。我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最高礼遇”。

因此，在今年学院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此时此刻，我对所有的毕业同学充满着一种期盼和依恋的复杂感情。我们的学院，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而且是一个温馨、和谐、充满亲情的大家庭。我们都把你们视为自己的孩子。今天，眼看着你们像梁启超先生说的那样：‘乳虎啸谷，鹰隼试翼’，真有说不尽的高兴。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关系，正是我们学校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论到哪里，都要把这种感情、这种校风带到哪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讲这番话，是有一个背景的。几天之前，我收到一封不具名址、仅有26个字

的来信：“院长先生：你把大学生看成孩子，恐难把新闻学院办好的！望三思！”我思了半天，才想起曾在《新民晚报》写过一篇《陪着孙辈一起长大》，把学生称为“孩子”；还有就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登过一篇记者李泓冰写的《从费孝通到清华学子李强》，里面有一句话：“在清华，聪明孩子多如过江之鲫。”那位读者究竟为什么对“孩子”这个称呼有如此尖锐的看法，我不清楚，不好妄加猜测，但有可能出于两点：一是对清华的环境和氛围不大了解；二是担心过于看重对学生的亲情会影响严格。这都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清华大学师生间的这种学生视教师为父母、教师视学生为子弟的亲情，不是始自今日，而是有悠久传统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王国维、朱自清那一代。而在新时期，经过对“文革”极“左”教育路线的拨乱反正，这种既传统又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在发扬光大，“爱”与“严”的统一，构成了清华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的源泉之一。

传统是不能割断的。如果我要列举中国历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师生之情的故事（比如明代民族英雄史可法与他的恩师左光斗情逾父子的故事——见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人们可能讥为酸腐。那么看看西方又是如何吧！最近买到一本新出版的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自述：《学海浮槎》，里面记叙了许多关于作者与他既严且慈的德国恩师 Sieg 情同骨肉的情节。下面一段感人至深：

留在我回忆中最深刻难忘的情景，是在冬天的课后。冬天日短，黄昏早临，雪满长街，寂无一人。我一个人扶掖着这位像祖父般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踏在雪地上，吱吱有声。我一直把他送到家，看他进了家门，然后再转身回我自己的家。此情此景，时来入梦，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有此一段回忆，我就觉得此生不虚矣……

多么令人神往！愿天下每一个“孩子”回顾一生时，都能拥有这样最幸福、最愉快的回忆。

2005年8月3日

## 老上海的“市声”

从媒体上感觉到，一种对老上海的怀旧热正在黄浦江畔悄然兴起——人们对老房子、老地名、老街道、老店铺、老行业以至老上海话谈得津津有味，惹得我这个离开上海已达半个世纪的游子，也生出许多乡恋。

于是，我也想来“轧闹猛”，说说尚未涉及的一个话题：老上海的“市声”。

“市声”是个文言词儿，现在已经很少使用，连新版《辞海》也未收录这个词条。不过在生活中它依旧存在，普通话叫“叫卖”声，北京人叫“吆喝”声。记得当年在无锡国专沪校读书时，章太炎的弟子金德建老师曾给学生出过一道作文题，叫《“市声”说》，把我憋得不知从何下笔。所以对这个词儿印象特深，至今每听到市上的吆喝声，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老师。

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只要有商业交易行为，都必然有吆喝——市声。不过，老上海的市声有它的特殊性，因为上海是万国商埠，商业中心，五方杂处，各地商贩云集在此谋生，于是上海的市声形形色色，南腔北调，有本帮的，有苏帮的，有徽帮的，有宁波帮的，有广东帮的……组成一支支复杂多彩的“市声交响曲”，回响在蛛网般的大街小巷。这是老上海“众生相”的一个重要侧面，一个生计艰难时代的侧影，很值得民俗学者去搜集和研究。

对儿童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要数叫卖零食的吆喝声：

“香脆饼……苔条饼，麻油馓子……金刚脐，老虎脚爪……脆麻花！”大清早，贪睡的孩子就被这带有苏北口音和油香味的悠长吆喝唤醒，一骨碌爬出被窝，伸手向妈妈要点心钱。

“咸煎饼哪马拉糕、伦敦糕哪马蹄糕、蛋挞、鸡批、水晶虾饺……”典型的广东口音，对孩子们是更大的诱惑，但是因为价格较高，一般家庭不大敢问津。

下年三四点钟以后，特别是夏季，是市声此起彼伏的高潮：

“冰呢冰呢卖冰呢，机器冰呢卖冰呢！”

“啊……美女牌棒冰，棒冰吃哦棒冰！梆梆！”

“西瓜要哦西瓜？要哦老虎黄西瓜？”

“馄饨面哪，鲜虾馄饨！”

“臭豆腐干……”

“鸭膀鸭腿，鸭肫啊鸭肝！”

“酱萝卜干大头菜，盐金花菜芥辣菜……”

除了食品，还夹杂着“旧货啊，阿有烂东西卖哦？”“磨剪刀咪——戙菜刀！”“棕  
绷藤绷修哦？”

普通人家的孩子最喜欢的还是价廉物美的炒白果。那是时令性食品，中秋前  
后，夕阳西下，弄堂里便响起一连串唱歌似的叫卖声：

“小手炉，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要吃白果齐来数，勿吃白果长勿大(音 du)……”

于是一群孩子把挑子团团围住，你一个铜板他一分钱地“数”起白果来，手里没  
钱的孩子就站在旁边，等候偶然从铁锅里爆出一颗落在地上的“开花白果”，有时就  
为抢一颗不花钱的白果打起架来。这时，好心的小贩就会出来劝架：“勿要打嘞，拨  
依一粒！”得到这“一粒”的，就像中了头奖，破涕为笑。

今天的孩子，恐怕很难想象和体会这种市声带来的快乐了。

不过，留在童年脑海里的市声，并不都是期盼和欢乐。有两种女声叫卖直到今  
天回忆起来还是令人心颤。一种是春天早晨门外响起的幽幽的卖花声：“白兰花咪  
——茉莉花”；一种是寒冬深夜里从远处传来似泣似诉的“白糖莲心粥……五香茶  
叶蛋……”听着这凄凉的颤音我幼小的心里常想：她家里一定有一个病重的丈夫和  
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她回家。等我长大了有了钱，一定要把她的一锅粥和所有  
的茶叶蛋都买下来。

2005年9月1日

## 季老的“书桌”

走进季羨林先生的病房，95岁的“老爷子”依旧腰杆笔直地端坐在床边一张单人沙发上，神清气闲。在他的前面，是一张小小的“书桌”。

他向我颌首微笑，示意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一年多没来了。”

“是的。不过您的气色明显比去年好。”

“真话吗？”他莞尔一笑，抬起双臂晃了晃说：“确实还不错。”

“新闻记者不能说假话，我说的是事实。”我说：“真没想到您还在写东西。前些日子温家宝总理来看望您，新闻报道说您正在写《泰山颂》，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呢！”

谈到温总理的探望，老人显得很兴奋：“温总理来看我，只带了一名随从，很平易，真是轻车简从，我特别高兴。”

季老说话的时候，我扫了一眼他面前的“书桌”，原来是给病人就餐用的带轮子的小饭桌，长不满三尺，宽不到二尺，可供他写作的空间不过一尺左右。真难以想象，他近两年来的作品，包括最近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纪念诗人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

一直精心照料季老的李老师，可能看出我的心思，便向我介绍：“他写得很多，几乎每天都写，光是给《新民晚报》写的就有不少——他最关心的是《新民晚报》，每天都让我读给他听，认为它的编辑特别负责，报纸上很少发现错字。——不过我有限制他写稿，很多稿子都让我收藏起来了，没有给他寄出去，否则他会写得更来劲儿。好在他也不问。你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季老静静地听着，露出无奈的表情。等李老师说完，他才说：“其实，写东西并不累。人老了需要多动动脑子。我是一直在和疾病斗，互有输赢。有时候它赢了我，我就歇几天；有时候我赢了它，它就让我写几天。”

我问季老：“您的眼睛能行吗？”

季老指着自己的双眼说：“这只右眼早就是青光眼，左眼是白内障，已经动过三次手术，视力只有0.2，不能再用了。现在看书、写字全靠这只青光眼。”

他似乎看出我有点黯然，宽慰地说：“除了眼睛，其他没有大问题。我的嗅觉一点不比年轻人差。你不是给我带来茶叶吗？我只要闻一闻，就能闻出它是不是好茶。”

我忙把茶叶罐递给他，正想剪开铝箔的包装，他连声说：“不用剪，不用剪，我在它外面闻闻就知道。”他捧起罐子连连嗅了几嗅，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点头说：“是好茶，是好茶！”

2005年9月12日

## “敬宜愚兄：您好！”

### ——谈谈学校应教应用文

“敬宜愚兄：您好！”

这是一封读者来信的开头。请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者凭空杜撰——此信就放在面前的书桌上，真名真姓真地址真职业——我纵有天大的想象力，也虚构不出这样的情节。

现在我拿这由头来做文章，丝毫没有嘲笑对方的意思。他来信要求我帮他办件小事，意思比较清楚，文字也还算通顺，问题是他好像没有受过写信的基本训练，不太懂写信称谓的用法，不知道“愚兄”只能是写信者本人的谦称，如果用到收信人身上，就等于骂对方是“笨蛋”了。

由此想到一个久已“骨鲠在喉”的话题——学校应该教点应用文，应该注重基础教育。

所谓应用文，是指适合日常实用的文字，书信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即使在信息技术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书信仍然是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过去，一般小学三年级语文课就开始教点应用文，包括书信和简单文书契约的写法。“孩子会写信了！”是值得父母高兴的事情。不过那时书信的格式比较刻板，称谓、抬头、落款、语气等等都有讲究，小孩子不太容易掌握。所以直到大学的中文系，还设有“书牍”这门课程，当然，那是更高的要求了。我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时，就有一门必修课——“书牍学”，后来还真派上一点用场，直到现在，用文言与港台人士通信，还不致太出洋相，回想起来应当感谢那位海上名儒高吹万的孙子高铮先生（他还是大同大学的化学教师）的严格训练。

随着时代的变化，书信的写法比过去自由许多，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程式束缚，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必要的格式和礼仪用语还是不可少的。即使在

西方国家,书信格式仍然相当严格。特别重要的公务往来书信,除了要把意思表达清楚,还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讲究身份、用语、分寸等等。否则稍有失礼,便会误了大事。遗憾的是,现在学校好像都不教应用文这门课了。

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天天要和书信打交道,从中发现许多信件不仅不合书信的基本格式,甚至会闹出笑话,比如,在信封上写某某同志“敬收”,信的抬头写某某同志“敬启”,这就把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关系错位了。最普遍的是在信的结尾来一个孤零零的“此致”。“此致”是应该有宾语的,如“敬礼”或某某单位、某某人等,没有宾语就等于只说了半句话。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求职信,开头就是“范总编:见字如面”,简直就是过去测字摊替农村老汉给儿子写家书的格式,叫人啼笑皆非。

书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连信都不会写或写不好,无论如何称不上是有文化的人。因此,注重书信文化,应当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提倡学校教点应用文,恐怕并非多余或者苛求。

当然,话要说回来,书信并不完全是实用性的应用文。有些书信除了实用价值外,还有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最近我正在读大文学家叶圣陶和俞平伯的通信集《暮年上娱》,其中八百多通遗札,可以说篇篇都是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感情深笃、文笔优美的散文,读着使人获得一种精神的享受。至于《傅雷家书》则是又一种风格的上乘之作。在实现书信的实用价值之余,再多读一点这样的范文,那就再好不过了。

2005年11月25日



范敬宜临石涛写唐人诗意册(1982年)

五載同舟情至深驩歌一曲意難  
分風晨雨夕賴相持劍氣蕭心喜  
共鳴惟有豪情勝舊日愧無佳績  
酬知音唯此一語寄朋輩海闊  
天空任縱橫

戊寅三月離任時賦贈人民日報諸同志  
并賀人民日報創刊五十周年 范敬宜

范敬宜戊寅三月离任时，赋赠人民日报诸同志并贺人民  
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 说“清”道“浊”看世界

听说文怀沙先生不久前动了白内障手术。他已是96岁高龄，术后恢复情况如何，大家都很关心。于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端传来了熟悉的爽朗笑声。我问：“现在感觉如何？”他答曰：“痛苦极了！”我吃了一惊，急问其故，他的回答却是：“过去眼睛浑浊不清的时候，觉得满街都是美人，现在看得太清楚了，忽然发现个个都有缺陷，找不出一个真正的美人了。你说痛苦不痛苦？”

老人家生性诙谐，爱开玩笑，当时我只想他又在“老夫聊发少年狂”。过后，却越琢磨越感觉话中有深意存焉，似乎涉及一个哲学问题，即：如何看待“清”与“浊”。

清、浊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中国人自古把清、浊区分得十分严格，凡事都要讲个“泾渭分明”。大概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歌谣（见《楚辞·渔父》），——连什么水可供洗冠带，什么水只供洗脚丫都含糊不得，更不用说对人的品评。人分出“清流”与“浊流”之后，便注定命运，不容混淆。“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见《旧五代史》）连自命清流的人都该扔到浊浪滚滚的黄河里去，遑论其他！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更是复杂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万物之中绝对的“纯”是不存在的。即使最清纯的水里也有微生物，最纯粹的人身上也难免有污垢。黄河之水够浑浊了，却偏偏宜于生长繁殖鲜美的“黄河鲤鱼”；“下山孤且直”的瀑布肯定清澈，可它的潭下连小鱼都难以存活。所以，庄子是个明白人，早就发现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秘密，告诉人们：如果用“至清”的标准、“至察”的眼睛去寻找完人，最后只能是天下无一可用之材。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提出质疑：按你这么说，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用讲原则，睁一眼闭一眼装糊涂呢？非也。这里强调的是“至清”“至察”。“至”者，极端

也。事情一极端就会走向反面。看人要重大节，看事要看主流，否则周围要么个个全是“美人”，要么个个都是“缺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最讲究“清”字，一会儿“清查”，一会儿“清理”，一会儿“大四清”，一会儿“小四清”，结果搞得“遍地是蚂蚁”，把清水统统搅浑了。这样的年代虽然已成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追求“至清”“至察”还是如影随形，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很不合拍的。

构建和谐社会，十分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对人缺点的宽容，要多看人的长处和优点，远离苛求和挑剔。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于“非清即浊”的盲区。

谢谢文怀沙先生的“微言谈中”，他实际上是给我们讲了一番人生哲理。至于我的理解和引申，则难免“跋足”。好在范仲淹还有两句名言可供补阙：“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斗茶歌》）不过，做到这样的境界，实在太不容易。

2006年5月9日

## 飞车追薯

从小就爱吃烘山芋，到老还是爱吃烘山芋。

烘山芋，是南方的叫法；北方叫烤白薯或烤地瓜。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位无分尊卑，都爱吃这种价廉物美的大众化食品，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烘山芋是大街小巷随处可以买到的。卖烘山芋的小贩，不用多少本钱，设备极其简单，只有一座用废汽油桶改装的土烤炉，一把三尺来长的铁火钳，一丛幽幽的炭火，不需吆喝，凭着弥漫在空气里的一缕缕透着焦味的甜香，便把各色各样的行人吸引到它周围。即使如贵族化的圣约翰大学，门前也一字儿排着好几个烘山芋摊，衣着入时的男女大学生，也宁可不去快餐店，而爱捧着几个烘山芋谈笑自若边走边吃。此情此景，至今还令人神往。

后来到了东北，到了北京，尽管风俗殊异，烘山芋还是到处可以买到的。特别是冬天，大衣袋里揣着几个烫手的烘山芋回家，便给妻儿带来一阵惊喜。这时候，回忆在圣约翰大学门前吃烘山芋的情景，往往成为不可缺少的话题。

可是，近几年来，大城市里卖烘山芋的越来越少，大街上已经几近绝迹，人们对烘山芋的怀念却越来越深。只是偶然参加宴会，席间端上一小盘烘山芋，便被众人视为珍馐，一抢而光。说实话，那种烘山芋的味道无法与小摊上的相比。

有时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地位变了，口味也变了，就像清代一篇小品《芋老人传》里讲的那样，一位士人在落魄时，曾受“芋老人”的一块烘山芋充饥，当时觉得世界上任何美味都无与伦比。等到他当上了大官，便四处寻访那位“芋老人”，要他再给做一回烘山芋，结果大失所望，觉得味同嚼蜡。问其故，“芋老人”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的烘山芋并没有变，是您的地位变了。”我向同桌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都不以为然，一致认为大宾馆里的烘山芋之所以没滋味，主要是因为从烤箱里烤出来

的，同土法烤制的不一样，正如“橘逾淮则为枳”。我倒深然其说，因为积数十年之经验，知道凡是受普通老百姓欢迎的土色土香，一旦进入高堂华屋，一定会变味儿。

于是，从去年开始，我就经常在街头巷尾寻找从土烤炉里飘出来的烘山芋浓香，不幸都无功而返。直到不久前，有一天我又不死心，骑自行车去寻访烤薯。无巧不成书，刚出院子，便见四辆驮着烤炉的自行车在马路上疾驰而过。我大喜过望，急忙撵上最近一辆自行车，招呼他停下。谁知为首一人高呼：“不行！不行！不能卖！前面有警察！”四辆自行车加快速度向前冲，好像犯了什么大案的逃犯。这倒引起我的记者好奇心，想“采访”个究竟，也穷追不舍，在马路上演出了一场“飞车追薯”。大约追出五六百米之后，那最后一个小伙子不知是出于对我这老头儿的同情，还是他自己也吃不消了，终于把车停下，一面东张西望，一面催我赶快付钱取货。趁着这个空隙，我问他为何如此慌张，为何不让卖烤薯，他气喘吁吁地用七个字作了“答记者问”：“怕不好看(妨碍观瞻)，不卫生(污染环境)！”说罢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我揣着三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胜利而归。只是心里一直在嘀咕：这算是理由吗？城市里该治理的大事情多着哩，何必老跟那辛苦谋生的“小小老百姓”“较劲”？

2006年7月5日

## “千年文书好合药”

“千年文书好合药”，是一个想写已久的题目，因为童年时代就经常听母亲这样说。

此话出自何书何典，我从未查考，但意思是明白的：要珍爱看似无用的陈年宿纸。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忠实践行者，她生前十分注意保存前辈的墨迹，亲友的信札，子女的作业乃至各种已作废的文契、票证。这些别人眼中的废弃物，说不定哪天就派了用场，这时她就会很得意地说：“你看，这不是用上了吗！所以我总说：千年文书好合药嘛！”

可惜，这些“文书”在“文革”中损失殆尽，幸免于难的只有一小纸袋外公当年友人的信牒与唱和之作，袋子上写着：“寸缣尺楮，皆故人遗墨。”其中竟有十多位当年苏州名流如费仲深、汪鼎丞、陆守墨、杨戟门、潘承谋、蔡晋镛等人在天平山雅集上即席写的诗词。原来天平山是范仲淹的祖茔所在地，历代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严禁开山采石和滥砍盗伐。清季，有些不法分子与官府勾结，大肆开采山石，从中渔利。我祖父范厚甫作为范氏义庄和文正书院主奉，联合一批苏州名流上书诉讼，历时数年，终于胜诉。为了庆祝胜利，他们于丁巳（1917年）秋天在天平山举行了这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雅集。应该说，这是苏州历史上通过法律争取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权利的创举，而那些名人诗词手迹，便成了很有意义的历史见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此事。苏州市档案馆立即派人来借去复印，作为历史档案。经办此事的年轻朋友非常感慨地说：“看了前辈这种强烈的保护历史遗产的意识，我们真感到惭愧。”

前些年，我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见到费孝通先生，谈起这件事情，并提到其中出力最大的是费仲深前辈。在那次雅集上，他写的是一首数百字的古风，详述了事件的过程。费孝通听了非常惊喜，告诉我：“费仲声是我的叔叔，你什么时候能拿来

给我看看。”我答应了，却因生性疏懒，迟迟没有送去。不久费老逝世，此事便成为永远的遗憾。

最近，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重建工程竣工，主其事者决定把这件文物的复印件公开展览。我想，这虽然算不上是“千年文书”，但能对“合药”起个“药引子”的作用，也是有点好处的。

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个题目，是因为读了8月27日《北京青年报》的长篇通讯《协和医院病案上的岁月和仁心》，引起了一些联想。北京协和医院，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国际著名的医院。它创建于1921年，85年来，它救活了数以百万计的患者。令人惊讶的是，240万患者的病案原件竟至今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其中包括梁启超、蒋介石、张学良、宋庆龄、宋美龄、爱新觉罗·溥仪等历史名人的病案。还有一些记载世界首例、中国首例、医院首例疑难重症病例及罕见病例，为医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真算得上是“千年文书好合药”的重要例证了。据报道，当人们从“协和病案展览”上看到当年张孝骞、林巧稚等医学大师亲笔写的详尽、准确而且字迹工整、秀丽的记录，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重视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利用，不仅要求有强烈的保护意识、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有历史的责任感。自从有了电脑数据库，人们开始越来越不重视原始资料的保存。据说有的报社新建大楼以后，把几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全部处理掉，理由是“要查什么，电脑里都储存着，留它何用！”

这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电脑能够代替直观，世界上还要那么多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干什么！

2006年9月13日

## 一缕幽香入梦来

### ——贺《夜光杯》六十大寿

《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从1999年3月25日开始，为我开辟“敬宜笔记”专栏，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10篇。比起许多高产作者，110篇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这个缺乏恒心的人来说，也算得上是破了个人历史纪录。

是什么使我变得这样“勤快”起来？有些朋友调侃我说：“主要是你还没有过够‘报瘾’，从报坛退下来后总是手痒痒的，不写东西难受。”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仅仅为满足自己的“写作欲”，可以投稿的地方很多，何必只认准一个《夜光杯》！也有的说：“是不是《夜光杯》的编辑太热情负责，感动了你，使你欲罢不能？”也许有这个因素，而且我也确曾写过一篇赞扬的文章，但也不足以说明这就是激发我积极性的主要动力。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有一个理由：我喜欢《夜光杯》这个“朋友”。

“报纸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话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一个世纪前说的。但同样是朋友，感觉是不完全一样的。古人对朋友交情的区别说过这样精辟的话：“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有的朋友结交了一辈子，关系不错，但感情上还像初识；有的则虽擦肩而过，三言两语便成了莫逆。关键在于“气味”是否相投。作者与报纸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之所以喜欢《夜光杯》这个朋友，主要是它不论在什么季节、什么气候，始终散发和保持着一缕淡淡的而且是醇厚的文化气息。一报在手，就如三五文友，晤言一室之内，评古论今，谈天说地，暂离了浮躁喧嚣，走近了清凉世界。套用一句王羲之的话：“信可乐也。”前年《新民晚报》改版，我曾经担心《夜光杯》会不会被“过度整容”，改得“旧貌换新颜”。后来发现，改版以来《夜光杯》的面貌仍然是那么熟悉，那

么亲切,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欣慰之余,不禁要感谢《新民晚报》的领导。

办好报纸副刊是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报纸的改版创新已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副刊如何才能办得既让读者感到“面貌一新”又让读者觉得“一见如故”,无疑是两难的选择。但我总想,任何事情都是“有不可不变者,亦有不可变者”。不合时宜的东西自然不可不变,而读者认同、熟悉、喜欢的东西却千万不要随便去变。《夜光杯》历经一个甲子而品牌不倒,就像一坛美酒,越陈越香,秘密恐怕就在执事者们懂得“新”与“故”的辩证关系。

信笔至今,成打油诗一首:

灯前读罢《夜光杯》，  
一缕幽香入梦来，  
办报恰如作佳酿，  
“新”“陈”都赖巧安排。

2006年10月19日

## 听于丹，忆于廉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平时看电视不大注意专题讲座之类的节目，所以当《论语心得》风靡全国的时候，我竟浑然不知。

直到今年12月8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在京举行成立大会，我在休息室里听见冯其庸和范曾两位先生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论语心得》一书的热销盛况——首次发行即售出90万册，创新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北京签名售书那天，竟有一万多读者排队等候等等——才吃了一惊，但也没有问作者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

过了一天，与冯其庸通电话，他又提到《论语心得》，不胜感慨地说：“想不到当年被当作‘克己复礼’批倒批臭的《论语》，今天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可见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谁也割不断的。”

这时我才想起问他：《论语心得》的作者究竟是谁？

冯其庸惊讶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是于丹呀，于廉的女儿！”

这回轮到我目瞪口呆了，于廉是我们老同学呀，怎么忘了他宝贝女儿的名字呢！真不敢相信，二十年前曾由她爸爸领着到寒舍串门的小女孩，今天成了万众倾倒的风云才女！

往事如潮，一时涌上心头。

1945年，我15岁，考进了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有的长我十多岁，视我为小弟弟。其中出类拔萃的就有于廉、冯其庸、沈茹菘、曹道衡等。于廉不但才学出众，而且少年老成，谦恭沉稳，温厚可亲，是同学公认的楷模，对他敬如兄长。我当时还是个顽童，上课时经常做些小动作，不是给老师画个漫画，就是给同学传个字条，写首打油诗。有一次于廉给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劝我要收心读书，不要虚度光阴，有一句话令人至今不忘：“流光容易把人抛，聪明易被聪明误。”我母亲看后非常赞赏，对我说：“交朋友

就应该交于廉这样的朋友——这叫‘诤友’。”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于廉和冯其庸都突然悄悄“失踪”，不知去向，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听说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于廉还是无锡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当时是奉组织之命转移了。

后来，无锡国专停办，同学风流星散，天各一方，加上各人遭际不同，即使最亲密的同学，也如云泥相隔，不知不觉，三十来年不通音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报纸上知道冯其庸已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红学家，出了不少著作；于廉却仍杳如黄鹤。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始与冯其庸重逢，才知道于廉也在北京，曾长期担任万里同志秘书，时下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写的那个情节。那时，于丹大概只有十来岁。

如今，于廉已经作古多年，他没能看到于丹今天的成就和声望，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既欣喜又遗憾的。我不了解于丹的成长过程，但我坚信其中一定倾注着她父亲的心血和深情。她在荧屏上沉稳坚毅、挥洒自如的神态，使我感觉到她血脉中流淌着父亲的智慧和品格。感觉到她一定有良好的家教、家风。我是相信基因的。

古人云：“君子不匮，永锡尔类。”证之于廉父女，信然。

2006年12月31日

## “幸福家庭寿星多”

元旦上午，收到《中国老年》杂志社寄赠的一本老人《自我健康管理手册》。随手一翻正好翻到 189 页，一条用阿拉伯谚语做的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幸福家庭寿星多》。这使我想起我的姨婆婆曾乐君老人今年该是 110 岁了，便往上海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向这位上海著名的老寿星祝贺新年。

曾乐君老人是我母亲的七姨妈，我从小管她叫“七婆婆”。她是一位非常慈祥开朗的老太太，膝下十个儿女，个个健康、孝顺。五年前，她 105 岁生日那天，我曾打电话向她祝寿，她还从二楼走下来亲自接听电话，笑声朗朗，头脑灵敏，一点也不像已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这次接电话的是她的儿子章雷，他高兴地告诉我：“妈妈真是非常不简单，现在她是上海市级老寿星中的第三名，静安区的第一名，和前几年相比，唯一的变化是不能自己上下楼了——两年前摔了一跤，大腿粉碎性骨折，动了手术，钉了六根钉子，居然还康复了，真是奇迹，不过行动不太方便……”

我急忙说：“那就不要惊动她了，请你替我向她拜个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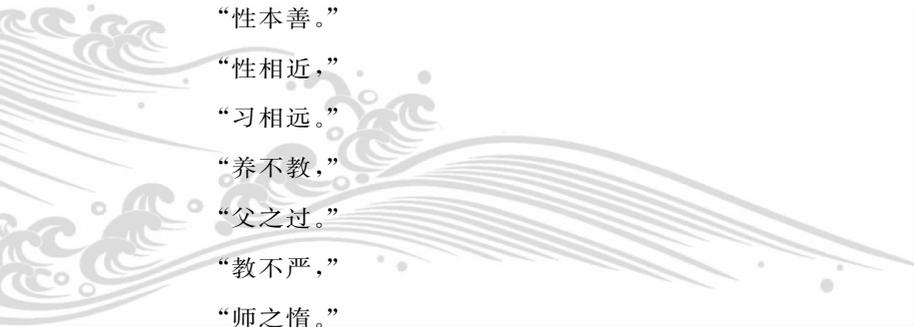
章雷说：“不用不用，她喜欢接电话，让我把电话搬过去……”

一会儿，电话里就传来七婆婆的声音：“僚阿是敬宜啊，谢谢僚牵记我，我现在蛮好，勿要紧格。”这时电话里插进她儿媳妇的声音：“妈妈喜欢闹猛，喜欢有小辈和她说话，等一会儿让她给你唱歌，算算术，背唐诗，背《三字经》。”

儿媳妇起了个头，七婆婆就用《生日歌》的曲调唱起来：

“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啊，祝你新年快乐……”

唱完歌，就开始做加法。她可以从  $1+1=2$  累计加到 1600，没有任何差错，但加到十位我就“叫停”了。接着是婆媳俩一起背诗、背《三字经》，儿媳妇说上句，婆婆接下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真是对答如流。因为怕累着老人，便停止了“测验”。最后我问她：“七婆婆，您究竟有什么长寿秘诀啊？”

她答：“既没啥秘诀，就是小辈待我好。”

放下电话，我想应该把这个场景写给《夜光杯》。为了弄清“就是小辈待我好”的内涵，我又给章雷打了一个电话。

章雷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为她提供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吃的、住的、用的都很平常，不过所有的子女和孙辈都非常爱她，想方设法让她过得开心，过得幸福。人老了，并不稀罕物质条件，但是最怕孤独，寂寞，希望总有小辈和她‘瞎缠缠’（上海话，闲聊天的意思），所以作为她的长子，我退休以后，谢绝一切外单位的聘请，每天守在她身边，和她‘瞎缠缠’，让她时时刻刻感受到生活在幸福之中……”

话虽不多，也不深奥，但足够成为“幸福家庭寿星多”这句阿拉伯谚语的最好说明了。我想。

2007年1月17日

## 寒鸦万点入城来

近几年来,许多城市乌鸦为患,北京也在其中。年年入冬以后,每到黄昏时分,便有寒鸦万点,铺天盖地侵入市区,觅枝找宿;次晨又风雨无阻,成群结队,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不久以前,上海《新民晚报》作了相应报道,并特别提到北京万寿路一带为害最烈,属于“重灾区”。我家就在万寿路,自然不胜滋扰。那乌鸦来时,聒噪贯耳,粪便纷堕,过往行人躲避不及,往往就中“头彩”,有的只好头顶报纸,身披塑料布,狼狈逃窜。乌鸦去后,街道留下一层如雪粪迹,不仅城管工人天天忙于清扫、冲刷,有时连附近驻军官兵也不得不参加这份特殊的义务劳动。此情此景,总要延续到来年春暖花开之后。

乌鸦,虽然历来在民间视为不祥之物,但据说也属益鸟,因其有反哺的习性,还被称为“慈乌”。尤其在诗人、画家笔下,它也是抒情写景不可缺少的点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此非传诵于古甚至远播东瀛的张继《枫桥夜泊》乎?至于“鸭头春水绿,鸦背夕阳红”,“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暗绿晚藏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等,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似乎缺了乌鸦就意境全失,兴味索然。现在,身受鸦灾之苦的人,谁还有这份欣赏的雅兴?

乌鸦大举入城究竟是什么原因?其说不一。有的说是近年城市人口和建筑物骤增,温度上升,给乌鸦提供了避寒的环境。有的说是由于郊区农田和森林面积减少,乌鸦们缺少觅食和栖息的场所。至于如何治理,有人主张用飞机喷药,有人主张在树上挂灯,还有人主张燃放鞭炮等等,总之都想让乌鸦不得安宁。但至今未见实行,想来都非治本之计。其实,替乌鸦们想想也怪可怜的。

我不是科学家,对这样的问题没有一点发言权。不过我想总是和气候、物候的

变化有关系。联系近几年来地球气温变暖,某些物种消失,生态环境恶化,乌鸦习性的反常恐怕决非偶然,而且还有变本加厉的可能。它们的大规模迁徙入城只是一个信号。

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看过一部名叫《二十四只眼睛》的日本电影,描写的是战争给日本儿童带来的苦难。那首《乌鸦乌鸦你不要哭》的电影插曲,忧伤低回,令人揪心,至今难以忘怀。如今听着满街的“乌夜啼”,常生遐想:不知它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哭泣,还是在为大自然的未来哭泣。

尊敬的科学家们,请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重大课题,并早图良策吧!——为了乌鸦的生存,更为了人类的家园!

2007年2月9日

## 红绿灯前说“习惯”

3月2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一条新闻,报道上海志愿者协助交通部门维持交通秩序的成果。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当记者采访行人对此有什么感想时,一位中年妇女的回答却叫我好生纳闷。她说:“经过一年多的宣传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停,绿灯行”,应该是四五岁的孩子都懂得的规矩,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到今天才开始“习惯”,而且是因为经过了志愿者一年多的宣传?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我是1938年八岁时随家从苏州迁居上海的。那时苏州街上还没有红绿灯,所以到上海的第一天,姑母就领我到马路上去见识红绿灯,告诫我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能闯红灯;闯红灯不但有危险,而且是不文明行为。这番告诫,使我终身不忘,从不违反。而且,那时候上海马路上的行人也很少有闯红灯的,大环境对自己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不过,我也犯过一次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出访美国,住在纽约一家旅馆。一次深夜回旅馆时,看看马路两头一辆行驶的汽车也没有,便忘了注意看红绿灯,想径直穿过马路,不料刚迈出一步,便被后面一位陌生的美国年轻人叫住,向我示意前面是红灯,一下子把我闹了个大红脸。幸亏那是晚上,没有让他看到我的窘态。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闯过红灯。

“红灯停,绿灯行”虽属“小儿科”,却和一切好习惯一样,必须从儿童时代养成,尤其重要的是父母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和幼儿园的熏陶。而现在,这两方面都显得相当缺失和下滑。

有一次,我在麦当劳排队买食品,后面来了一位服饰华丽的女子,带着一个五

六岁的男孩,她等了不到一分钟就不耐烦了,让那孩子上前“加塞”。孩子似乎还比妈妈多点教养,到了窗口频频回首,若有难色。那当妈的勃然大怒,大声喝道:“瞧你那熊样儿,将来跟你爸一样,也是个窝囊废!”说罢,在众目睽睽下抢步上前,把孩子拉开亲自“示范”。奇怪的是周围那么多顾客竟视若无睹,不置一辞,不知是怕惹是非,还是也已经“习惯”了。

写到这里,忽然又想起几年前在《读者》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1987年,75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在巴黎聚会,记者问其中一位老科学家:您在哪一所学校学到了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科学家不假思索地回答:“幼儿园!”又问:你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他回答:“第一是自己的东西要分给小伙伴;第二是不属自己的东西不要拿;第三是东西要放整齐;第四是吃饭前要洗手;第五是做错了事情要认错;第六是午饭以后要休息;第七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他说,“这些知识就是影响了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东西”。

老科学家的话说得真好,也真深刻。不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没有第八条:“走路要红灯停,绿灯行?”——也许因为这一条在进幼儿园之前就已经“习惯”了吧!

2007年3月30日

## 一曲催眠忆儿时

上了年纪，觉就少了。过去总是一夜睡到天亮，现在经常会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之际，就会想起儿时听过的各种催眠歌曲。说来奇怪，七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不知为什么这些催眠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妈妈坐在摇篮边，  
把摇篮摇。  
噢噢我的小宝宝，  
安安稳稳去睡觉。  
今天睡得好，  
明天起来早，  
花园里面采葡萄。

这是母亲唱的摇篮曲。她是女子师范的早期毕业生，这样新派的歌曲，想来是学校里教的。温婉、轻柔的歌声，一次次地把我带入甜蜜的梦乡，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

我儿时多病，多次进上海妇孺医院住院。病房里都是幼儿，晚上不肯好好睡觉。熄灯以后，孩子们还在唧唧喳喳。那位年轻的女护士从不呵斥，总是一边走一边唱：

风啊，你要轻轻地吹，  
鸟啊，你要低低地叫，  
我家小宝宝，  
就要睡着了。  
宝宝的眼睛像爸爸，  
宝宝的眉毛像妈妈，

宝宝的鼻子呢，  
又像爸来又像妈……

唱到这里，孩子们都咯咯笑个不停，一边摸摸自己的鼻子、眉毛，一边闭上眼睛。等到病房里安静下来了，女护士才踮着脚，悄悄地离开。

我的祖母是乡下人，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另有一套哄孩子睡觉的办法。当我不肯好好睡觉的时候，她就把我抱在膝上，一边颠着一边用地道的吴依软语唱着：

哐铃哐铃马来哉，  
隔壁大姐转来哉！  
啥个小菜？  
茭白炒虾，  
田鸡踏杀老鸦。  
老鸦告状，  
告拔（给）和尚，  
和尚念经，  
念拔观音；  
观音扫地，  
扫着一只乌龟（音居）；  
乌龟放屁，  
熏杀隔壁老土地！

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凑在一起，虽无逻辑关系，却能叫人捧腹大笑。

1950年，民间文学大师赵景深先生曾到圣约翰大学做讲座，讲到苏州民间儿歌，还模仿苏州口音嗲声嗲气地说了一段“苏州有座宝带桥，桥上有个嫂嫂，嫂嫂手里抱个宝宝，宝宝要想吃糕糕”的顺口溜，把大学生们逗得前仰后合。散会时我上前给他讲了“哐铃哐铃马来哉”的儿歌，他大感兴趣，并说如果能把各地民间的催眠歌曲搜集起来，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催眠曲是一种对幼儿最早的启蒙教育，不仅可以益智，更重要的是可以时时唤起对童年的回忆和对亲情的眷恋，常温旧梦，把一片温馨永远保留在心头，远离丑恶，实际上是另一种“爱的教育”。

2007年5月11日

## 他们为何想读《文心雕龙》？

这个学期，我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授《高级新闻评论》课。学期接近尾声，正在考虑最后讲点什么作为结束，助教意外地给我开来一份古文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再给“补充点营养”。我接过一看，感到非常意外：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陆机《文赋》；

王勃《滕王阁序》；

柳河东《封建论》；

苏轼前后《赤壁赋》；

方苞《狱中杂记》；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当时我很奇怪：学生怎么会这样对深奥难懂的古文产生兴趣？特别是《文心雕龙》和《文赋》。助教回答：“老师您不是常说，光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蔬菜鱼肉，会得营养不良症；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必然成就有限吗？”

我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学生居然认同我的想法，忧的是像《文心雕龙》《文赋》这样比较深奥的古文，我还是五十多年前读的，能讲好吗？万一学生听得打瞌睡，岂不大煞风景？

但是，话已收不回来，只好先把尘封已久的《文心雕龙》和有关参考书找出来，闭门备了两天课，勉力上阵。没有想到，磕磕绊绊地讲了三节课，竟然还博得一阵掌声。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竟然能对《文心雕龙》等古典作品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字：他们太“渴”了！

设身处地替同学们想想，他们确实是太“渴”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们才

读过多少古今中外的名篇名著？特别是中国的经典名篇，翻来覆去，留在记忆中的恐怕只有《岳阳楼记》《捕蛇者说》《师说》等那有数的几篇文章。在把一切名著当作“糟粕”来批判的年代，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时代不同了，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学生不再满足于“老几篇”，渴望从浩瀚无涯的学海中获取更丰富的营养，来充实自己，强壮自己，就不仅是个人的需求，而且是时代的必然。

从我五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深感丰厚的学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文化的缺失，是当前媒体浮躁之风的重要根源之一。不了解真正的精华，自然安于平庸，安于肤浅，安于不足。当了记者，何以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好在现在这一代青年学子，开始从文化的断层中觉醒。这几年在清华任教，有几件事情使我感触良多：

一件是一位同学，连续两个暑假没有回家，在宿舍里通读完了《史记》和《资治通鉴》。

一件是一位同学给我写信：“请老师多给我们一些文史知识吧！四年的大学生活，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令人羡慕的学习条件……”

一件是一位同学在作业上写道：“请老师不要低估年轻一代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

而这一次直截了当地给我开出书目，要求讲一点《文心雕龙》，则更使我震撼……

2007年7月23日

## “文” “白”之争情未了

提倡白话文，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实践和发展，白话文已经成为我国文字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言的魅力并未完全消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古代典籍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对文言的兴趣似乎正在悄悄升温。这从近年来报章杂志经常出现用文言写的诗赋、散文、小品，可以看到一点端倪。

不久之前，在《解放日报》举办的“文化讲坛”上，章含之女士讲了一则她父亲章士钊早年与胡适之间的趣闻。章士钊是著名的古文家，而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先驱。在学术上，他俩可以说是冰炭不相容的“对头”，但在私谊上却是朋友。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两人分别用文言和白话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的爱情诗。平心而论，章译比胡译更为典雅、蕴藉，韵味更接近原作。我这看法，绝非厚章薄胡，只是想说明，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文言文绝写不出气势磅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白话文也绝写不成意蕴无穷的《岳阳楼记》。

比如，在世界各民族的礼仪性文字中，都非常讲究“雅语”“敬语”的运用，中国尤为突出、丰富。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而现在，已经很不讲究了，不论对象、场合，都是“以尔汝相称”有时令人尴尬。也许这是因为白话文尚处在一种发育的阶段吧！

前些日子，江苏泰州有关部门的领导，专程来京，约请我为重修的望海楼写一篇题记作为“照壁”，而且要求用文言文体，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需要有比白话文更为庄重、典雅的文字与之匹配。我于此道荒废已久，但盛情难却，只好勉力从命，写了一篇不到六百字的《重修望海楼记》。此文在9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褒扬者有之，不解者也有之。一位颇有水平的杂志编辑，也在电话里坦言：“看不懂什么意思。”我说：“我写的并不古奥呀，怎么会看不懂？”对方

曰：“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有些惶惑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像这样浅显的文言，过去初中学生也应该能看得懂的，那么，到底是当前语文教学的问题，还是我在“逆时代潮流而动”？愿闻教于有道。

## 附：《重修望海楼记》

泰州，汉唐古郡，襟江负海，壤沃物阜，人杰地灵。其东南有楼，名曰望海，始建于宋，为一郡之大观。历代名贤，多唱和于此。先祖范文正公曾为泰州西溪盐官，而滕子京为泰州海陵从事，尝相与登楼，把酒赋诗，公有“君子不独乐”等句，其“先忧后乐”之意，亦已呼之欲出。再历二十余载，乃有《岳阳楼记》问世，发浩音于宇内，振遗响于百代。故《泰志》称斯楼为“吾邑之文运命脉”，洵非虚语。元明以降，兵连祸结，斯楼屡建屡毁，不胜其叹。岂楼之兴废，或亦有关国运之盛衰乎？

今逢盛世，遂有重修望海楼之举。公历二〇〇七年秋，巍然一楼飞峙泰州凤城河之滨，上接重霄，下临无地，飞阁流丹，崇阶砌玉，其势可与黄鹤楼、滕王阁媲美，允称江淮第一楼。望海楼之再兴，岂独泰州一邑“文运命脉”之象征哉！

予登乎望海一楼，凭栏远瞩，悄然而思：古之海天，已非今之目力所及；而望海之情，古今一也。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嗟夫，望海之旨大矣，愿世之登临凭眺者，于浮想之余，有思重建斯楼之义。是为记。

2007年9月15日